

甘肃史志



2014.3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编

西北五省区 地方志工作协作会议在西安召开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指组常务副组长、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培林出席会议并讲话



陕西省副省长白阿莹致辞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李虎发言



2014年8月29—31日，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支持下，西北五省区、兵团地方志工作首次协作会议在西安召开。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指组常务副组长、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培林出席会议并讲话。陕西省副省长白阿莹到会致辞。中指组办公室党组书记田嘉、中指组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李富强，陕西省政府副秘书长杨长亚，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李虎、青海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杨松义、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张明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刘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志办公室副任何喜清，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巡视员焦博武、副主任史天社、吴玉莲及部分市（州、地、区）、县地方志工作机构领导和史志工作者共6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王锦春主持。

领导干部应加强文学修养

钱 旭

文人为官,官员作文,自古有之,源远流长。中国古代,以“文”选官,这个“文”,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科学,而专指文章。所以,古代官员吟诗、作赋、著文是看家本领。大凡有作为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有脍炙人口、影响深远的名篇佳作留世。许多人在文学上的成就比他从政的成就还要大,最典型的是南唐后主李煜。他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还有他的《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他把失国之痛、去国之思写得沉郁哀婉,感人至深,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界,至今无人能够超越,使他这个亡国之君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既是改朝换代时期靠文攻武略打拼出来的帝王将相,在他们功成名就之后,也抓紧学习文章、著书立说。就是被人们称为“刘项原来不读书”的刘邦、项羽,在诗词写作方面也毫不逊色。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是何等的有气势、有文采!项羽的《虞姬辞》:“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使我们看到英雄重义重情,顶天立地,死也悲壮,虽败犹荣!以穷兵黩武著称于世的汉武帝的《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愁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成为千古绝唱!谁能说他们没有文学修养呢?正是由于历代有文学修养的官员们的传承,才使得中国文化如浩瀚海洋,博大精深;才使得中国文学如滔滔江河,奔涌不息;才使得中华民族精神极为深刻、极其精美。

从先秦的诗经、离骚到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这些文学丰碑,无不是有文学修养的官员们所为。有些作品即便不是他们所作,也是他们收集、整理、编纂,才得以传世。他们不仅为我们留下了灿烂的文学明珠、巨大的文学宝库,也为我们留下了精美的精神食

粮、丰富的思想源泉。古人尚能如此,何况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中国共产党乎?纵观中外文化发展史,所有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同时,所有伟大的文学作品,也都忠实的反映当代文化,并且经过岁月的洗礼之后,也就成了文化和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共产党人更需要加强文学修养,从历史文化的土壤中吸取养分,传承中华文明,发展先进文化。

领导干部加强文学修养,还因为我国的文学宝库中,蕴藏着一些正确的执政理念,蕴藏着对人的价值观念、道德理想、人生追求的深刻昭示。比如,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对“民本”思想多有论述,使民本思想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的思想资源。孔子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乐民之乐者,民也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也忧其忧。”管仲也曾说过:“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虽然他们的民本思想与我们今天“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主张有着本质的区别,虽然他们的民本思想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没有条件实现,但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还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它不仅哺育了一大批关心民众疾苦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而且在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近代中国,它被进步人士用之与西方“民主”思想嫁接,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思想武器。在今天,它对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执政为民”的思想,仍有借鉴意义。古人在阐发他们的民本思想的时候所留下来的名言警句,如孟子所提倡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岳阳楼记》中所提倡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经世名言,成为千古传诵的处世、治学、为人的精神支柱。就是在今天,这些名篇佳句,也对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建设起积极的不可估量的潜移默化作用。

(节选自《浅议领导干部的文学修养》)



甘 肃 史 志

季 刊

2014 年第 3 期
(总第 19 期)

(史志资料 免费交流)

甘新出连续性内部资料
准印证 G01—0098 号

卷首语

领导干部应加强文学修养……………钱 旭(1)

特 载

在西北五省(区)地方志工作协作会上的讲话…李培林(5)
西北五省区兵团地方志工作协作会议纪要……………(8)
贯彻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 不断提高我省地方志事业科学化水平 ……李 虎(10)
在西北五省(区)地方志工作协作会议上的发言 ……王 平(14)
认真学习贯彻《条例》创新编纂精品史志 ……桂发荣(16)

工作论坛

甘肃历史文化对甘肃历代方志编修的影响 ……车安宁(22)
领导群体是方志事业的重要主体之一 ……朱 玺(28)

陇原人物

北凉创建者—沮渠蒙逊传略 ……(34)

经验交流

《张掖地区志》是一部难得的好书 ……刘鹏生(36)
浅谈人物志的写法 ……童健飞(39)

史地考证

汉新兴县治考 ……谢亚东 裴应东(41)
“永乐关”应为“永乐观” ……朱新斌 郑天水(43)

录

乡土民情

- 洮岷十八湫神潘硕珍(46)
说春与考春信彭战获(50)

史海钩沉

- 红军西征的胜利与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
.....徐玉金(58)
解放兰州时的甘草店支前接待站(62)
界石铺与蒋介石朱克雄(67)
张学良首次西北之行及其《怎样来开发西北》演讲
.....荷重(68)

陇原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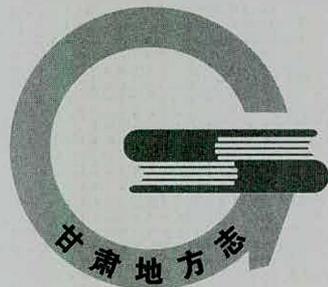
- 陇右地名考薛仰敬(70)

简讯

- 兰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召开年鉴工作暨培训会议(75)
陆海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座谈会在兰州召开(76)
榆中首部村志——《东古城村志》出版发行(77)

志苑随笔

- 崇文楼记王兴和(78)
白龙江畔橄榄香袁兴荣(79)



《甘肃史志》编委会

- 主 任:李 虎
副 主 任:车安宁 钱 旭
李振宇 孙奇明
编 委 委 员:张正龙 李拾良
贺红梅 石为怀
主 办 单 位: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甘肃史志》编辑部

- 主 编:李 虎
副 主 编:钱 旭
编辑部主任:贺红梅
责 任 编 辑:梁兴明 陈 谦
孔令奇 石战涛
司德芳 高天成
王 旭
本 期 责 编:梁兴明
联 系 地 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广场
南 路 51 号统办一号楼九楼
邮 编:730000
电 话:0931-8960622
电 子 邮 箱:gsdfz911@163.com
印 刷:甘肃省政协办公厅印刷厂
电 话:0931-8960384

2014年8月29—31日,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支持下,西北五省区、兵团地方志工作首次协作会议在西安召开。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指组常务副组长、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培林出席会议并讲话。陕西省副省长白阿莹到会致辞。中指组办公室党组书记田嘉、中指组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李富强,陕西省政府副秘书长杨长亚,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李虎、青海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杨松义、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张明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刘星、新疆建设兵团志办公室副主任何喜清、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巡视员焦博武,副主任史天社、吴玉莲及部分市(州、地、区)、县地方志工作机构领导和史志工作者共6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王锦春主持。

白阿莹在致辞中简要介绍了陕西省经济社会发展 and 历史文化资源等方面的情况,希望西北五省区地方志工作者利用协作会议这一平台,加强相互交流,不断提高修志编鉴水平,充分发挥地方志存史、育人、资政的重要作用,为西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李培林在讲话中对近年来西北五省区、兵团地方志工作,特别是认真贯彻落实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指出,进一步做好地方志工作,要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切实加强领导,按照“一纳入、八到位”的要求加强地方志工作;始终抓好依法修志编鉴主业,保质保量完成修志编鉴任务;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努力提供更多、更优秀的方志文化成果;发挥学会作用,组织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地方志工作,为西北地区的发展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紧紧围绕“贯彻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提高西北五省区地方志科学化水平”主题,在提高修志编鉴质量、地情资源开发、信息化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完善体制机制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和探讨,同时就共同推动建立五省区地方志工作交流协作互动机制进行探讨并形成了共识。

现将这次会议纪要、领导讲话和我省与会代表发言予以刊登,以飨读者。

在西北五省(区) 地方志工作协作会上的讲话

(2014年8月29日)

李培林

尊敬的阿莹省长,同志们:

首届西北五省(区)地方志工作协作会在千年古都西安召开,我代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和王伟光组长,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一直以来大力支持地方志工作的陕西省委、省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谢,向西北五省(区)的广大地方志工作者表示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西北是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国之重地,人杰地灵,有着璀璨的历史和厚实文化积淀。孕育了人皇始祖伏羲、八百年周朝基业、汉唐盛世、丝绸之路等,可谓举世无双;莫高窟、麦积山、兵马俑、半坡文化遗址等,无不书写着中华文明的辉煌;唐代诗歌,比如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李白的《关山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等,脍炙人口;三江源、青海湖、天池等,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西北五省(区)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西北五省(区)地方志工作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近几年,西北五省(区)地方志工作发展迅速,逐渐摸索出一套“修志、传志、读志、用志”协调发展的经验做法。

特别是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召开以来,五省(区)采取多种方式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比如陕西省政府7月23日召开了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娄勤俭省长作出批示,白阿莹副省长出席会议并讲话,进一步部署了地方志工作;发文安排了“全省修志业务技能比赛”、“中国梦·方志情演讲赛”和“地方志系统书画展”三项活动;安排了编纂《陕西通志》《西部大开发陕西志》《陕西历代旧志文集》等三项重点文化工程。甘肃省第二轮修志顺利推进,年鉴工作逐步走向正规,地方志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取得新成效,信息化建设逐步开展,全省地方志工作处于历史最好发展时期。青海省多层次、多渠道组织学习宣传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开展研讨和培训交流,抓实七项业务工作,开创了工作新局面。宁夏回族自治区制定实施了《全区地方志工作机构考核实施细则》,拉动业务工作有序开展,增强了全区地方志工作的活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努尔·白克力主席专门就如何贯彻好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作出批示;5月16日,召开了全区地方志工作机构主任会议,总结部署了工作。新疆建设兵团以贯彻落实第五次全国地方志会议精神为契机,

扎实有效地推进第二轮修志工作。这些成绩的取得,充分体现了西北五省(区)各级党委、政府对地方工作的高度重视,充分体现了有一支能战斗、有能力、有奉献精神、有干劲的地方志工作队伍。对西北五省(区)地方志工作取得的成绩,呈现出的良好发展势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给予充分肯定。

这次西北五省(区)地方志工作协作会,主要是交流探索五省(区)地方志工作联动发展的体制机制,相互借鉴经验做法,取长补短、开阔视野,召开十分及时,也很有必要。借此机会,我讲几点意见。

一是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作了关于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的重要讲话、李克强总理对地方志工作作了重要批示、刘延东副总理在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召开前与部分会议代表座谈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王伟光在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上作了报告,总结了过去五年的经验,明确了今后五年的发展目标,布置了今后五年的主要工作任务。会议还审议了《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4—2020)》(草案)。近段时间,各地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紧紧抓住贯彻落实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的有利时机,理思路、定目标、抓落实,出台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实效明显,开局很好。地方志工作和事业发展现在面临极好的机遇,时不待我。有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有了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明确的目标任务,现在关键就是各地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如何抓紧抓好贯彻落实。大家一定要珍惜这个难得的发展机遇,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李克强

总理的重要批示、刘延东副总理的重要讲话、王伟光同志所作的工作报告扎扎实实落到实处,抓基层,抓主业,打根基,谋发展,引领地方志工作实现快速发展。

二是切实加强领导,按照“一纳入、八到位”的要求加强地方志工作。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明确地方志工作是各级政府的官职官责。刘延东副总理、王伟光同志在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专门提出地方志工作要做到“一纳入、八到位”,即将地方志工作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认识到位、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编制到位、经费到位、设施到位、规划到位、工作到位,这是做好地方志工作的根本保障。五省(区)省级地方志工作机构要一条一条对照,一项一项查摆,理清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及时向党委、政府汇报,拿出一揽子的解决措施和办法。伟光组长说,他和我都是方志战线的新兵,我们首先要学习和调研。自2013年12月以来,伟光同志和我到了十余个省调研、座谈,大家普遍反映存在机构、编制、经费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有通盘考虑,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要有规划、有步骤。要利用行政督察手段建立长效机制,一项一项落实,有阶段性目标,有监督,有落实。

三是始终抓好依法修志编鉴主业,保质保量完成修志编鉴任务。修志编鉴主业丝毫不能放松。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提出2020年要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任务、要尽快实现省市县三级地方综合年鉴编纂的全覆盖,这是硬指标。目前看来,有些地方的难度还比较大。相比而言,西北五省(区)因为受经济发展水平、人才相对匮乏等方面的限制,修志编鉴的难度会更多,大家需要付出更多艰辛的努力。要因地制宜,特别是省级地方志工

西北五省区兵团地方志工作协作会议纪要

2014年8月29-31日,根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倡议,首届西北五省区、兵团地方志工作协作会议在西安召开。中央候补委员、中指组常务副组长、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培林出席会议并讲话。陕西省副省长白阿莹到会致辞。中指组办公室党组书记田嘉、中指组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李富强,陕西省政府副秘书长杨长亚,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甘肃省史志办公室、青海省地方志办公室、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新疆建设兵团志办公室及部分市(州、地、区)、县地方志工作机构24家单位的领导和同志共6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王锦春主持。会议围绕“贯彻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提高西北五省区地方志科学化水平”的主题,开展交流研讨,取得了积极成效。

会议认为,近几年,西北五省区、兵团地方志工作发展迅速,逐渐摸索出一套“修志、传志、读志、用志”协调发展的经验做法。特别是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召开以来,五省区、兵团采取多种方式贯彻落实会议精神。陕西省政府7月23日召开了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娄勤俭省长作出批示,白阿莹副省长出席会议并讲话,进一步部署了

地方志工作;发文安排了“全省修志业务技能比赛”、“中国梦·方志情演讲赛”和“地方志系统书画展”三项活动;安排了编纂《陕西通志》《西部大开发陕西志》《陕西历代旧志文库》等三项重点文化工程。甘肃省第二轮修志顺利推进,年鉴工作逐步走向正规,地方志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取得新成效,信息化建设逐步开展,全省地方志工作处于历史最好发展时期。青海省多层次、多渠道组织学习宣传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开展研讨和培训交流,抓实七项业务工作,开创了工作新局面。宁夏回族自治区制定实施了《全区地方志工作机构考核实施细则》,拉动业务工作有序开展,增强了全区地方志工作的活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努尔·白克力主席专门就如何贯彻好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作出批示;5月16日,召开了全区地方志工作机构主任会议,总结部署了工作。新疆建设兵团以贯彻落实第五次全国地方志会议精神为契机,扎实有效地推进第二轮修志工作。这些成绩的取得,充分体现了西北五省区、兵团各级党委、政府对地方志工作的高度重视,充分证明了西北五省区、兵团有一支能战斗、有能力、有奉献精神、有干劲的地方志工作队伍,得到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充分肯定。

会议指出,李培林、白阿莹到会讲话,充分体现了中指组、陕西省政府对会议的高度重视。白阿莹在致辞中简要介绍了陕西省经济社会发展和历史文化资源等方面的情况,希望西北五省区地方志工作者利用协作会议这一平台,加强相互交流,不断提高修志编鉴水平,充分发挥地方志存史、育人、资政的重要作用,为西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李培林在讲话中明确提出,进一步做好地方志工作,要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珍惜难得的发展机遇,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李克强总理的重要批示、刘延东副总理的重要讲话、王伟光组长所作的工作报告扎扎实实落到实处,抓基层,抓主业,打根基,谋发展,引领地方志工作实现快速发展;切实加强领导,按照“一纳入、八到位”的要求加强地方志工作,有规划、有步骤。要利用行政督查手段建立长效机制,一项一项落实,有阶段性目标,有监督,有落实;始终抓好依法修志编鉴主业,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工作进度,按照国家的时限要求,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努力提供更多、更优秀的方志文化成果,创造性地做好地方志文化资源开发利用这篇大文章,选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契合点,继续鼓励对地方志编修的探索和创新;发挥学会作用,组织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地方志工作,不断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实施,社会组织和力量积极参与”的机

制,设立专家库,调动各种力量的积极性参与地方志工作,为打造精品佳志和出系列的资政、教化产品奠定厚实的人才和理论基础。领导同志的讲话,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一定要认真学习,抓好落实。

会议认为,西北五省区、兵团地域相连,文化传统相近,历史联系紧密,举办地方志工作协作会议,交流探索五省区、兵团地方志工作联动发展的体制机制,相互借鉴经验做法,取长补短、开阔视野,十分及时,也很有必要。

会议强调,西北五省区、兵团地方志工作机构要紧紧抓住国家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机遇,积极搭建好协作会议的平台,推进地方志工作在更广泛、更高层次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提升西北五省区、兵团地方志工作科学化水平,“修志问道,以启未来”,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会议商定,西北五省区、兵团地方志工作协作会议每年举办一次,由五省区、兵团轮流承办。承办方要围绕地方志重点工作,与其他省区商议提出会议主题,做好会议相关的筹备、组织与服务工作。同时确定,2015年地方志工作协作会议由青海省地方志办公室承办。

会议高度评价陕西省政府及省地方志办公室为首届会议成功举办所付出的努力,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贯彻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 不断提高我省地方志事业科学化水平

甘肃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党组书记 李 虎

同志们：

大家好！很高兴参加西北五省（区）地方志工作协作会。

下面，我就甘肃省贯彻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和近年全省地方志工作情况向会议作交流发言，不妥之处，请批评。

一、基本情况

甘肃省地处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度交汇处，扼西北之要冲。全省土地面积 45.37 万平方千米，占全国土地面积的 4.72%。辖 12 个市、2 个民族自治州、86 个县（市、区），总人口 2600 万，有汉、回、藏、东乡、裕固、保安、蒙古、哈萨克、土、撒拉、满、朝鲜等 10 多个聚居民族。其中东乡、裕固、保安三个民族是全国独有少数民族。甘肃是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之一，传说中的伏羲、黄帝、女娲均活动于甘肃。全省发现各个时期的文化遗迹 13600 多处。汇聚了始祖文化、周秦文化、敦煌文化、三国文化、丝路文化、黄河文化、长城文化、民族文化、红色革命等多元文化。东方艺术宝库莫高窟、羲皇故里伏羲庙、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道教名山崆峒山、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宗主寺之一夏河拉卜楞寺等众多遗存备受世界关注。2013 年 1 月，国务院正式批复甘肃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进一步确立了甘肃文化大省的地位。

甘肃为经济欠发达省份。2013 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 6300 亿元，公共财政收入 606.5 亿元。但甘肃经济特点突出，区位优势明显，工业基础和科

技支撑力较强。特色农产品、畜产品和中药材产量在全国名列前茅。煤炭、石油、有色金属、风能太阳能等资源潜在经济价值达 8000 亿元以上。2010 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2012 年 8 月国务院批准建立国家级新区——兰州新区，甘肃经济步入一个奋力赶超、转型跨越的新阶段。

二、修志情况

地方志工作是记录历史、传承文明、服务当代、垂鉴后世的重要文化事业。甘肃具有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现存历代方志 270 多种，其中不乏唐代《沙洲记》等一批传世名志。甘肃新方志编纂工作又是全国较早省份之一，1979 年，庆阳革命老区华池县率先编纂出版县志。

（一）机构队伍情况

1983 年 5 月，甘肃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作出《关于重视编修甘肃地方史志的决定》。1984 年省上成立了由省长任主任、分管副省长任常务副主任，省上“四大班子”分管秘书长、省史志办主任任副主任，省直有关部门及市（州）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委员的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省上设立正厅级建制的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作为省政府地方志工作职能机构，负责组织和指导全省地方志书编纂、地方综合年鉴编辑、史志资料开发利用等工作。全省 14 个市（州）、86 个县（市、区）都有地方志工作机构。市（州）除陇南市与党史办合署外，其他均为独立机构。县（市、区）60 个为独立机构，

作机构要统抓统管，加强对市县地方志工作机构的督促检查，控制好进度，控制好质量，把修志编鉴作为衡量各地地方志工作的核心指标。进度和质量要相辅相成，不能为了进度而忽视了质量，也不能光是强调质量而不抓进度，相得益彰，才能协调发展。

四是努力提供更多、更优秀的方志文化成果。有为才能有位，要有位，首先必须得有所作为。地方志涉及面广，内容丰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途径很多、方式很多。要创造性地做好地方志文化资源开发利用这篇大文章。地方志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工作做得好的地方，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工作做得好的地方，地方志工作肯定就做得有声有色。要开发利用好地方志文化资源，首先要做好资源整合，把志书、年鉴、地方文献、地情资料汇集到地方志工作机构，为我所用。其次是要选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契合点，比如现在国家在抓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就可以从历代旧志中整理一些资料，供决策参考。第三是要针对服务对象选择好载体。面对不同的群体，要选择不同的载体传播地方志，比如网络、展览是面向社会大众，图书可以选择不同主题面向专家学者、中小学生等；又如服务的产品就要简明实用，因为领导没有时间看大部头的东西，

简明实用一目了然，接受起来就容易。另外，要继续鼓励对地方志编修的探索和创新，加强对部门志、行业志、专题志、乡镇村志编纂的指导和服务。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目前在抓三项工作，一是地方志发展规划纲要，争取国务院能够转发这个文件；二是西北三省财政困难地方地方志出版资助工程，三是中国名镇志工程。

五是发挥学会作用，组织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地方志工作。现在是众手成志，还要开发利用地方志文化资源，要出喜闻乐见的方志文化产品等，光靠地方志系统的力量是不够的。“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实施，社会组织和力量积极参与”的机制还要不断完善。地方志工作机构要把一批熟悉地情、研究地方历史的专家、学者、退休老同志等动员起来，设立专家库，调动各种力量的积极性参与地方志工作。要充分发挥学会的作用，为打造精品佳志和出系列的资政、教化产品奠定厚实的人才和理论基础。

同志们，西北五省（区）地方志工作大有可为，也可以大有作为，希望大家再接再厉、艰苦奋斗、努力拼搏、笔耕不辍，为西北地区的发展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最后，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另外 26 个与党史办或档案局合署办公。全省大多数修志机构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现有专兼职修志人员一千多人。

(二)《条例》贯彻情况

长期以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全面贯彻国务院关于地方志工作的方针政策及工作部署,大力推动地方志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尤其是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地方志工作。2009 年 1 月,省政府颁布作为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配套规章的《甘肃省地方志工作规定》。2010 年 7 月,由省人大、省政协、省政府法制办、省地方史志办组成的执法检查组,对全省 14 个市(州)、40 多个县(市、区)的地方史志工作进行了执法大检查。修志工作实现了由过去单纯依靠行政推动向行政推动和依法推动相结合的转变,依法有力地促进了地方史志事业的发展。

(三)工作开展情况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有力指导下,全省地方志工作系统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三级志书为主体、以地方综合年鉴为基础、以服务社会为中心”的总体思路,以贯彻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省政府《甘肃省地方志工作规定》为主要抓手,全面推动地方志工作业务建设、制度建设、基础条件建设、队伍建设和理论建设,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一是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视地方志工作。为了推动《条例》《规定》的深入贯彻落实,2013 年 4 月,省政府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工作的意见》,《意见》从提高做好新形势下地方志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明确地方志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切实加快第二轮志书编纂,高质量做好年鉴编辑工作;努力提高地方志工作水平,推动地方志工作创新发展;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地方志工作的体制机制,为地方志事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五个方面,对各市(州)、省上各修志部门进一步做好地方志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在 2013 年 4 月召开的全省地方史志工作会议上,分管副省长代

表省政府与各市(州)政府签订了《2013—2015 年度地方史志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年终省政府组织检查考核。将地方志工作纳入政府工作任务和议事日程,实现了常态化管理。2011 年以来先后督促有关市(州)健全了地方志工作机构,扩展了修志工作内容,巩固了修志工作阵地。在各级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逐年增加修志工作经费,保证了地方志工作必要条件。目前,全省第一轮修志胜利完成,第二轮修志顺利推进,年鉴工作逐步走向正轨,史志信息化建设开始起步,全省地方志工作处于历史最好发展时期。

二是志书编纂顺利推进。甘肃省第一轮修志,规划省志专志 72 卷,市(州)志 10 部,县(市、区)志 83 部。随着今年 4 月《甘肃省志·文化志》通过省志编委会终审,我省列入首轮修志规划的省、地、县三级志书已全面完成。总计 165 部卷、近两亿文字、1 万多幅照片,在甘肃历史上第一次基本实现了省、地、县三级都有地方志书。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统一部署下,省政府于 2004 年 2 月启动全省第二轮修志。到目前,列入规划的 14 部市(州)志已出版 4 部,终审 1 部;85 部二轮县(市、区)志出版 32 部,终审 6 部;72 卷省志,出版 6 卷,终审 5 卷。

三是年鉴工作逐步开展。甘肃省年鉴工作开展较晚。《甘肃年鉴》原由省统计局编辑。《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后,经省政府协调,从 2009 年起由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编辑,现已按年度连续出版五卷。在编好省级综合年鉴的同时,按照《条例》要求,省史志办加大对全省年鉴理顺关系工作的督查力度,要求市县两级从 2009 年起尽快开展年鉴工作,到 2015 年实现县级以上综合年鉴的全覆盖。2009 年 6 月制定印发了《甘肃省地方综合年鉴管理办法(试行)》,2013 年又将年鉴工作纳入目标管理责任书考核范围,加强了对全省年鉴工作的统筹管理。到目前,全省共有 11 个市(州)、34 个县(市、区)的地方志机构编辑出版综合年鉴,加上部门、行业编辑的专业年鉴,全省约有 70 多个地方、部门和单位编辑出版年鉴。

四是地方志资源得到有效开发。多年来,全省

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方针,充分利用方志资料和人才优势,在着力编好志书年鉴的同时,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和重大工作部署,积极开展旧志文献整理、史志资料研究开发等工作,充分发挥了地方志工作服务社会的作用。截至目前,全省累计整理、重印各种旧志 90 多部,编纂出版地方史、史志研究论著和各种地情资料 150 多种 800 多册。省史志办先后参与了由省委宣传部编纂的《辉煌的历程》《甘肃 60 年图志》等大型文献的撰稿编辑工作,与甘肃电视台合作推出《甘肃改革开放 30 年大事回眸》《新中国脚步——甘肃记忆》等一批大型历史文献片。2010 年 8 月 7 日,我省舟曲县发生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为记载历史重大事件,汲取经验教训,我们借鉴国家编纂《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志》和《青海玉树地震志》的做法,于 2011 年 4 月报请省政府批准,组织编纂《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志》,目前该志已完成初稿。各市(州)、县(市、区)修志机构深入挖掘整理当地历史文化资源,编写出《酒泉通史》《庆阳通史》《武威通史》《兰州历史文化丛书》《天水文化丛书》等一大批专题资料,努力将地方志工作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在参与规划编制、招商引资、历史文化遗产发掘保护、旅游业开发和减灾防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较好地发挥了地方史志工作部门的作用。

五是信息化建设开始起步。由省史志办建设的甘肃地方史志网已于 2013 年 10 月正式开通运行,目前累计访问量已超过 200 万人次。全省 14 个市(州)、86 个县(市、区)已有 4 个市(州)、9 个县(市、区)建成开通地方史志网站。这些史志网站的开通运行,拓宽了地方志工作服务社会的渠道,提升了地方史志工作的社会影响力。

三、贯彻落实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情况

今年 4 月 19—20 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受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会议规格很高、主题突出、内容丰富、意义深远,为我国地方志事业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勾画

出宏伟的蓝图。中央领导的批示、讲话及会议文件,是我们今后进一步做好工作的指导方针和根本遵循。会议精神学习传达之后,我省广大地方志工作者受到极大的激励和鼓舞。纷纷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工作信心,再鼓干劲,无私奉献,无怨无悔地做好本职工作。关于会议精神的学习贯彻,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后,我办及时向省政府分管副省长作了汇报。省史志编委会主任会议第一时间传达学习了李克强总理的重要批示和刘延东副总理的重要讲话精神。6 月 13 日,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兰州召开甘宁青三省(区)地方志工作座谈会期间,省委书记王三运、省长刘伟平亲切会见了出席会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王伟光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李培林一行。在会见中,王三运、刘伟平表示要分别听取省史志办的工作汇报。我办已向省政府上报了《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关于汇报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及我省贯彻意见的请示》,从会议主要精神、全省地方志工作基本情况、当前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关于我省贯彻落实的意见等四个方面向省政府做了请示,省政府常务会议近期将专题研究讨论贯彻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和甘宁青三省(区)地方志工作座谈会精神。

二是 4 月 24 日、26 日,我办召开省史志办主任办公会议和全体干部大会,传达学习李克强总理对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批示和刘延东副总理的重要讲话、王伟光院长作的工作报告和李培林副院长的总结讲话,并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做出安排部署。

三是 6 月 6 日,以甘志办发[2014] 15 号文件,向各市(州)、县(市、区)地方史志办公室,省上各修志机构印发了《关于认真学习贯彻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的的通知》,全文转发了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刘延东副总理重要讲话、王伟光院长的工作报告和李培林副院长的总结讲话。要求全省各级史志部门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第五次

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的热潮,切实抓好贯彻落实。

四、今后工作

甘肃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改革发展势头强劲。做好地方志工作,对于展示甘肃历史文化魅力,展现甘肃人民奋斗精神,推动转型跨越,促进富民兴陇,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具有十分重要意义。下一步,我们要充分认识地方志工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充分认识加快推进地方志事业发展对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发展文化生产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大意义,充分认识地方志工作对于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民族复兴伟大中国梦的重要作用,认真学习贯彻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和甘宁青三省(区)地方志工作座谈会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统一认识,凝聚力量,抢抓机遇,迎难而上,围绕既定的目标任务,切实加强领导,强化办法措施,创造更好条件,推动全省地方志工作再上新台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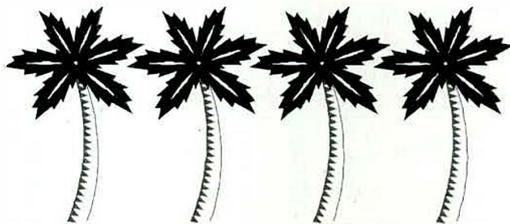
一是切实加快修志编鉴工作进度。编纂志书是修志机构的首要任务。我们要进一步强化“志为主体”理念,在统筹抓好地方志事业各项工作的同时,首先抓好二轮修志任务的落实。目前,全省第二轮修志正处于成果高峰期,每年将有20多部志书完成审定,任务十分繁重。全省上下要按照省政府《目标责任书》的进度要求,按计划、分步骤、有针对性地抓好志书编纂的督促指导,做到任务明确、责任到人、措施到位,确保全省第二轮修志如期完成。编辑年鉴是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赋予地方志工作机构一项新的任务,是实现地方志工作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我省年鉴工作起步较晚,工作发展不平衡。我们要正视差距,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采取有效措施迎头赶上,力争在2015年底全面实现全省县级以上地方综合年鉴编辑全覆盖。

二是切实保证志书的质量。编纂地方志是为党立言、为时代树碑、为人民立传的一项十分神圣而又严肃的工作,必须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高标准保证志书质量。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地方志工作中的指导地位,保证地方志工作的正确方向。要建立健全志书质量体系,认真落实“一评三审”制度,严格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认真把好志书质量关,努力把志书打造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文化精品。

三是进一步做好服务社会工作。地方志工作只有更好地服务社会,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既要有历史使命感,又要有现实责任感,坚持“服务中心、服务大局”的方针,按照修以致用、修用并举的要求,加大史志资源开发利用力度,为社会公众读史用志提供便利。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为地方志工作服务社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要引导和动员全省各级修志部门主动参与,积极作为,挖掘更多有价值、高水平的历史资料,赋予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更加丰厚的历史内涵。

四是进一步加强对地方志工作的领导。编纂地方志是各级政府的一项法定职责。要继续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持、部门合作、社会参与、修志机构组织实施”的工作体制,切实强化“官修”、“官责”,认真落实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提出的“一落实、八到位”要求,认真解决修志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使各部门、各单位都能够遵照《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的义务,及时准确地为修志、编鉴提供所需资料。争取人事、编制、财政等部门从人力、编制、资金等方面对地方志工作给予更多支持。在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建立健全鼓励、扶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修志的政策措施,发挥好社会修志积极性,形成全社会重视修志、支持修志的良好局面。



在西北五省(区)地方志工作 协作会议上的发言

白银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王平

各位领导、各位同仁：

正值全国地方志系统认真贯彻落实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之际，我很荣幸参加西北五省（区）地方志工作协作会议并作交流发言。下面我就甘肃省白银市近几年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打算向各位领导和同仁作以简要汇报。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白银市地方志工作机构情况

白银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成立于1990年，为正县级事业单位。现内设市志编纂科、县区志指导科、年鉴编辑部、综合科、方志馆，编制9人，实有8人，其中主任1名，副主任1名，科长2名，科员2名工勤人员2名。全市五个县（区）均设立地方志办公室，正科级建制，其中靖远县、白银区地方志办公室与党史办合署。全市共有在职修志工作人员28名。

2010年11月，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被评为“全国方志系统先进集体”。2011年3月，景泰县地方志办公室被评为“全省地方志系统先进集体”，全市有3名同志被评为“全省地方志系统先进工作者”。2012年8月，《白银市年鉴（2010）》荣获第六届全国年鉴编校质量检查评比三等奖。2013年1月，甘肃省第九届优秀史志成果评选：《白银市志（1991~2005）》荣获志书类一等奖，《白银市年鉴（2010）》荣获年鉴类一等奖。8月，《白银市年鉴（2011）》荣获第七届全国年鉴编校质量检查评比三等奖。9月，白银市地方志编纂

委员会办公室被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授予第一届全国“敬老文明号”荣誉称号。

二、白银市修志工作进展情况

（一）两轮志书编修工作。二十世纪80年代初期，我市先后出版发行了《会宁县志》《白银市志》等市、县区两级第一轮志书共6部。2001年11月起，先后有《景泰县志》（1991~2000）《白银市志》（1991~2005）等4部第二轮志书出版发行。目前，《平川区志》（1996~2005）完成终审稿并交付印制、重修《靖远县志》，拟2015年前完成。

同时，全市有《白银市军事志》等19部专业志出版。《红军会宁会师志》等4部专业志书正在编写初稿和评审稿。全市两级志书的编修工作总体进展良好。至2013年底，全市共出版36部志书和地情书。其中白银市地方志办公室出版的有15部。

（二）旧志整理工作。至2010年底，《会宁旧志集注》等10部旧志全部整理校注，出版发行。

（三）综合年鉴编辑工作。2004年10月，白银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全面启动年鉴编辑工作。2005年7月，《白银市年鉴》（2004）首部年鉴出版发行。2011年，全市启动县区综合年鉴编辑工作，已顺利开展第四个年头，市级综合年鉴连续十年，一年一鉴，2013年实现彩色印刷。

（四）《白银史话丛书》编辑工作。《白银史话丛书》由《白银史话》《会宁史话》《靖远史话》《景泰史话》《平川史话》《白银区史话》六部分组成。2011

年,由白银市地方志办公室统一编辑,2013年6月正式出版发行。

(五)《白银大辞典》编纂工作。2008年11月启动编辑,2014年6月底完成130万字初稿,力争在2014年底全面完成终审稿和出版印制工作。

(六)《当代白银·非公有制企业人物》编修工作。2011年10月启动编辑,作为《白银市志》人物篇的补充,记载非公经济领域白银市百名创业人士的事迹,为各级政府提供准确的人力资源信息,服务于白银经济发展,力争在2014年底完成评审稿。

(七)《当代白银·孝亲敬老道德模范》编修工作。2012年12月启动编辑,作为《白银市志》人物篇的补充,记载白银市当代百名孝子的事迹,各县(区)已上报典型事迹材料78份,2014年6月制作完成《孝亲敬老道德模范——康义义》影像志一部,创新修志模式。

(八)全市方志专业队伍建设工作。组织现有修志人员参加培训 and 考察学习,以提高修志人员的整体素质,适应新形势修志工作的需要。2011年以来,先后已举办业务培训班8期,培训人员达160多人次。

(九)白银市地方史志文化协会建设工作。2011年6月,白银市地方史志文化协会正式成立。至2014年6月,发展个人会员108人,单位会员51家。2013年11月,白银市地方史志文化协会及联创共建的6个单位被授予白银市“敬老文明号”荣誉称号。

(十)白银市方志馆和地方志信息化建设工作。2011年3月,白银市方志馆筹建项目和“白银地方志”网站建设项目启动。分别设置国史、志书、年鉴、家谱、档案、地方文献等图书六个功能区和专栏,共整理入馆各类志鉴、图书1472册。同时,加大甘肃省内三级志书的交流工作,至目前方志馆共交流入库志鉴图书334套(册),其中志书129套(册)、年鉴36套(册)、史话99套(册)、家

谱12套(册),其他地情资料丛书58套(册)。“白银地方志”网站对外发布各类信息673条。

三、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一是管理体制不顺。一些部门和县(区),对志书、年鉴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不能按时供稿和开展工作,影响整体编纂进度和质量;二是县(区)修志业务经费不足,基础条件差,设备落后,信息化基础设施不到位,不利于开展正常工作。三是市、县(区)修志专业力量严重不足,缺少专业培训,专、兼职修志人员队伍建设亟待加强。

四、今后工作的打算

一是认真贯彻落实好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把握好正确的修志方向,探索“一体两翼”的工作思路,即以二轮志书和县(区)地方综合年鉴编修为“主体”,坚持把推进市、县(区)两级综合年鉴的编辑出版作为业务重中之重,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思想,努力打造精品,提供权威性地情文献。充分发挥白银市方志馆和白银市史志文化协会“两翼”的作用,相互依存,相得益彰,优势互补,加大资源的开发利用,推动地方志工作再上新台阶。

二是加强市级地方志网站建设,把握好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时代性特色和地域文化特色,扩大地方志工作的社会影响力、创新宣传地方志鉴文化的新形式,至2015年底完成升级改造工程,实现“数字化”方志格局,充分展示方志文化魅力。

三是弘扬修志的传统美德和无私奉献精神,加大对白银市地方志工作基础设施和人才队伍建设的投入力度,淡泊名利,敬业爱岗,极大的鼓舞修志工作者的士气,增强地方志事业持续发展的源动力。

四是强化地方志管理体制改革的,有效促进地方志工作法制化进程,充分发挥市志办在修志编纂中依法组织、指导、检查、督办的主体作用,助推地方志事业全面发展。

认真学习贯彻《条例》 创新编纂精品史志

金塔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 桂发荣

近年来,金塔县认真学习贯彻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省政府《甘肃省地方志工作规定》,坚持依法修志,千方百计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因素,地方志工作步入了健康稳步发展的轨道。现将金塔县地方史志工作向各位领导、专家学者作以汇报,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在艰难中起好步,为地方史志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至1985年,金塔县没有地方史志编纂机构。1985年1月,金塔县成立县志编纂机构,1995年,一轮县志完成后,县志编纂机构随之撤销。2004年,金塔县成立县志编纂筹备领导小组,可以说组建时属于无机构、无人员、无经费、无办公设施、无办公场地的“五无单位”,当时既要置窝,又要干事,困难重重,步履维艰。在地方史志筹备工作中,我们发扬“穷棒子”精神,坚持“四个依靠”(依靠地方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依靠上级业务部门的精心指导、依靠全社会的大力支持、依靠全体工作人员共同努力),先后请示县委、县政府召开史志工作专题研讨会3场(次),请示县委、县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强地方史志工作的实施意见》等6个配套文件,正式成立金塔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处理日常事务,将县地方史志办公室列为县政府办公室管理的科级事业单位,县地方史志办主任兼任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县地方史志办的日常工作,县地方史志办确定事业编制5人,工作人员的工资纳入财政预算,编纂经费根据需要由县财政审核后统一划拨。

2006年后,金塔县认真学习贯彻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省政府《甘肃省地方志工作规定》,全面落实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及酒泉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史志事业发展的意见》,把地方史志工作作为华夏文明创新区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初步形成了一条“党委领导、政府规划、部门实施、众手修志”的工作机制。进一步落实了领导、编制、经费、条件、设施“五到位”,实现了办事有机构、修志有人员、工作有经费、办公有设施、活动有场地的“五有”目标,为二轮修志工作的顺利起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近年来,金塔县地方史志办公室以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为统领,按照老、中、青结合,专职、兼职结合,集体创作和个人创作结合的办法,鼓励编纂人员发扬“求实、创新、协作、奉献、实干”五种精神,培养和造就了一支勤于思考、善于钻研、精于写作、乐于奉献的想干、爱干、会干、能干、巧干的史志编纂队伍。金塔县地方史志办公室先后荣获县级“五好领导班子”、“平安单位”、“文明单位”,连续几年在酒泉市史志工作目标责任书考核中名列第一。2011年荣获甘肃省地方史志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有4部作品先后9次分别受到国家相关部委及省、市、县表彰奖励。

二、在实践中出成果,为地方史志工作争得一席之地

凡事“有为才有位”。近年来,金塔县地方史志办公室依据《地方志书质量标准》,把“多出作品、多创精品”作为主攻目标,坚持用史志精品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靠出人才、出作品、出成果,为史志工作在社会这个大平台上争得一席之地,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广大干部群众的高度赞誉。

(一)抓主保重,完成了二轮《金塔县志》出版发行

金塔县地方史志办公室把编修二轮志书作为主要任务和主攻方向,真抓实干。二轮《金塔县志》(1990—2008年)采用记述性语体文,编、章、节、目结合体编纂。概述、大事记、附录、后记独立成

篇。标题中文、英文对译。卷末置索引。凡 25 编、138 章、466 节,表述以事分类,横排纵述,以志为主。随文插入特载 10 篇、专记 12 篇、图 75 幅、表 201 份、照 2008 张。总字数 126 万字,四色套印,分上下两卷装帧。2009 年 5 月完成初审,2009 年 10 月完成复审,2010 年 6 月完成终审,2010 年 8 月酒泉市人民政府批准出版发行。2011 年 2 月,被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甘肃省地方史志学会授予“甘肃省第八届地方史志优秀成果一等奖”,同时被中共金塔县委授予“金塔县 2010 年‘五个一工程’优秀书著”,2013 年 1 月被酒泉市人民政府授予“酒泉市首届社会科学奖二等奖”。

(二) 落实《条例》,出版发行《金塔年鉴》5 部

金塔县认真落实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把年鉴编纂列入史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落实一年一鉴的编纂规定。《金塔年鉴》与二轮《金塔县志》相衔接,按照“提高编纂质量,完善体例结构,增加信息容量,增强志书可读性”的编辑要求,设特载、大事记、政党政权、群众团体、经济管理 etc 20 个栏目,图文并茂,富有资料性、实用性和可读性。2009 年后每年出版发行一卷,至目前共发行 5 卷。年鉴的编纂已经成为金塔县地方史志办公室一项常态化的工作。

(三) 弥补缺失,整理出版旧志书 3 部

金塔县在历史上没有正式出版发行过地方志,在普查过程中,我们在金塔县民间发现了 3 部旧志拓本,我们如获至宝,组织 3 名老同志利用 3 年时间完成了《创修金塔县志》(1934 年手抄本)、《新编鼎新县志》(1945 年手抄本)、《酒泉市志》(1961 年刻写本)等 3 部地方旧志整理出版工作,使濒临失传的珍贵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和利用。

(四) 拓展领域,编纂出版金塔地情丛书 6 部 17 卷

为了挖掘地方文史资源,丰富地方文史资料库,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金塔县地方史志办公室采取聘请专家学者指导、聘用老同志审查把关、招揽社会贤达名流参与、抽调各单位文史爱好者供稿、借用“三支一扶”、西部志愿者大学生编纂等方式编纂出版地情丛书。至

2014 年 6 月,金塔县地方史志办公室已正式编纂出版《金塔史话》、《居延逸史》、《塞上明珠金塔》、《金塔历史文化瑰宝》(共三卷)、《金塔诗苑》、《金塔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十辑)地情资料丛书 6 部 17 卷。其中:《金塔史话》2007 年 8 月被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甘肃省地方史志学会授予“甘肃省第六届地方史志优秀成果一等奖”。《居延逸史》2008 年 12 月被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甘肃省地方史志学会授予“甘肃省第七届地方史志优秀成果一等奖”;2009 年 2 月被中共酒泉市委授予“酒泉市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金塔历史文化瑰宝》(共三卷)2013 年 1 月被甘肃省地方史志学会授予“甘肃省第九届地方史志优秀成果一等奖”;2014 年 4 月被酒泉市人民政府授予“酒泉市第二届社会科学奖二等奖”。

(五) 扎实推进,启动编纂乡镇志、部门行业志

金塔县先后制定下发了《关于认真做好行业志编纂的通知》(县委办发[2007]12 号)、《关于认真做好乡镇(城市社区)志编纂工作的通知》(金办发[2013]8 号)等系列文件,行业志编纂工作进展有序。至目前,《金塔县人大志》《金塔县政协志》《金塔县军事志》《金塔县农业志》等 16 部行业志已出版发行。其中《金塔县政协志》2013 年 1 月被甘肃省地方史志学会授予“甘肃省第九届优秀史志成果二等奖”。有 21 个部门和单位编纂的行业志现已进入终审和出版发行阶段。

(六) 服务社会,创办开通了“金塔地情信息网”站

2012 年 9 月,金塔县地方史志办本着“创精品、重服务”的原则,着手建立金塔县地情信息网。2013 年 10 月 1 日正式开通运行。网站以“记载金塔历史、传承华夏文明”为宗旨,以建设金塔大百科全书为目标,主要设立县情概况、建制沿革、史志动态、业务论坛等 18 个栏目。挂网信息 1360 条,网载收录文字资料 1260 多万字,照片 1530 余幅,目前,地情信息网运行良好,总访问量达到 65 万人(次),总浏览量达到 110 万人(次),日均访问量达到 1800 人(次)以上,实现了地方文史资料全部数字化阅览。

(七)因地制宜,建成了金塔县方志馆和地情资料库

金塔县方志馆于2013年9月建成并对外免费开放,总投资86万元。其中投资56万元翻新维修建筑面积150余平方米的房屋,投资30万元用于附属设施及图书购置和展板绘制。方志馆由地情资料信息库和展览厅两大部分组成。地情资料信息库购置18组密集书架,收藏地方志资料、地情资料、古籍资料、年鉴资料等3660余册。展览厅由金塔县情概况、建制历史、县域名片、桑田逸史、史志园地等6个展厅组成,征集展出图片660幅。金塔县方志馆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向人们展示金塔的人文自然和历史风貌,为有效收藏、保护、开发、利用地方文化资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并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服务,公众读志、用志开展免费服务,为全社会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服务平台。

(八)相互借鉴,开展学术研讨与文化交流

近年来,金塔县地方史志办公室重视加强史志学术交流,干部职工在《中国地方志》《甘肃史志》《民主协商报》《酒泉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学术论文及文史类作品31篇。其中:《荒漠戈壁绿意浓》荣获国土资源部“土地管理与新农村建设”有奖征文二等奖。2013年8月,金塔县地方史志办与县文体局、文物局等单位联合筹办举行了“中国·金塔居延遗址与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有220多名中、外专家学者参加了学术研讨会,大会举行专题报告会9场(次),收到学术论文165篇。2014年金塔县方志馆先后接纳省内外专家学者及本县文史爱好者560多人(次)。加强了学术交流,拓展了史志领域。

三、在探索中求突破,为地方史志工作寻求编纂方法

作为新时代的地方志编纂机构,要在提高地方志书的编纂质量、探索地方志书的编纂规律上下功夫,要做到开拓创新、标新立异,应注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求突破:

(一)提纲挈领,在编纂体例上求突破

以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中指组《地方志书质量标准》为指导,坚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

人,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用高尚的情操塑造人,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理念,坚持依法修志、以事行文、以事记人。编纂过程中要横分门类,以事类篇,显示社会的横断面;横串竖写,以层深入,揭示事物的兴与衰,要图表随文、附录殿后,反映时代的全貌。要彰显特色,在时代特色上突出新思想、新观点、新风格;在政治特色上突出新使命、新方略、新成果;在思想特色上突出新思潮、新观念、新时尚;在发展特色上突出新目标、新任务、新成果。所编纂的志书要靠序、述、记、志、传、录6个部分构筑全书:以“序”开篇,带起全书;以“述”接继,展现全貌;以“记”为经,综记大事;以“志”为纬,分事详述;以“传”为翼,展示人文;力争使编纂的作品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完备、行文规范;语言规范、特点突出;编校精细,印制精美。

(二)广征博引,在猎取资料上求突破

搜集地方志书资料时要运用书证、物证、人证、理证、官证等五种考证方式,按照先内后外、先近后远、先易后难、先普查后细查、先口碑后文献、先文字后实物、先直接后间接的“七先七后”程序和网上查阅资料、电话核对资料、翻录档案资料、购买现成资料、索取信函资料、获取口碑资料、实地考察资料、互相交流资料等“八种方式”搜集整理资料,确保所征集编纂的资料完整、可靠、真实。在考证鉴别资料时要坚持“五个为准”:即图书资料与档案资料发生矛盾时,以档案资料为准;内部资料与外部宣传资料发生矛盾时,以内部资料为准;亲身经历资料同旁证资料有矛盾时,以亲身经历资料为准;统计数据不统一时,以正式公布的统计资料为准;内部刊物与公开发表刊物有矛盾时,以公开出版物为准。

(三)循序渐进,在编纂环节上求突破

在志书编纂时,要按志书编纂的规律,认真把握好确定体例、拟订篇目、搜集资料、编写长编、撰写志稿、总纂定稿、付梓成书“七个环节”,尤其要把好总纂定稿关,总纂就是在各分志分纂初稿的基础上,进一步编辑加工、删繁就简、斧削笔润、去芜存菁、精雕细刻,统一风格、由璞至玉的过程。因为众手修志将会出现:体例不规范,有悖志体;文风不统一,风格不协调;交叉重复,一事多记;前后

抵牾,互相矛盾;画蛇添足,随意省略;重要史实、记载有误;数字不准,影响使用;校勘粗疏,鲁鱼亥豕等问题。总纂时要按照已定的全书宗旨、体例等原则将分工编纂的各部分志稿合成一书,使全书各部分衔接呼应自如,风格协调,笔法一致,将原来分散的各部分统一为一个浑然一体的有机整体。

(四)反复推敲,在表述语言上求突破

作为编纂人员,要不断提升语言文字能力,不断塑造史学修养能力。要使方志语言简明扼要,文约事丰;讲求文采,语言优美;画龙点睛,突出重点;流畅可读,通俗易懂;讲求修辞,规范行文。要从七个方面删繁就简:即总结性语言应删;文件式语言应删;政治化语言应删;评论式语言应删;词典式语言应删;背景式语言应删;描述式语言应删。通过正确地运用语言,加强志书的科学性,突出志书的时代性,增强志书的地方性,扩大志书的适用性。史志工作者要不断地加强自身修养,秉笔直书,从善如流,光明磊落,做到不曲笔、不阿时、不溢美、不贪功、不掠美。要书品、诗品、画品、人品“四品”至上;要才气、灵气、神气、骨气“四气”当先。

(五)循序渐进,在编纂程序上求突破

在编纂志书过程中要遵循修志规律,正确处理好“八个关系”,即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关系;速度和质量的关系;分编和总纂的关系;会稿与终审的关系;终审与印刷的关系。要重点解决记述不全面、重点不突出、特色不明显、文风不对题、记述“官”样化等“五个问题”。总纂时要把旧志缺漏的内容补上;把时代发展变化的内容续上;把初稿中错的内容修正过来。要突出记述新时代、新事物、新特色、新变化、新问题等“五个新”。要做到通览全书,决断是非,把好政治关;分合取舍,终定篇目,把好体例关;查核资料,精益求精,把好史实关;斧削笔润,精雕细刻,把好文字关;横打竖克,总分相符,把好数字关;精校精勘,一丝不苟,把好勘校关等“六个关口”。严格遵守社会公德、恪守职业道德、弘扬修志美德,倡导写好事不夸张、写难事不推

透、写大事不武断、写小事不马虎、写关键事不坏人。

(六)突出特色,在侧重解决问题上求突破

二轮志书在编纂时要秉承和发扬一轮志书的优秀编纂成果,要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突出特色。一要设置无题小序,注重解决续志与前志的衔接问题。二要设立改革发展篇,注重解决续志突出时代主旋律的问题。三要设置居民生活编,注重解决续志“以人为本”的问题。四要适当侧重文化,注重解决续志展示地域文化特色的问题。五要彰显县域名片,注重解决续志展示主导产业的问题。六要加大图片用量,注重解决续志图文互补的问题。七要挖掘隐形史实,注重解决续志内容残缺不全的问题。八要设置前志补遗勘误篇,注重解决前志的缺憾问题。九要全新装帧设计,注重解决续志反映地域风貌的问题。

(七)精雕细刻,在三审定稿上求突破

在志书编纂过程中要坚持做好初审、复审、终审为主题的“三审”工作,要采取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群校法等“五种校对”方法,反复修改、精雕细刻。终审定稿时志稿必须做到“齐、清、定”。齐,即文字稿、图片、照片、地图、表格等齐全不缺;清,即清样稿字体、字号、版式、纸张大小按统一标准排版;定,即志稿不再有较大变动。

四、在奋进中寻规律,为地方史志工作总结实践经验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我们在十多年的地方史志编纂实践中,有遇到的难题,有碰到的钉子,有受到的启示,有学到的知识,有悟出的道理,有烦闷时的苦恼,有丰收时的喜悦。可以说“修志艰难坎坷多,下催上请费唇舌。留得邑史千秋在,功过何须自己说”,我们深切地体会到:

(一)认真学习贯彻《条例》,是做好修志工作的强大动力

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实施,对于实现依法修志,保障史志工作健康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在实践中通过健全制度学《条例》,明确内容学《条例》,创新方式学《条例》,结合工作学《条例》,坚持做到“三个为

主”“三个结合”(以学习贯彻为主,做到学习《条例》与总结首轮修志经验教训相结合;以自学为主,做到辅导学习与读志用志实际相结合;以“学以致用”为主,做到学习法规与正在进行的二轮修志相结合)。要始终坚持史志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两为方向”,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要充分调动修志工作者发扬求实、创新、协作、奉献、实干“五种精神”,积极研讨历史渊源,采撷文化精髓,编纂方志佳作,奉献资政宝典,要走运作规范、管理严格、间接高效的路子,极力追求历史的真实和文本的完美,使所编纂的作品实现为历史作证、为社会留履、为地方写真、为后世留鉴的“四为”目标。修志工作者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所修的志书要有鲜明正确的政治观点,寓褒贬于记事之内,明规律于史册之中,真正发挥地方志存史、资治、教化三大功能。

(二)营造一个多方配合的社会环境,是做好修志工作的关键因素

一轮修志工作结束后,一些县(市、区)撤销了修志部门,二轮修志工作启动后,县(市、区)级地方史志办公室绝大部分重新组建,做为一个新成立的部门,如何实现从无到有、从弱变强、从小变大,必然遇到许多困难和问题。实践告诉我们:创建舒适的工作场所、宽松的工作氛围、良好的工作秩序、融洽的内部关系是起家之本。要坚持做到“六个配合”:即要让单位之间围绕编史修志争取配合;要让同事之间围绕编史修志密切配合;要让社会各界围绕编史修志联络配合;要让上下之间围绕编史修志衔接配合;要让专家学者奉献才智主动配合;要让陌生人士联络感情寻求配合。要集思广益,博览众长,要按照创建“一个机制”(建立员工培训机制)、发挥“两个作用”(发挥好领导干部表率作用;发挥好共产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实践“三个创优”(创优良作风、创优质作品、创优良业绩)的总体要求,既要营造外部环境,又要营造内部环境,鼓励修志工作者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凝心聚力同德;珍惜缘分同伴;携手共进同志;与君共勉同事;精诚团结同心;奋发有为同进;取长补短同学;高风亮节同仁;编史修志同道;劳逸结合同乐;潜心编研同聚;苦尽甘来同感。大家心平

气和、心齐劲一;“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小处着眼,大处着手,逐步创建舒适的工作场所、宽松的工作氛围、良好的工作秩序、融洽的同仁关系,想方设法共同营造出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环境,生动活泼的工作环境和优美和谐的人脉环境。

(三)建立一个团结奋进的领导班子,是做好修志工作的重要保证

在修志过程中,一要组建好编委会。编委会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设法提高决策能力、管理能力、开拓创新能力,坚持领导抓、抓领导,真正体现“官”书、“官”管、“官”修。二要组建好常设机构。常设机构要按照政治素质好、工作业绩好、团结协作好、作风形象好的“四好要求”,当好编委会的参谋,做到参之有道、言之有术、谋之有方、干之有招。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强良好的史学品德、高尚的职业道德、规范的学术公德,树立政治意识、公仆意识、群众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等“五种意识”,坚持做到严格标准、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三要组建好编写班子。编写班子内部要制定明确的目标任务,实行分工负责制。编写人员要按照老、中、青结合,专、兼职结合的原则选配。要真正把熟悉编纂业务,会处理编纂事务,能搞好协调服务的人员充实到史志队伍。要引导编写人员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做事,踏踏实实写稿。要勤奋团结协作,潜心钻研创佳绩。要默默无闻地学习别人的好经验、好做法,拿别人的长处比自己的短处。四要实施修志人才工程。单位领导一定要虚怀若谷、思贤若渴,要有引才、爱才、育才、留才、用才的“五才”意识,要团结和调动各方面的人才一道工作。走出一条团结出人才、团结出干部、团结出作品、团结出精品的路子。

(四)建好一支乐于奉献的队伍,是做好修志工作的基础条件

史志工作是一项艰苦、辛苦、清苦的“三苦”工作岗位。要勉励史志工作者树立安贫乐道、甘愿寂寞、精益求精、乐于奉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坚持做到“三求三不”,即学习上求进步,勤学创新,不吃老本;写作上求严谨,精雕细刻,不滥竽充数;文

风上求灵活,与时俱进,不沾名钓誉。要耐得住寂寞,抗得起诱惑,守得住清贫,经得起考验。在工作中率先垂范,尽职不越位,谋事不谋人,揽事不揽权,干事不添乱,务实不表面,写稿不出错。要从履行职责找位子,当好参谋出点子,多出精品写稿子等方面大显身手,树立认识高一等、学习深一层、实践先一步、写作高一筹的理念,靠“名位常看不如我者,德业常看胜如我者”的心态,迎着清风耐住寂寞,守着书案创造业绩。一要发扬勤学习、勤思考、勤采访、勤筛选、勤考证的“五勤”精神,志存高远,静下心来,下真功夫、苦功夫、细功夫认真学习,独立思考、学用结合、学有所悟、用有所得。二要在工作中养成靠热心编纂、靠细心起笔、靠精心改稿、靠恒心敬业、靠信心求精的“五靠”工作习惯,靠坐“冷板凳”锤炼“热心肠”,靠才智、才学、才能和才华肩负起史志工作这个重任。三要引导修志人员凭着千辛万苦、千言万语、千淘万漉的“三个千万”工作态度,体现勤于思考、善于钻研、精于写作、乐于奉献的“四于”风范,推动修志工作稳步、持续、健康、蓬勃发展。四要引导史志工作者体现出锲而不舍、业精于勤的风范,发扬“五自”(自强、自尊、自爱、自信、自励)“三吃”(吃苦、吃亏、吃事)、“三做”(做人、做事、做文章)的精神,围绕以德为先、以人为本的工作思路,实现“四高”(高境界、高价值、高要求、高水平)。引导文史工作者从勤奋、勤俭、勤劲出发,靠眼勤、口勤、手勤、腿勤起步,在实践中边学、边干、边提高。

(五)形成一套健全完善的工作机制,是修好志的重要环节

做好修志工作,要从“四个解脱”(从“急功近利”中解脱出来,从“官学双得”中解脱出来,从“空中楼阁”中解脱出来,从“层层裹脚”中解脱出来)中解放出来,要始终不渝地坚持走“三共”(资源共享、编修共勉、责任共当)、“四集体”(集体决策、集体智慧、集体创作、集体创优)的路子,树立“四品”(凭仗人品、博采佳品、写好作品、编纂精品)的理念。完善“三众”(众手撰稿、众口评稿、众目审稿)的工作机制,要用“五新”(新理念、新思路、新材料、新方法、新作品)观念,着重把好新编志书的

“五性”(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资料性、可读性)、“六关”(政治关、史料关、文字关、体例关、编审关、保密关),提倡多方钩稽旧史,兼收并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雅俗共赏,秉笔直书,要以“多闻而体要,博见而善择”为立足点,以“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为励志衷言,始终坚持手握笔杆不辍耕耘,锲而不舍勤奋写作。要健全“四个机制”(完善职称评聘机制、考核评价机制、薪酬分配机制、激励奖罚机制),鼓励修志者振奋精神,奋发有为,殚精竭虑,扎实工作。要牢固树立“史志优我优秀、史志兴我光荣、史志劣我惭愧”的史志工作者荣辱观。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为座右铭,多出精品,快出精品,出好精品。

五、在落实会议精神中鼓干劲,努力开创地方志工作新局面

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的颁布实施,为地方史志工作提供了坚强的法律依据,全国第五次地方史志工作会议的召开,李克强总理所作的重要批示,为我们史志工作者指明了方向、出了高招、献了良策、鼓了实劲,尤其是这次西北五省(区)地方志工作协作会议的召开,为我们基层史志工作者搭建了一个相互学习、共同研讨的良好平台,我们感到受益匪浅、很受鼓舞。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义不容辞的承担起传承文明、记录历史、弘扬文化、服务社会、借史鉴今、启迪后人的光辉使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化对地方志工作规律和特点的再认识,打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佳志。要把地方志工作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当中,加快方志馆、地情网站、数据库等基础设施建设,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利用地方志、传播地方志,鼓励和倡导全社会读志、传志、用志,用历史的智慧推进修志体系和修志能力的现代化和科学化。“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殚精竭虑,笔耕不息。志优我优、志兴我荣、志劣我辱。——这就是我们新时代地方史志工作者的庄严宣誓!让我们群策群力、携手共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吧!

甘肃历史文化对 甘肃历代方志编修的影响

车安宁

古书《禹贡》分天下为九州,今甘肃地域大部属雍州,少部属梁州。是故,甘肃古称“雍梁之地”。秦以后,甘肃境内设置陇西、北地二郡。汉武帝始,甘肃境内设十郡,共辖 123 县(时全国设 102 郡(国),1314 县),以后基本延续。唐代曾在此设置陇右道;宋时分属宋、西夏和金。“甘肃”一名始于 11 世纪的西夏时期,取甘州、肃州二地的首字合成,非正式地名。元代始设甘肃行中书省;明代属陕西布政使司、陕西行都指挥使司。清康熙六年(1647)甘肃始复为省,辖今甘肃和宁夏、新疆、青海部分地区,设八府、五州、二厅。光绪十年(1884)分置新疆省。1912 年甘肃又划分为七道。1927 年废道,1928 年分设青海和宁夏两省区。1950 年 1 月 8 日成立甘肃省人民政府至今。

据笔者的研究统计,自汉魏至民国,今甘肃境内可考的方志约 380 多种(部),加上各类图经,地记,乡土志,调查记,采访录,杂志,要览等,约 500 余种,近 5 千卷。其中省志 3 部,府志 32 部,州志 85 部,县志 210 部,厅志 1 部,关镇卫所志 23 部,山水寺庙志 8 部,人物志 11 部,乡土志 17 部,地记 32 部,图经 23 部,调查记 17 部,采访录 4 部,杂记 32 部,要览 7 部,星图 1 部。现存约 300 余部,分散于海内外及国内各地,其余部分,特别是早期志书,只在其他历史文献中有引用或评述,原著已散失难觅。

2013 年,国务院批准建立“甘肃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甘肃成为全国首获这一殊荣的

省份。甘肃作为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其独特的地理区位构成了独特的历史文化。这种文化具有多元性,即由黄河文化、多民族文化、丝绸之路文化、宗教文化、游牧文化、边塞文化等交融构成。纵观甘肃方志的发展,一方面是其独特的历史文化深深地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方志的编修,另一方面,方志的发展也承载和影响甘肃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

一、悠久独特的建置史对修志的影响

甘肃虽然建省时间靠后,但是郡县的建置历史却相当早。这是由于西周时秦人祖先在甘肃东部的天水地区定居,后逐渐东扩发展强盛。秦在战国时期就实行郡县制,而甘肃东部就在其范围内。《史记·秦本纪》载:“秦武公十年(前 688 年),伐邽、冀戎,初县之。”邽县即今甘肃天水市区,冀县即今甘谷县。可见这两个县的设置时间至今已有 2700 多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创立的县的建置。秦昭襄王时(前 326~前 251),又陆续设了西县、狄道、绵诸、义渠、乌氏、临洮、朝那等县,分别归属北地郡和陇西郡管辖。因此郡的建置也属最早。

纂修地方志是与行政建置相联系的,没有行政建置也就无从谈起地方志的编修。甘肃建置历史的悠久,为早期方志的纂修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1986 年甘肃天水市北道区放马滩出土的“战国秦邽县木版地图”(绘于秦始皇八年,前 239 年)和“西汉麻纸地图”(残片,距今约 2200 年)。前者共七幅,按用途分为《政区图》《地形图》和《林木资源图》等,图中线条清晰,粗细不一。不仅标明山川、河流、

居民点、城邑、县乡治所、道路、关口等,还有部分文字说明,并特别标注有山脉整体走向、各地之间的距离和林木种类等,这种地图已经兼有地理、行政与经济的功能。许多学者认为,这可以看作是中国最早的方志雏形。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断,这种形制的地图在当时已经具备较高的测绘水准和容纳较为丰富的内容,应当不是一时一地之作,而是反映出这一区域当时整体的社会管理和文化水平。也不应当是唯一之作,许多类似作品在历史的长河中已经被淹没了。

汉代方志在甘肃已经难以寻觅。至北魏,地理学家阚骃(约375—444),甘肃敦煌人,在当地为官,所著《十三州志》,又称《十三州记》是一部当时的全国地理总志,共10卷,约北凉永和五年(437)成书。以在汉代版图内所设司隶、豫、冀、兖、徐、青、荆、扬、益、凉、并、幽、交13州为纲,逐一记述各地郡县沿革、河道发源及流向、社会风俗等地理人文,为我国古代一部地理要籍。当时全国战乱,政权林立,阚骃以汉王朝所有的州作为地理志内容,弥补了汉代方志流传稀少的不足,同时也反映了当时西部边陲与中原的文化传播并没有断裂,在作者心目中,国家仍是统一的。该志得到学者们的高度评价,影响深远,后人在著述中多有引用。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已在《史通》中对该志的评价是:“地理书者,若朱赣所采,浹于九州;阚骃所书,弹于四国。斯则言皆雅正,事无偏党者焉。”遗憾的是,《十三州志》至宋代佚失。清代甘肃著名学者张澍从《水经注》、《史记索隐》、《汉书注》、《后汉书注》、《北堂书钞》、《太平御览》、《括地志》等大量著作中,辑录出《十三州志》佚文299条,并按地域进行编排,辑成一书,收入《二酉堂丛书》。

北魏时期同为敦煌人的刘昉(约370~440),撰写了古代首部实录性史书《敦煌实录》,共20卷,已佚。主要记载了敦煌地区的历史和人物,后世评价较高。刘昉是十六国时期河西著名学者,沮渠蒙逊执政时,曾拜秘书

郎,专管注记。著《略记》130篇84卷,《凉书》10卷,《方言》3卷,《靖恭堂铭》1卷等,其所作《〈人物志〉注》是古代一部很有影响的注释学著作。

这两部具有代表性的志书是中国方志史上的名志,虽已佚失,但对后世的编史修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之所以如此,与汉武帝时就在河西地区设置四郡是分不开的。历史上凡是治所所在地,也就是一个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敦煌之所以文化发达,就是因为是丝绸之路的节点城市,也是郡一级的行政中心。后来敦煌文书中出土的数种敦煌乃至伊州的志书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明代,明王朝为巩固北部边防,沿长城设九个边防重镇,甘肃镇为其一,驻地甘州,下属一关、十三卫、六十所。这种建置沿袭至清初。故明清两代西北的方志除了传统种类外,还有从体例、格式、内容上完全不同于内地一般州郡志的新的志种,这就是边镇志、卫所志。

边镇志,主要记载边疆国防要塞情况,甘肃可考的有6部,即《甘肃志》2部,《凉镇志》、《甘镇志》、《西镇志》、《肃镇华夷志》(清人改名为《肃镇志》)各1部。还有《陕西行都司志》一部(所述属今甘肃地域,今不存,《四库全书·史部·地理》有存目三列)。所谓“行都司”为明代地方军事机构,下辖多个边镇卫所。这种军管机构,在不设府、州、县的地区也兼理民事和行政职能,故其志也兼记防地范围内其他事宜。在明代各行都司中,只有设在甘肃的“陕西行都司”曾编修志书。

卫所志,主要记述军队的布置。甘肃现存有明代12部卫所志,其中《岷州卫志》3次纂修,《甘州卫志》2次纂修。另有《庄浪漫记》、《庄浪汇记》、《永昌卫志》、《洮州卫志》、《高台所志》、《靖虏卫新志》、《靖远卫志》。其体例以记疆域城塞、兵马刍粮等军事内容为重,兼记戍地风俗、物产、古迹、祠庙、人物、艺文等,书首皆附有戍地详细地图。

明以后,甘肃的部分府、州、县志,在类目中也相应增加了诸如屯田、兵马、粮饷、仓廩、茶马、边墩、塘墩和隘口等门类,在内容上突出了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屯田、边贸、民族关系及边墙堡寨的建筑等,这是一般内地方志所少见的。

由上可见,甘肃早期方志的雏形,在全国属于较早;其早期修志基本也是与中原地区同步而行的;其后期的边镇卫所志等也很有地域特色。所有这些,不仅扩充了中国方志的阵容,并对中国方志的形成与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二、丝绸之路的兴盛与甘肃修志

人们也许会问:“甘肃地处偏远,为什么早期会有耀眼的文化成果?”

其实,除了秦早期对甘肃东部的经营外,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兴盛是一个重要原因。2014年6月,中国与多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文化遗产”项目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从两汉到明代的1500年间,丝绸之路一直连接着内地与西域、中国与欧亚一些国家的商贸交往,不仅为沿线各地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活力,同时也带来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尽管由于各个历史时期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丝绸之路亦时兴时衰,但是它对中西文化贯通的影响力还是巨大的。甘肃东西横贯直线长约1700公里,处在丝绸之路几条不同路线的主干道区域,既是其必经之地,也是最精华的路段之一,其所承受和接纳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影响力也是巨大而深远的。仅以甘肃境内所分布的众多历代宗教石窟来看(敦煌莫高窟、武威天梯山石窟、兰州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庆阳北石窟、平凉南石窟等),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另外,甘肃境内历史上发生的大事几乎都与丝绸之路有若隐若现的联系,而这些事件和人物中的绝大部分,都在各类地方志中有不同的反映。

汉武帝时期出兵大败匈奴,在甘肃河西走廊设立四郡,使丝绸之路为之通畅,大大促进

了汉朝经济、文化的发展。甘肃作为重要的丝绸之路通道,首先受益。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虽然处于政治上的分裂状态,但文化与经济仍然有很大的发展,这与丝绸之路作为贸易与文化交流的通道继续发挥作用,是有直接关联的。但两汉时期甘肃的文化成果,今天已难觅踪迹。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地记”成为甘肃方志的最初形式。

东晋以后,天下大乱,中原群雄逐鹿,北中国处于分裂割据局面,即所谓“十六国”时期。其在甘肃境内建国或版图包括甘肃的王国政权不下10个,除河西五凉(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还有西秦、前秦、后秦、仇池等。南北朝时期,甘肃先后为北魏、北周所据。北魏在甘肃境内设置8个州、35个郡、91个县及河西的张掖、酒泉、敦煌、鄯善4军旗;北周在甘肃境内设22州、56郡、104县。

当时战乱频仍,而甘肃河西地区以凉州为中心,社会相对稳定繁荣,中原世家大族纷纷避难西迁,一时富商云集,学者扎堆,与当地已有的多民族文化再次交融,相继产生出一大批重要的史学、哲学、经学和文学著作等,被史家称为中国历史上独特而辉煌的“五凉文化”。当时五凉诸国都设立史馆,置太史令,专修国史。除了官修,私修数量也很多,也有少量为他邦所录。同时还积极与东晋和南朝保持文化史书的交流。此时期编写的史书数量较大,其中方志的雏形之作地记和传记有30余部。

仓修良著《方志学通论》中有魏晋南北朝时代所产生的人物传记和地记列表,在《地记产生顺序表》中,共列136部地记,其中涉及甘肃的有《西河记》、《秦记》、《秦州记》、《仇池记》、《沙州记》、《凉记》、《凉州记》7种。目前已知甘肃此一时期的方志著作至少有47部,多已佚。包括上述提到的《十三州志》和《敦煌实录》也大致属于这一时期的成果。虽然这些志书大多后世无存,却为以后的《十六国春秋》、《晋书》、《隋书》等的编纂,提供了丰富的

史料,也为甘肃方志发展奠定了早期的基础。

这时的甘肃修志在全国处领先水平,并有一批著名官员学者领衔,除上述阚骃、刘昞外,还有:郭瑀、索靖、索绥、索敞、索袭、刘庆、张谿、张穆、张斌、张湛、喻归、段龟龙、高道让、宗钦、宋繇、宋纤、汜腾、祁嘉等,可谓群星灿烂。他们勤奋好学,著书立说,兴办学校,聚徒授业,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作出了巨大贡献。

此时由于政治分裂,中原政权对经营西域和丝绸之路的能力削弱,但是这个时期的丝绸之路并未中断,有些方面还呈现出十分繁荣的景象。据说,中国的蚕丝技术就是在这时期传入西方的。

我个人认为,“五凉文化”的兴起,既与中原战乱,大批内地大户迁徙甘肃河西地区有关,也与丝绸之路的对河西的持续影响直接相关。五凉文化氛围下的修志活动,既保存了内地的文化,也彰显了河西地方文化,在方志的体例、传统等方面,可以说承袭了中国修志的道统。虽然整本留存较少,但能被后世史家引列,说明影响不小。再比如,甘肃古代方志保留了许多中外交往的资料:敦煌文献中的中外交流资料自不待言,《肃镇华夷志》中又有《西域土地人物略》,研究认为是元末明初丝路走向的最重要资料。

隋统一全国后,置州 197 个,县 1255 个。在甘肃境内有 23 州,辖 70 县。后又改州置郡,甘肃置 17 郡,辖县 85 个。

唐朝划全国为 10 道,以道统州。10 道在甘肃境内有关内道、山南西道一部分及陇右道大部分。关内道在甘肃境内有 5 州,山南西道有 3 州,陇右道有 16 州。

隋唐时期丝绸之路再次兴盛,同时中央王朝也十分重视修撰地志,并对地方政府有相关的规定和要求。

隋大业五年(公元 609)六月,隋炀帝御驾亲临甘肃张掖,登焉支山,参禅天地,并主持召开了由西域 27 国君主、使臣、商旅参加的商贸大会,安排部署加强通商事宜,史称“万

国博览会”。

当时,朝廷派官员裴矩(547~627)到张掖总管两域互市,他往来于张掖、敦煌之间,利用掌管、监护贸易的便利,广泛接触西域商人,了解了当时西域 44 个国家的政权法典、风俗物产、君长姓族、山川道路等情况,搜集整理成《西域图记》三卷,并附详图,记述了由敦煌为总出发点,通往西域诸国的 3 条不同商道。这本书成为记载丝绸之路通商情况的重要志书。

唐代对丝绸之路的经营更是倍加重视,使之更加通畅和拓展。此时甘肃的方志编修也进入重要发展时期。“图经”的编修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形式。甘肃可考的志书有 23 部。其中《沙州都督府图经》《沙州地志》《瓜州伊西残志》《敦煌名族志》《沙州城土境》《敦煌录》《寿昌县地境》《西州图经》《雍州图经》《陇右图经》《西凉录》《后凉录》等尚存残卷,从不同角度记载了中古时代西北边陲的历史、地理、物产、文化、宗教等,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面貌。另外还有:《河西人物志》《敦煌新录》《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等,均已佚。

可以说,隋唐王朝对丝绸之路的经营,不仅带来经济的繁荣,也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甘肃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自然受益匪浅。虽然甘肃不处在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但是修志的步伐并未落后。

三、敦煌文献与甘肃方志遗存

甘肃敦煌因地理位置独特,汉武帝时就设为河西四郡之一,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而后由于莫高窟的扩充建设,敦煌不仅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符号,且成为世界级的人类文化宝库。

敦煌文化延续至今已近两千年,对于甘肃的修志有过什么样的直接影响,我们一时说不大清楚。特别是由于地处边陲,历史战乱较多,在甘肃境内编修的众多史志书籍大多已经荡然无存,有些甚至连存目都没有留下。但是敦煌文献的发现,却为我们揭示了相当部

分的方志书稿的存在。

所谓敦煌文献是敦煌莫高窟出土的东汉至元代(2~14世纪)各个不同时代、多种文字的古写本和少量印本文献,又称敦煌文书、敦煌写本、敦煌遗书等。被称为中国四大文化遗产之一。最早由道士王圆箎于1900年发现于莫高窟17窟藏经洞(过去敦煌文书专指藏经洞文献,后有所扩展)。1944年在莫高窟土地祠塑像中、1965年在莫高窟122窟前及北区又分别续有发现,以后在敦煌境内烽燧、古墓葬等遗址中也有少量出土,总数超过5万件,其中汉文写本在4万件以上,也有用多种古代少数民族和西域文字如吐蕃文、于阗文、龟兹文、突厥文、回鹘文、梵文等写成的典籍和文件。敦煌文书多为手写文本,也有少量雕版印刷本和拓印本、木刻本、刺绣本、透墨本、插图本等,装订多为卷轴式,还有梵筐装、蝴蝶装、册子装、挂轴装和单张零星页等形式。记述时限最早为西凉建初元年(405),最晚为宋咸平五年(1002)。后北区出土者,时间延续到了元代。其中80%以上为宗教典籍,其中有一部分是久佚之典。

世俗典籍除经、史、子、集外,其余为官私文书、医药天文、非汉文文书等。其中的符、牒、状、帖、榜文、判辞、过所、公验、度牒、告身等,多是古代官府的原始档案等。有部分为历史地理文书,可分为全国性地志和地方志。全国性的地志文书有《贞元十道录》、《诸道山河地名要略》、《佚名地志》、《诸山圣迹志》等。地方性地志文书有《沙州图经》、《沙州都督府图经》、《沙州地志》、《沙州伊州地志》、《沙州城土境》、《敦煌录》、《寿昌县地境》、《西州图经》、《雍州图经》、《陇右图经》、《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瓜沙两郡史事编年并序》、《敦煌水渠》、《敦煌名族志》、《敦煌氐氏人物传》、《莫高窟记》等。这些图经地志大多未被公私目录所著录。还存有部分游记,如《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西天路竟》、《大唐西域记》、《五台山志》、《往五台山行记》、《诸山圣迹游记》

等。另有存世最古老、星数最多的《全天星图》。

20世纪初,敦煌文献有相当部分被西方探险家掠走,约3.5万件。海外部分分藏于英(约占总量的1/3)、法、俄、日、美、德、韩、澳和丹麦、印度、芬兰、瑞典等国家的博物馆或公私图书馆。近几十年来,中国国家图书馆收了大量散落的敦煌遗书文献,约16000余件。除此外,2010年起,敦煌研究院调查发现,在中国多个省份的地方博物馆、图书馆中,还收藏有200多件敦煌文献未公布或未开展过研究。敦煌文书以内容来分,涉及地理、天文、历史、政治、建置、哲学、宗教、军事、文学、艺术、医学、民族、民俗、语言、商贸、工艺、体育、水利、档案文书等等,广泛反映中古社会的各个方面,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古代综合典籍。现代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门新的学科,即敦煌学。

笔者认为,既然敦煌学包容宽泛,其中也可包括方志学或方志发展史。敦煌文献中发现的涉及甘肃的地志文书有:

《沙州都督府图经》是中国保存最早的图经之一,为残卷。原作于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唐开元及永泰年间又两次重修。作者不详,光绪三十四年(1908)法国人伯希和得自敦煌藏经洞,原稿现存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书中记载天象、盐池、水泽、河堤、城塞、驿路、县学、寺庙、古冢、祥瑞、歌谣以及行政机构和区划等十分“详瞻”,还保留部分新疆域内容。图文并茂,已是较为完备的方志体例。

《沙州伊州地志》唐张大庆编。成书于885年。英国人斯坦因获于敦煌,藏于大英博物馆。共存85行,首部残缺,1~27行记沙州寿昌县地域,28~83行记伊州地域,87~85行为写著题记。沙州部分残缺,伊州部分完整。该图经反映了沙州、伊州的地域、沿革、城镇、交通、烽燧及河流、湖泊、物产等自然环境和民族、风俗习惯等方面不见记载的重要问题。1921年收入《西域考古图记》第4卷图版中。

《诸道山河地名要略》唐韦澳撰,在宋代佚

失。只有第2卷残本。本卷存206行,记载了河东道晋、太原、代、云、朔、岚、蔚、潞等8州府,每州府下详记府州名称、等第、建置沿革、郡望、地名、山川、民俗、物产等情况。

《寿昌县地境》五代后晋天福九年(944)修。完整无缺。此书记载了寿昌县的山脉、湖泊、古迹以及唐鄯善镇附近城池沿革等。其体例,仍沿唐代图经之旧。

《全天星图》又称《敦煌星图甲本》。发现于敦煌藏经洞,约绘制于唐代。为绢本彩色手绘,长1.98米,藏于大英图书馆。整幅星象图从12月开始,按每月太阳所在位置将赤道带附近天区分为12份,每份投影到一张长方形平面图上。共描绘了超过1300颗星,包括人类肉眼很难观察到的微弱星体。在每月星图之间,附有文字,说明太阳在12次起点和终点的度数。同时,北极附近的紫微垣以北天极为中心投影到了一张圆图上。这种星图画法,一直沿用至今。研究显示,敦煌星图上恒星的位置并不是按照仪器测量数据点定,而是用眼睛估计星与星之间的相对距离而描绘的,但极为精细。据推测,这幅星图观测地点的地理纬度在北纬34度左右,观测地点可能是现在的西安或洛阳的观测台。这幅存世最古老的手绘星图,较欧洲发现的星图早几个世纪。

这些藏书说明,当时的敦煌及周边地区,文化发达,交往甚多,有大量的文书在此汇集、交流和保存,并有相应的人才聚集此处。这对于当时方志的编修,肯定是有深远影响的。由于丝绸之路的广泛延伸,当地方志编修的取材、体例、风格等必然会吸收各地的长处。同时,它自身的方志编修模式也会对其他地区产生广泛的影响。因此,敦煌文献中所保留的部分地志文书,虽然数量不多,但是这些方志版本,从体例、格式等方面都对后世方志的编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对于研究我国的方志发展史,还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可以说,敦煌文化的发展,不仅为甘肃历代修志提供了巨大的支撑作用,同时藏经洞

中的敦煌文献也为后人保存了大量的、有价值的方志史料。

参考文献:

郝玉屏主编:《甘肃方志通览》,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

车安宁:《甘肃历史上的方志编修》,《甘肃日报》2013.6.24

车安宁:《方志百科全书·甘肃历代修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

石云涛主编:《三至六世纪丝绸之路的变迁》,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

余太山主编:《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中华书局,2003?年

新华网:《甘肃省的历史沿革》,2007.4.24

杨建新主编:《丝绸之路》,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

党慧:《隋炀帝为何在张掖召开“万国博览会”》,《新旅游报》?2007.6.5

高启安、邵惠莉:《〈肃镇华夷志〉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

《甘肃省志·民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

(作者系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甘肃省政府参事)



领导群体是方志事业的重要主体之一

朱 奎

地方志既是中华民族独特的身份标识,又是方志文化在中华文化上的充分展现。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重要一方面,方志文化虽然为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精神动力,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其他各项事业的快速推进,尤其是经济的高速发展,作为文化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方志文化暴露出相对滞后的一面;而在与世界文化强国的竞争中,方志文化独特的优越性也没能充分转化为现实。要改变这种局面首先需要准确定位其建设的主体。纵观方志事业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领导群体在其中发挥着独具特色的作用,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方志事业建设的重要主体之一。

一、领导群体是方志事业的领导者

地方志作为一种官书,是由官方出面组织编纂的。中国两千多年来编史修志绵延不断,正是基于各级行政长官重视、支持的结果。历朝历代,朝廷有“史官”,有国史院,设编修官,专修国史及“一统志”等;地方省、府、县各级设编修机构,名称虽不一,但统修地方史志的职责,代代相沿。传统地方志一般由地方长官主修,临时罗致人才,建立编写班子,事成即散。鉴于此弊,清代章学诚提出“故州县之志,不可取办于一时,平时当于诸典吏中,特立志科”的建议^①,并没有受到重视。近代也有人提议:“县之修志,长期积累易而临事采辑难,虽极致精,终不能无疏失;必职有常设,责有专承,凡县事之应记者,日记而岁会,乃可综合不遗,以待造作。”^②然而,同样未能产生实际效果。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专门调阅圈点了《四川通志》《华阳国志》《蜀本纪》《灌县志》等一批史志,并辑选有关内容转发与会同志,倡议各地要编修地方志。^③同年4

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全国委员会的一次茶话会上说到“过去编的府志、县志,保留了许多有用的史料。收集旧社会的典型事迹也很有价值。如近百年来有代表性的人物、家庭和家族的情况,就值得研究,看看它们是如何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同年8月,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要系统整理地方志,把地方志中关于经济建设、科学技术资料整理出来,做到古为今用。^④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下,地方志小组应运而生,负责全国的修志工作。1958年6月,时任国务院科学发展规划委员会主任的聂荣臻聘任了侯任(仁)之等一批著名学者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地方志组组员。同年10月20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地方志指导小组制定了《关于新编地方志的几点意见》,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关于编修地方志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仅两个月,北京市就成立了以市委书记邓拓为组长的《北京志》纂修领导小组。截至1960年,全国新编地方志事业蓬勃发展,20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530多个县着手编修地方志,其中250多个县写出了初稿。《湖南省志·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1959年2月版)成为新中国第一部正式出版的省志。1981年7月,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1985年更名为中国地方志协会)。1983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恢复了50年代设立的地方志小组(4月,更名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其主要任务是:从政策上、业务上对各地修志工作进行指导;定期向中央、国务院反映全国地方志工作的情况,并就修志工作中涉及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及时请示报告;拟订编修新方志和整理旧方志的规划,制订编修条例;组织修志工作的经验交流,协助地方培训修志工作专门人才等。^⑤1985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1985]33号文件,要求:“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应

当从政策上、业务上指导各地修志工作”，大大推动了地方志工作在全国的开展。随即，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志机构纷纷设立，编修新方志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职责，并启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修志工作。

地方志工作的正常开展需要具备几个条件：建立组织机构；落实经费；建立修志队伍；创造办公条件等。这几个方面，如若落实到位，没有领导施以影响，那是不可能搞成的。1987年5月，江泽民就如何加强领导，搞好方志工作明确提出三点要求：各级领导要重视地方志工作；要切实解决修志工作中的一些实际问题；逐步建立起一支精干的修志队伍。^⑥1996年5日，李铁映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修志工作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事，而是各级政府的职责，主要是省、市、县三级政府主要领导同志的职责，是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坚持‘一纳入’，即把修志工作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各级政府的任务之中。要坚持‘五到位’，即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经费到位，队伍（特别是职称）到位，条件到位。要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专家修志，三审定稿制度。方志是‘官修’的地情书、国情书。对各级政府领导来说，修志可以说是‘官职’、‘官责’。各级领导在这方面不能疏职，更不能使这项事业废弛。”^⑦正是由于自上而下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关心，“把地方志工作摆在一个应有的位置上”^⑧，“并能在关键时候、关键问题上抓一下”^⑨使得社会主义首轮修志的支持度大大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代。

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杨尚昆、李先念、陈云、董必武等先后或题署志书名或题词。据不完全统计，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修志工作的讲话、批示、题笺、作序等，多达243种（次）。^⑩地方志这一项不容易引起重视的重要工作得到广泛关注和重视。胡绳曾指出：“要做好新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关键是加强各地党和政府对修志工作的领导”^⑪。尤其是编修各级政区总结，它涉及各个部门和各个单位，如果没有行政领导首先做好宏观调控工作，那就不可能编出像样的志书

来。这是因为，编修地方志“牵涉到各行各业、各条战线，必须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才能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地开展起来。”这样就“势必要发动各条战线上的各个部门和各个单位，组织相当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大协作。如果离开党的领导，没有行政权威，既无法分工，也难以协作，只能是纸上谈兵。”^⑫基于这一点，首轮修志中，有不少在地方上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领导，参与了修志的组织领导和编纂工作。省一级有邵文杰（曾任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元芳（曾任陕西省委书记兼西安市委第一书记）等，市一级有陆天虹（曾任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分部长、市委副秘书长）、陈晖（曾任苏州市副市长、《苏州市志》总纂）等，县一级则有蒲宗亮（曾任贵州任怀县副县长、《仁怀县志》主编）、韩春华（曾任山西曲沃县政协副主席、《曲沃县志》副主编）等^⑬。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四川省地方志编委会原主任、《四川省志》审核委员会主任郝炬受四川省委的委托，受老领导的嘱托，与地方志为伍前后达16年，领导和组织了四川省地方志工作，逐一审读修改了《四川省志》计79卷、4500万字（成书字数）；为《四川省志》作序并为各卷及重大活动、人物写诗计100首。^⑭

民国方志学家王葆心说：“修志之役，创始为难。”^⑮那么，获得领导认可和支持就是修志工作得以开展的第一步。社会主义首轮修志的实践已充分证明，没有领导重视、关心和支持，没有强有力的专职机构和人员，修志活动是无法进行的，发展方志事业更是一句空谈。

二、领导群体是方志事业的组织者

从地方志发展的历史看，修志能历代相传、经久不衰，关键在于历朝历代都把它纳入到政府工作之中，设有专门的机构负责编纂工作。例如，明清时期所修的省志，一般都是皇上“诏天下，纂辑志书”，省一级的最高官吏承担领导工作，行政长官聘请有一定名望的，或者是亲信的士绅为主纂，再由主纂聘请若干人组成通志馆。一般通志的总裁、总纂或副总纂，都是由一省的总督或巡抚担任；提调、监修、督修或总校、采访等也由其他官员担任，因而当时的志书就呈现出鼎盛局面。由此可

见,政府在修志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组织、监督作用。

究其原因,这是由地方志性质决定的。首先,地方志书是资料性文献,在内容上要全面系统、准确,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充分反映事物的发展过程。这就要求编纂者除参考当地一般文献资料外,更多的是要靠地方政府的文件档案资料及实际采访等。由政府组织主持编纂,既便于查阅档案文件资料,更利于动员社会力量参加修志。其次,地方志书是一方之全史,一地的百科全书,内容的广泛性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只有依靠社会各行各业的支持,才能收集到大量丰富翔实的资料,使志书真实地反映历史与现状。这一点必须由政府组织支持,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向各部门、各单位提出目标任务,限期完成才能做到。第三,志书的编纂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建设工程,要有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作保证。这就要求,省、市、县各级要建立健全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负责同级的修志工作。每部志书的承编单位也要成立相应的修志领导机构,负责承编任务的完成。地方志工作机构负责人实际上履行着多重角色,不仅是新编地方志的直接编纂者,同时也是担负地方志事业科学发展重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社会主义首轮方志编修开展以来,各地修志工作进展情况尽管各有不同,但从组织指导层面上分析,这与地方志工作机构负责人协调处理地方志工作中各种关系的能力和效果有着密切关系。

具体来讲,有几项工作要做好:

(一)组建好修志工作机构。成立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其日常办事机构地方志办公室是开展好修志工作的必要前提。已成立的要及时进行调整或加强,已撤销的要重新进行恢复或补充。接下来就应尽早拟订编修方案,主持组织修志实务。安徽省《濉溪县志续编》能在短短的两年时间(1997年1月,县委、县人民政府联合下文续修县志决定,1999年3月出版)告竣且质量上乘,究其原因“便是建立了一个组织保障系统,建立了一支能连续作战、打硬仗的编写队伍。”^{①②}

(二)调配好修志编写人员。要按照胡乔木所

要求的,“调集有志于此者全力以赴”^{①②}。应重点考虑几个方面:一是必备条件。民国时期方志学家吴宗慈认为:“方志工作,其易事哉?从作方志工作之人选言,其最低限度,非有三十年以上之旧学(即掌故学)根柢,不足以应付过去事物;非有现代多种科学之充分常识,不足以融通现在之事物;而为未来事物植根基,非有史学之研究素质,不足以提纲挈领,拮要删繁,以成专门不朽而切合时代之创作。”^③对于今天而言,修志人员要有高校毕业的文化程度;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要有一定的历史和地理的专业知识;应有一般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要有一些方志和编纂学的基本知识。如果一个人不可能具备全部条件,至少一个小集体是应该具备的^④。除此,最好能有百万字的作品在手。三是精神条件,即要有从事修志工作的真切意愿。修志工作的吃苦、清苦、辛苦、艰苦,决定了修志人员耐不住寂寞、抗不住诱惑,是无法静心修好志的。三是要确定好主编(主笔)。这一点尤其关键。李铁映说过:“专家修名志,名志传千秋”^⑤“名人修名志,高水平的志书需要高水平的人来修。”^⑥“从某种意义上说,主编是这支队伍充分发挥战斗力的主要指挥者,他指挥有方,队伍的战斗力就强,就能克服困难,夺取胜利;反之,则志事难成。”^⑦

(三)创造修志工作的良好条件。2006年5月国务院颁布施行的《地方志工作条例》对政府的职责作了十分明确地规定,即要求各级政府在对待修志工作上,要做到“五个应当”:一是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地方志工作的领导,将地方志工作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二是应当将地方志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并保证按时足额拨付到位。三是应当为地方志编纂人员提供相应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采取措施保证地方志编纂队伍的相对稳定。四是应当支持地方志工作机构加强地方志文献资料整理、保存、开发利用和信息化建设,为社会各界利用地方志文献资料创造便利条件。五是应当对在地方志编纂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和贡献的单位、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一言以蔽之,社会主义首轮修志经验千条万

条,党和政府的组织领导是首要的一条。

当然,在我国修志史中,也存在少数私人修志的现象,但这些人常常是在为官时积累了大量材料,或者与当时官府有着十分密切关系的人,他们或多或少也要依靠政府强大的行政力量来进行庞大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三、领导群体是方志立法的主持者

隋、唐确立史志官修制度以降,历代都把修志作为一种官职、官责,并颁布政令对修志进行统一规范。明成祖朱棣两颁《纂修志书凡例》;清康熙、雍正、乾隆等朝曾多次颁布修志诏谕,甚至,光绪还部颁乡土志例目;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曾一颁《修志事例概要》、两颁《地方志书纂修办法》。这些都对推进志书的编修完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首轮修志工作启动之始,制度化建设不断发展,法制化建设也逐步提上了日程。1984年1月,陕西省地方编纂委员会印发《陕西省地方志编写行文通则》。1985年4月,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全体会议讨论通过《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对全国各地将修志工作纳入法律化、制度化起了示范作用。紧随其后,各省地方志机构纷纷出台了办法、规定等。1985年5月甘肃省人民政府批转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关于甘肃省志编写方案(试行草案)的通知》。1986年10月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关于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工作方案》。1987年8月,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颁布了《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工作暂行规定》。鉴于各省的立规行动,有学者纷纷呼吁:在国家层面尽快为地方志编修立法。1989年第3期《羊城今古》上登载了凌华《国家修志立法刍议》一文,提出应用法律手段来加强对地方志工作的管理,使地方志编纂工作法律化、制度化,从根本上解决修志工作中一系列困难和问题。继而,梁滨久在第5期上发表《也谈“国家修志立法”的可行性》一文,建议“将修志工作管理中比较成熟、比较稳定、带有规律性的原则、制度和办法,由国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作为调整国家修志领导部门、地方组织、团体和个人相互之间在修志活动中的关系的法律规范。”这

样“以保持方志的连续性、提高方志的权威性、真正确立地方志的社会地位,并努力使其成为迫在眉睫的急事、大事,抓紧抓好。”^②

随着修志工作形势的发展,《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的局限性也逐渐显现出来。1995年8月15日,李铁映《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的书面讲话》中指出:“这只是一个暂行规定,缺乏必要的行政权威性,而且有些内容已经落后于当前的修志实践。”“要抓紧做好地方志制度、条例建设、理论建设和队伍建设,使地方志工作真正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一项不可缺少的重要事业。”并强调:“根据当前修志工作的实际需要,应当考虑把制定地方志工作条例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为了规范今后全国的修志工作,使之法制化、制度化,保证修志机构和修志队伍的稳定,提高志书质量,有必要在总结本届修志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关于中国地方志工作条例性文件,报请国务院审批后,颁发各地参照执行。”^③1995年8月17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副组长郁文指出:“需要根据这十几年修志的实际经验加以修订,形势新的工作条例,报请国务院审批,使之具有必要的权威性,推动修志工作的法制化或条例化。”“要做到稳定机构、稳定队伍,就必须努力使修志工作走上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④1996年5月4日,郁文再次强调:“编修地方志是省、市、县三级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应当争取作出相应的规定,制定统一的条例或规定,使之制度化、规范化。”“各地也可以根据此规定(指1985年由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布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注)和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和具体规章,使修志工作更加扎实有序地进行。”^⑤1996年5月6日,李鹏在接见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中指出:“编修地方志制定章程或规定,以便工作有章可循。”^⑥1996年5月7日,李铁映《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一次强调:“要在总结修志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制度,制定法规。”^⑦

在社会主义第二轮修志工作全面展开之初,有人总结首轮修志工作的实践经验,认为地方志

工作面临以下问题：一是地方志工作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单纯靠过去的行政命令方式组织编纂地方志，已难以适应形势的需要；二是由于至今尚无全国性的法律法规可以遵循，修志工作主观性强、随意性大、各地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日益突出，迫切需要通过立法加以规范^②。同时，尤其是将全面转入续志的编修，也确实存在着发展极不平衡、协调很不得力、差距明显拉大等突出问题，加之全国县乡机构改革的推进，县级修志机构面临生存的考验。李铁映曾明确指示：“不能因为机构改革影响修志工作，要把地方志工作作为21世纪文化建设的基础工作，不能中断。”^③但仅限于志界内部传达，知者甚少。

1996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编纂工作的通知》（国办发〔1996〕47号文件），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形势下地方志编纂工作的指导思想、工作任务、编写期、出书质量、队伍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通知》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继续重视地方志编纂工作，切实加强领导”，“把地方志工作列入政府的议事日程。”^④1998年2月，经国务院领导批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布《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对地方志编纂工作各方面的问题作出了更加明确的规定。这是在1985年《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的基础上，总结了十几年来的修志实践经验而形成的中国修志工作的第一个正式文件。

随着形势的发展，地方志工作中的上述规定、办法已不能做到与时俱进了，迫切需要在立法上作出回答。2003年四川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并于2003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第一部由省级人大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法规，对国家和各地的地方志立法工作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2003年7月，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朱佳木牵头，负责起草我国地方志工作第一部法规性文件——《地方志工作条例》。该条例草案经反复修改，多方征求意见，六

易其稿，于2004年提交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三届三次会议讨论。这次会议充分肯定了指导小组办公室为起草《地方志工作条例（草案）》所做的大量工作，强调地方志工作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责成指导小组办公室进一步听取各方面意见并继续修改，待成熟后报国务院法制局。另外，许多省市区人民政府、国务院许多部委局，以及解放军、武警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史志机构，依据《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的精神要求并结合各自的实际，制定出一系列有关方志工作的文件和工作细则。2005年6月，中国社科院起草《地方志编纂管理条例（送审稿）》，报请国务院审议。国务院法制办立即印发21个中央部门和各省级人民政府征求意见，形成《地方志工作条例（征求意见稿）》，后多次征求、吸收有关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最终形成《地方志工作条例（草案）》。

2006年5月18日，《地方志工作条例》正式公布并施行，就地方志工作的内涵与外延、领导体制、经费保障等作了界定与规定。条例的制定，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关于“加强文化法制建设”和“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立法工作”的精神，是新中国方志工作的第一个中央层次的立法，为依法修志、保障地方志事业的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以《地方志工作条例》为起点，许多省级、市县级人民政府也纷纷公布了政府令。据《截至2009年底各地地方志工作法规、规章一览表》披露^⑤，有1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政府，12个市人民政府，4个县人民政府根据《条例》精神，结合各地不同特点作了具体化，公布了关于地方志工作的政府令；有的则是依照《条例》的原则，制订并发布市县的《地方志工作管理办法》等，均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一定的约束力。我国的宪法为制定《地方志工作条例》提供了法律依据，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系列发展地方志事业的方针政策，为制定《条例》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政策依据。方志专家学者和编修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及编修实践，也为地方志立法提供了相当的智力支持。法律上的保障有力推动了我国地方志工作及事业、产业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开创了方志制度化、法制化建设的新

局面。

参考文献:

- ① 章学诚:《州县请立志科议》。
- ② 石国桂:《歙县志·序》。
- ③ 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方志文献汇编》(上)第3页,方志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 ④ 《中国方志文献汇编》(上),第4页。
- ⑤ 《中国方志文献汇编》(上)第251页。
- ⑥ 江泽民:《在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87年5月26日),《中国方志文献汇编》(上)第9~10页。
- ⑦ 李铁映:《求真存实,修志资治,服务当代,垂鉴后世——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6年5月7日),《中国方志文献汇编》(上)第48页。
- ⑧ 《中国方志文献汇编》(上)第178页。
- ⑨ 赵庚奇著:《志鉴志稿》第61页,北京出版社2003年7月版。
- ⑩ 汪毅:《〈方志·中国〉文献纪录片脚本选》,《内蒙古史志》2012年第5期。
- ⑪ 胡绳:《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6年12月20日)。
- ⑫ 《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地方史志学术讨论会会议纪要》(1981年7月25~8月1日)。
- ⑬ 《梁滨久方志文集》第1146页,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6月版。
- ⑭ 汪毅:《〈方志·中国〉文献纪录片脚本选》,《内蒙古史志》2012年第5期。
- ⑮ 王葆心:《方志学发微·纂校专论一》。
- ⑯ 林衍经著:《续志编纂说略》第70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 ⑰ 《中国方志文献汇编》(上)第22页。
- ⑱ 转引自: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编:《方志学基础教程》第383页,中华书局2000年12月版。
- ⑲ 梁寒冰:《整理旧方志与编纂新方志刍议》,《中国地方史志通讯》1981年第5、6期合刊。
- ⑳ 李铁映:《求真存实,修志资治,服务当代,垂鉴后世——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6年5月7日),《中国方志文献汇编》(上)第52页。
- ㉑ 李铁映:《在全国地方志奖颁奖大会上的讲话》(1997年8月20日),《中国方志文献汇编》(上)第56页。
- ㉒ 林衍经著:《续志编纂说略》第202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 ㉓ 李彦桦、张兆明:《应从速为地方志编修立法》,《中州今古》2001年第5期。
- ㉔ 《中国方志文献汇编》(上)第41~42页。
- ㉕ 《中国方志文献汇编》(上)第95页。
- ㉖ 《中国方志文献汇编》(上)第118页。
- ㉗ 《中国方志文献汇编》(上)第13页。
- ㉘ 《中国方志文献汇编》(上)第51页。
- ㉙ 2006年5月30日国务院法制办就《地方志工作条例》答记者问。
- ㉚ 邵长兴:《2000年中国地方志十件大事》,《中国地方志》2001年第5期。
- ㉛ 《中国方志文献汇编》(上)第242页。
- ㉜ 《中国方志通讯》2010年第2期。

(作者系新疆察布查尔县委史志办主任)



北凉创建者——沮渠蒙逊传略

沮渠蒙逊(公元368~433年)临松(今民乐南古城)卢水胡人。十六国时期北凉国创建者。匈奴有左、右沮渠官职,蒙逊祖上世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名为姓氏。祖辈世居卢水(《明史·地理志》称甘州左卫东南有卢水,亦曰“沮渠川”)为酋豪。祖父祁复延,封狄地王。父亲法弘袭爵,并任前秦苻坚的中田护军。父卒,蒙逊代父领部曲。“蒙逊博涉群史,颇晓天文,雄杰有英略,滑稽善权变”,为诸胡所推服。后在后凉吕光部下任职,为避其猜忌,常游饮以自晦。东晋隆安元年(397年),吕光派其子镇东将军吕纂攻打西秦,同行者为沮渠蒙逊伯父(后梁尚书)沮渠罗仇,结果被西秦伏乞乾归击败。吕光听信谗言,将罗仇及其弟鞠粥杀害,朝野震动。沮渠蒙逊不动声色,只请准将罗仇、鞠粥二伯父遗体送归家乡卢水安葬。蒙逊借机动员宗族万余人,攻破临松郡杀了中田护军马邃和临松令井祥,屯军金山。后兵败勿谷(今山丹县南),逃避于南山。其时,蒙逊从兄沮渠男成,响应蒙逊起兵,率部众数千,击杀酒泉太守垒登,与蒙逊共推建康太守段业为“大都督”“凉州牧”,建元“神玺”。段业以蒙逊为“镇西将军”“张掖太守”,男成为“辅国将军”“酒泉太守”,委以军国大任。398年,蒙逊攻取西郡,晋昌、敦煌二郡也归降段业,蒙逊以功封“临池侯”。后凉吕弘弃张掖东走。399年,段业称“凉王”,改元“天玺”,迁都张掖,以蒙逊为“尚书左丞”。段业惧蒙逊雄武,改调蒙逊为“临池太守”,又调为“西安(今甘肃张掖东南)太守”。隆安五年(401年),蒙逊诱使段业杀男成,又借口段业枉害忠良,率众攻入张掖,杀段业,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张掖公”,改元“永安”,史称“北凉”。蒙

逊建立北凉政权后,旨令举贤任能,起用“博通经史,才藻清贍”的张穆为“中书侍郎”,委之机密重任。严于执法,法不避亲,处置横行霸道的伯父,又注重发展农业生产。为摆脱四面受敌的困境,他采用“远交近攻”策略,遣使通和后秦,称臣于姚兴。东伐吕隆,西拒李暠。蒙逊欲图姑臧,与南凉主秃发傉檀相攻,数败之。终于411年进据姑臧。412年,蒙逊称“河西王”,改元“玄始”,置百官,修宫殿。蒙逊与西秦互有征伐,又屡败西凉李氏。420年,西凉主李歆中伏而死,蒙逊入据酒泉。421年,蒙逊亲率两万大军攻克敦煌,灭西凉。原西凉名儒宋繇、刘昞,蒙逊均聘之重用。此时,西域诸国皆臣服于蒙逊。北凉极盛时,拥有武威、张掖、敦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乐都等郡。蒙逊还称藩于东晋、刘宋,互通使节,拜受凉州刺史等官职。刘宋封蒙逊为“河西王”。蒙逊为人处事能玩弄权术,亦颇有治国之才。重视文化,爱惜儒士,历为史家称道。蒙逊笃信佛教,厚待高僧,翻译佛经,兴建佛寺,开凿天梯山石窟。北凉的儒学与佛学,对北魏文化影响深远。北凉义和三年(433年),蒙逊病逝,终年66岁。在位33年,葬“元陵”,谥“武宣王”,庙号“太祖”。沮渠茂虔(?~439年)又称“沮渠牧犍”,蒙逊第三子。聪颖好学,和雅有度量,曾任酒泉太守。蒙逊卒,继任河西王位,在位7年。当时河西是“五凉”以来人文荟萃之地,南朝宋的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则是东晋以来南北学者云集之处。两地学术发展各有特点。茂虔开展两地学术交流,主动送与南朝《时务论》《十三州考》《文检》《亡典》《魏驳》《周髀》《甲寅元历》等河西学术论著7种145卷,其中《周髀》这一算学著作是当时超前的科学

论著。同时从南朝选要回晋朝《起居注》等诸杂数十种,使双方文化得到互补。并派沮渠金声等高僧前往建康交流佛学,发展文化事业。茂虔在位时,自兼“凉州牧”;以其弟无讳为沙州刺史,都督建康以西诸军事、酒泉太守;以其第六弟仪德为“秦州刺史”,都督丹岭以西诸军事、张掖太守。北凉沮渠牧犍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农历闰八月,北魏灭北凉,执茂虔以去,后被杀害。仪德弃张掖奔无讳,无讳又弃敦煌西奔,辗转于公元442年据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立国。无讳遣使通南朝宋,宋封其为河西王,公元444年卒,其弟安周代立,亦受宋封“河西王”。公元460年柔然攻高昌,安周被杀,沮渠氏灭。史宁(?~563年)字“永和”,建康表氏(今高台县骆驼城)人。曾仕于北魏、西魏和北周。年少即以军功官拜别将,迁直阁将军、都督,宿卫禁中。不久,加封持节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充荆州刺史贺拔胜军司。北魏永熙三年(534年),孝武帝败奔长安,宁随贺拔胜投梁。西魏大统二年(536年),自梁

归西魏,晋爵为侯,增邑三百户。后迁车骑将军,行泾州事。大统十二年(546年),转凉州刺史,前凉州刺史宇文仲和聚众起事,宁率军平定,以功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晋爵为公。大统十六年(550年),宕昌王(弥定)宗人獠甘作乱,宁率军平定,诏令率部镇守河阳(今河南省孟县西)。西魏废帝元年(552年),柔然抄掠河西,宁率兵邀击,俘获数万人,晋爵安政郡公。西魏恭帝三年(556年),宁奉诏率骑与突厥木汗可汗合力进击吐谷浑,取吐谷浑旧都树墩等城。木汗可汗称宁“此中国神智人也”,遂赠马匹、羊只等物。宁还州后,奉命入朝。四年(557年),西魏大将宇文觉废恭帝(拓拔廓)建立北周,拜史宁为小司徒,出为荆、襄、浙、郢等五十二州及江陵镇防诸军事,荆州刺史。后奢纵贪浊,不修法度,声名大损。北周武帝保定三年(563)卒。赠谥曰“烈”。

(省地方史志办公室陈谦整理)

(接 38 页)

案局的负责同志前往深圳,参加一个“国际档案情报及办公系列用品展销会”。相逢有缘。初次会面,志纯同志给我的印象是敦厚、诚朴、善解人意。往后的数年间,通过参加省上召开的有关档案工作会议,或参与地、市、州档案工作互查活动。发现他好学深思,勤奋、写作能力强,论述颇丰。著有《档案文存》一书,给广大档案工作者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

1994年起,他参与编写《张掖地区志》的工作。挑起了办公室主任、主编的重担,默默无闻地在平凡的岗位上无私奉献了16个春秋,为张掖人民的文化工程做出了贡献。他在负责组织指导各市县修志和在雕琢《张掖地区志》工作期间,还组织有识之士,精心编辑整理校点了《甘州府志》《重刊甘镇志》。由他主编(有的是两人合作)的《古诗

话甘州》《实用编写手册》《肃南史话》《肃南裕古族史话》《高台史话》《口碑》等著作,先后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张掖河西印刷厂、张掖市第二印刷厂出版发行。这些不仅为张掖的地方志系列丛书增添了光彩,同时也为河西地区,乃至从事方志工作的同志提供了高品味的,有价值的学习、参考史料。就我而言,他赠送给我他的10多部大作,在审阅武威地区有关方志史料的工作中帮了大忙,解决了遇到的许多疑难问题,真是受益匪浅,借此拙文对志纯同志表示谢意!

“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用史学家范文澜的这两句名言,来赞扬志纯同志的文风,我以为一点也不过分。

(作者系武威市档案局副局长)

《张掖地区志》是一部难得的好书

刘鹏生

编纂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了编修新方志的要求，国务院具体部署了此项工作。从上世纪80年代起，在我省范围内掀起了“盛世修志”的热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掖地区志》三卷本，浓缩了从古到今兴衰与辉煌的伟大历程，叙事宏大，史料丰富，图文并茂，笔调生动而细腻，解读深刻而富有意蕴，凸现了历史发展的主体脉络，再现了张掖地区五千多年的历史演变、地理变迁、政区沿革，是一部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可读性俱佳的近现代历史读物。细心读来，不失为一部难得的好书。

原政协甘肃省委员会主席、甘肃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王秉祥同志《在甘肃省地、州、市、县地方志编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地方志一定要反映地方特点，如果没有地方特点，就失去了它的存在价值。”张掖地处河西走廊中部，既是古丝绸之路东段南、北、中三路交汇重镇，又是必经要道。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精英荟萃，经济发达，物产丰富，人民生活富裕，是享誉中外的“金张掖”。

这部贯通古今的历史巨著，作者从多视角、多层次、全方位将“金张掖”浓厚的文化氛围，含金量很高的绿色经济等突出特色，用流畅的文笔，系统而准确的做了记述。同样，值得称赞的是，志书作者，以红西路军血战河西为主线形成的红色文化作了浓墨重彩的描绘。

从近代以来，英雄的张掖各族人民，在反抗封建社会的压迫，反抗马步芳部的浩劫屠杀付出了

血的代价。1936年底至1937年初，中国工农红军红西路军在张掖地区浴血奋战的时间最长，使数千名英烈的忠魂与这块土地共眠。作为文献资料的《张掖地区志》，从第一编“概述”开始，至第十编“文录”收笔，依据红西路军西渡黄河的由来，挺进河西走廊后与数倍与己之强敌惨烈战斗，表现出的英勇无畏，对党、对人民，忠贞不渝的英雄气概；万恶的敌人，对于受伤、被俘红军战士割头碎尸、活埋等惨绝人寰的罪行；人民群众冒着杀头的危险营救红军失散人员的感人事迹……作了全程记述。

对于红西路军西渡黄河战斗的这段历史，以及对流落在河西地区的红军老战士，由于种种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左”的路线影响下，得不到公正的对待，他们长期受到政治上的歧视，有好多同志生活极度困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的伍修权同志和全国政协委员，已故谢觉哉同志夫人王定国同志在一个金秋的季节，来到了他们曾经战斗和工作过的兰州，实现了他们故地重游夙愿。在参观访问会见一些老战友之后，王定国同志提出趁来兰之机，打算重访一下当年战斗过的地方。这一计划得到伍修权、萧华和有关负责同志的热情支持。于是，她踏上了访问河西走廊、临夏回族自治区和青海西宁市的旅程，在深入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事实求是的将红西路军老战士在政治待遇，生活诸多方面存在的问题向党中央写了报告，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改进办法。这份报告经由伍修权同志送交党中央。党中央负责同志

很重视这份报告,很快作了批示,使数十年来未得解决的问题,获得了解决。张掖地县两级党委遵照省委的统一部署,组织党史征集部门的同志,对红西路军的历史资料开展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征集整理工作。在向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红西路军光辉历史宣传教育的同时,有计划地开展了有历史意义的红色文化工程建设和红色文化系列活动,其主体鲜明,形式多样,各有千秋。《志书》的作者,怀着对革命先烈和革命先辈们无限的敬仰之情,分门别类地将张掖大地上形成的红色文化,载入了流芳百世的史册——《张掖地区志》。

上卷综合编“概述”,简明扼要地将张掖是红西路军浴血奋战过的地方,把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张掖党和人民政府为告慰烈士英灵,纪念先烈的光辉业绩,教育后代所修建的红色文化革命纪念物作了介绍。使读者一看,就知道张掖的人民一直在怀念着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们。第二章“大事记”用6页多的篇幅记录了红西路军挺进河西至战事失利,失散红军将士东返延安,马步芳部惨害被俘红军将士,党中央组织营救红西路军失散人员,以及张掖人民想方设法救护流落红军战士的完整日志。给河西各市县(区)史志工作者和倾心研究编写红西路军史的同仁,提供了准确可靠的历史资料。第六编军事章专设一节记载“红西路军战斗在张掖”。重点写了红西路军进入张掖境内,血战高台,鏖战倪家营、兵败祁连的详细征程。给我的印象,在诸多书写红西路军血战河西的史书中,《张掖地区志》叙述是最清楚的。

中卷第七编,把红色文化作为重点记述。分别为:红西路军战斗过的革命遗址,革命烈士陵园、纪念馆、纪念碑、革命文物。“艺文”章里记述有叶剑英元帅、萧华上将及知名人士为凭吊西路军革命烈士书写的诗词、楹联显得弥足珍贵。“散文”节里收录了党史工作者安文香的《共和国主席的祁连情》,红西路军老战士后代王民生的《康隆寺遐思》的文章,读后深为感动。该编第十一章“地方史志”把“中共党史资料征编”放在第一节,既遵循了编修地方志“略古详今,重在当代”的宗旨,又突出了对红色文化的重视。张掖地区对党史资料的征

编工作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史工作者不辞辛劳赴川陕、鄂豫皖、江西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在搜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编印出版了《红西路军史料》和《中共张掖地区党史资料》1-8辑,加上县(市)党史办编印出版的资料在10多辑以上,字数200余万。这些可称之为红色经典的资料,一一不漏地编辑在《张掖地区志》里,政治意义不言而喻。

下卷,作者在“卷”前安排有三组插图,意蕴丰富,煞费苦心。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组红西路军领导人的红色照片。照片中的一组组人物,值得永远怀念!而一组“二马”部队残害红西路军将士的照片,给人直观的感受是暴露了敌人的凶恶、惨无人道,真是惨不忍睹。翻过一页看到的是一组“原红西路军的当代将帅”的红色照片。这组照片中的98位将帅,都是红西路军的老领导和老战士,是革命战争中的幸存者。红西路军失败后,他们有的爬山越岭,风雪转战,有的通过浩瀚的沙漠,历经千辛万苦,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种种困难,回到延安,回到了党的怀抱。他们是国家的栋梁,军中的骄子,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参加了抗日战争,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率部参加了打倒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的战斗。

著名的德国诗人、剧作家、思想家歌德有句名言“人生最重要的是要有伟大的目标与达到伟大目标的决心”。星转斗移,随着历史的演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鏖战五个昼夜,解放了甘肃省城兰州。是役,除马步芳和他的儿子马继援窜逃广州外,青马集团全军覆没。兰州战役后,由司令员王震率领的左路第1兵团西进青海,跨越祁连山向张掖进军,由许光达司令员率领的右路第2兵团于9月4日兵分两路,沿河西走廊,发起了河西走廊追歼战。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歼灭了国民党逃往河西的残敌。9月21日,第一兵团与第二兵团浩浩荡荡地在张掖会师了。军民同声高呼,天亮了!当年的红军回来了!河

西的人民解放了！张掖的党政军民可以欣慰地告慰12年前长眠在张掖这片红色土地上红西路军的英烈们。

第八编，道德风尚章，记述了张掖人民淳朴、善良、勤劳、勇敢、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舍己救人、拾金不昧、尊老爱幼、家庭和睦、热爱集体、公而忘私等好人好事，他们的事迹感人至深。有了这样的英雄先进群体，就能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促进和谐的良好风尚。“人物”第九编和“文录”第十编，以人物传、人物录、人物简介、人物表和红色电文、红色回忆录，集中记载了红西路军在河西，特别是在张掖地区与马步芳部实战的光辉历程。红西路军在极为严寒的冰天雪地与敌人浴血奋战近4个多月，终因敌众我寡等种种原因失败了。但是，红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对革命无限忠诚，英勇杀敌的英雄气概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赞誉。红西路军在河西的战斗历程，虽然是短暂的，但遵照党的革命宗旨，参照红都瑞金的建党建政经验，先后在永昌、山丹、临泽、高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张掖组织了中共甘州中心县委，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促进了张掖人民的觉醒，在张掖大地上撒下了无数的红色革命种子。红西路军创建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已载入了共和国的历史史册，张掖人民会永远铭记！

盛世修志，意在“以史鉴今，资政育人”。“温史而知今”。今天，我们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和平时期，早已告别了战火的硝烟，但红西路军老战士给我们留下的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决不能丢掉。它们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对这些精神，我们就要用《张掖地区志》提供的红色文化、红色纪念、红色记忆等重要内容作为活的教材，教育干部，教育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意愿，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张掖地区志》是一部文献荟萃，信息量大，内容充实，体系完整的历史巨著。河西的人民都知道，走廊甘、凉、肃三州，从古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数千年里，随着朝代的更迭，其军政建制中心时而在甘州，时而在凉州。为了搜集材料，本书

作者广搜博采，上至远古三皇五帝，夏、商、春秋、战国、秦、汉……。下至碑贴、方志、考古资料，近现代学者论著（汇考、纪略、文录、日记）、历史文献（书、令）、民国时期以来的报告、计划书、决定、指示、总结等无不涉猎河西三州之历史史料。据我粗略的统计，以综合编第二章“大事记”为例，记述与河西、或与武威（凉州）有关联的大事就有97个年份，加上民国时期的19个年份，共计116个年份。再譬如，“古籍选录”[明]“陕西行都司部汇考”，详尽而全面的把河西卫、所的建制沿革、疆域、星野、山川、城池、关梁、公署、学校、赋役、风俗、祠庙（寺观附），以及驿递、兵制、物产、古迹、艺文、纪事作了记载。给现今的武威、酒泉、金昌三市有关区县史地工作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也为续修地方史志提供了科学依据。再譬如，“历史文献”“大通河引水工程计划书”，“当代文选”“资源录”，“古代河西走廊的农田水利”，“甘肃祁连山森林的重要性与生态环境问题”，“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历史沿革和变迁”的几篇论著，都是作者亲自深入实地考察获得的第一手材料，追溯有源，考证有据，给人们提供了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好教材。值得从事农、林、水、畜牧工作者们一读。特别是各级党政领导，要提高对生态环保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在开发、利用、保护祁连山森林和水资源方面有所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演讲中说：“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言以蔽之，我们这一代人，就要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青山绿水。

我说《张掖地区志》好，好就好在领导重视，慧眼识才，选用了一支敬业、善钻研、能吃苦，有相当文化功底的修志队伍（据有关资料披露240多人）。1986年8月，中国地方志学会副会长董一博给甘肃省地方志主编工作会议的贺信中指出：“主编是方志质量的关键人物，所谓‘名志出名手’，‘一代之志须一代之人治之’”。我认为，用董一博选用方志主编的标准要求，张掖的领导选用志纯同志做主编是当之无愧。

我相识志纯同志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1989年3月，省档案局组织各地、州、市档（转35页）

浅谈人物志的写法

童健飞

新方志中的人物志(编),是新方志的重要内容之一,有着举足轻重的份量,不容忽视,如何写好人物志,是当前全国各地修志工作者感到十分棘手的问题,也是争论得比较多的问题之一。现就实践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看法,提出来就教于与专家和同行们。

一、人物志应包括什么内容

人物志,顾名思义就是专门记述有关人物的编章。人物志,一般包括传、录、表三方面的内容,传,就是人物传记,是“记载一人事迹的文字”(见《辞海》);录,就是烈士英名录,包括经县以上人民政府承认的历代烈士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和简要事迹;表,就是历代有影响的知名人士,列个简表记之。

笔者认为,要记述好传、录、表的人物,应注意解决几个问题:

一是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写传的人物,必须是有重大影响的已故者,如著名的革命烈士、英雄模范、乡村教师、医生、能工巧匠、科技工作者、著名诗人、作家等。有重大影响而尚健在的人物,暂不写传入志,其事迹可整理存档,以备选用,否则,生人立传此门一开,难绝请托曲笔之事,会增添诸多不必要的麻烦;况且,健在的人尚有变化,“盖棺”之前有坏人变坏的,也有坏人转化好的,一旦立传成书,就无法更改了。故“生不立传”这原则不能动摇,一动摇则有百害而无一利。至于生人不能入表,目前众说纷纭,说法不一。笔者认为,生人还是不在人物志中入表为好,可分散到各传记中记。其理由后面再说。

二是籍属问题要适当放宽。入志人物,以本籍

为主是对的,但不能排除有贡献的外籍人物,因为一些著名的外籍人物对本地人民可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例如,被中央军委命名为“爱民模范”的解放军某部班长、共产党员戴志敏,对越自卫还击前夕,在广西大新县的黑水河为救两名落水壮族儿童而光荣牺牲。获救儿童的亲人为了永远纪念这位舍己救人的英雄,要求按照壮族的习惯,将他埋葬在村前的河边高坡上,让他们世代能够看到他。开追悼会那天,不仅边防部队、县委、地委、区委派人参加,附近群众也纷纷自动前来参加,达七八千人。大新全县掀起了学习戴志敏同志的热潮,团员和青少年常到英雄墓前开展教育活动。总之,大新人民非常怀念他。但戴志敏是湖南省桃源县人,如果《大新县志》因强调本县籍而不为戴志敏立传,全县人民是通不过的,也会失去一个教育青少年和后代的好教材和机会。把他的事迹寄到桃源县人志吧,当然也可以,但那里的人民对他的感情比不上大新人民这样深刻。这样的先进人物,记在其主要活动地区的《大新县志》上为好。因此,籍属问题只有坚持以本籍为主、兼顾主要活动地区,这样适当放宽,新方志才能更好地起到教育人民、服务当代、促进两个文明建设的作用,也有利于鼓励外籍科技人才在本县作贡献。

三是掌握好反面人物入志的问题。选择一些最典型的地主恶霸、地痞流氓、土匪头子等反面人物立传,是为了从反面教育人民,很有必要;但必须掌握得好,不能为其隐恶扬善,“笔下留情”,也不要写得像判决书那样而应当实事求是,才能起到反而教育的作用。

二、人物传怎么定

这个问题,我们在实践中几经反复探讨认为,首先,要解决好立传的标准问题。入志标准,应当是对推动或阻碍历史发展有较大贡献或重大影响的人物。用这种标准去衡量、支筛选,上下左右的比较,各行各业和对照,特别要注意“眼睛向下”,选择那些为人民群众所亲切怀念的已故“小人物”,为其“树碑立传”,歌功颂德,让其流芳百世,以育后人。还有注意立传人物的广泛性,能够做到各行各业、各乡镇都有一二个人物立传最好,这样新方志所起的“教育”作用就更大。其次,要考虑到新方志人物传与史书所写的传记要求不同,篇幅的限制。第三,为了更好地教育当代和子孙后代,故应当记其主要事迹(指正负面人物),切忌面面俱到,还要写得精粹些、简练些、生动活泼些。人传的人物,其生卒年月、青少年时代的活动、生平、历任职务、主要事迹等方面,都应记述,可根据其贡献和影响的大小,有的写详些,每篇字数当然不应定死。但我认为,以一两千字为宜,只要写得简明扼要,不拖泥带水,这样的字数是可能解决问题的。

三、著名生人怎么记

除了上述传、录、表所要记的已故事人物外,还有尚健在的其他著名人物,如工程师、农艺师、医师、讲师、教授、学者、专家、大学生、留学生、研究生、党政军领导干部、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各条战线的先进人物,知名金石书画家、作家、诗人、民歌手、理发师、缝纫师、烹调师、纺织能手、饲养能手、发明家、棋类名手和能工巧匠等等。这些人物,应否在新方志中记一笔,怎么记?我认为,对待这些人物,应当坚持不能按官职级别来定夺,而应视其对人民有贡献和贡献大小来决定是否记、怎么记。要记的,以分散到各专志中以事系人地记,是完全可以留下其芳名和事迹的,没有必要在人物志中以相当大的篇幅来记载这些人物。其理由是:(1)一个人“盖棺”前生活尚未了结,有坏人变坏也有坏人变好的,一旦入表上志成书,就改变不了。(2)在党政军领导干部中,有一些是在“大跃进”时期靠打擂台上台的,在“文革”中搞打砸抢上台的,靠“活学活用”上台的,在“四人帮”猖獗时靠拉关系上台的,如果让这些人与兢兢业业为人民作出

巨大贡献的干部芳名排在一起,简直是一种玷污。(3)技术职称,国家正在进行改革,逐步废除技术职称终身制,改为聘任制。这样,工程师、农艺师等的职称就不再是终身制,而是常变换的,一旦入表上志成书,就失去现实意义了。有一部县志,在人物志中为生人立表达 480 多人,实在没必要。

基于上述理由,《大新县志》经过权衡利弊,采取了“分彙记述”的办法,即:贡献大的教师在教育志记,医德高、为人民救死扶伤的医生在卫生志记,讴歌社会主义新人的作家、诗人在文化志记,为祖国争到荣誉的体育健儿在体育志记,劳动模范、能工巧匠、战斗英雄、工程师、农艺师、党政领导干部等,分别在农业、工业、商业、科技、政治、军事志中记述,以事系人,详略得当。被自治区树为“学雷锋标兵”的状乡小英雄凌爱珠,15岁时以大智大勇战胜了凶恶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身负重伤仍然不忘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广西日报》《中国青年报》《新体育》等报刊都宣传过她的事迹。但因她尚健在,便没有在人物志中记述,而是放在“青少年”一节中记述她的主要事迹。至于有些不必用文字记述的人物,也可以只用数字表明,如本县籍有多少大学生、留学生、讲师、教授、五级中学教师、三级小学教师、主治医师等,可分别在教育、卫生志中列个表,也可以看出一个县的人才资源情况了,其名单列则放在档案馆以备查。这样根据不同情况分别穿插到各专志中去记述的办法,好处有四:一是能够反映出一个地方的人才资源情况;二是把不宜放在人物志记述的人物分散记述,避免了为生人立传之嫌;三是可以拒绝请托曲笔之事和种种不必要的麻烦;四是让真正对人民作出贡献的人物能名垂青史、流芳万代,使那些庸俗之辈无法沾光,公平合理、人民满意。至于目前有些志书(稿)把各种名人在“人物志”中列表记述的做法,各有不同的看法,值得研究。

(作者系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办原副编审、《大新县志》主编)

汉新兴县治考

谢亚东 裴应东

新兴县,南安郡属,东汉灵帝中平五年(188),析襄武(陇西)、獮道(武山)地置。就新兴县治地学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究其原因,一是唐代以前的《地理志》没有记载郡县的地理位置;二是从东汉后期,经魏晋南北朝,陇右社会动荡,郡县设置不定,名称和治地时有变更;三是史料大量流失,文献记载不一。本文依据《水经注》和有关历史记载,结合近年来考古发现和文物普查成果,以及地理实际,就汉新兴县城治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以就正方家。

《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均无对汉新兴县定位的记载,《晋书·地理志》载:“秦州南安郡,统三县:獮道、新兴、中陶”,却无具体位置。《读史方輿纪要》载:“新兴,亦汉獮道县地,在(巩昌)府西南二十里。”这一说法明显是错误的,依据《水经注》新兴县根本不可能到巩昌府的西南面。清人杨守敬纂疏的《水经注疏》中认为,后汉置的新兴县“在宁远(武山)县西南”。曾担任过定西市博物馆馆长的何钰先生,就此推断今漳县新寺镇一带就是汉新兴城故址的所在。新兴县在新兴川则当是无疑的,而今漳县新寺与新兴川距离甚远,故新兴县不应在此。中国历史地理学泰斗谭其骧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把新兴县标在今武山县鸳鸯镇东南面,但无具体的考证文字说明。

《水经注·卷十七·渭水注》:“渭水又东,新兴川水出西南鸟鼠山,二源合舍。东北流与彰川合,水出西南溪下,东北至彰县南,本属故道侯尉治,

后汉县之,永元元年,和帝封耿秉为侯国也,万年川水出南山,东北流注之。又东北注新兴川。又东北迳新兴县北,《晋书地道记》,南安之属县也。期水又东北与南川水合,水出西南山下,东北合北水,又东北注于渭水。”这段注文描述的是渭河在今武山县界纳人的支流榜沙河流域的地理情况。所载“新兴川水”即榜沙河,“彰川”、“北水”都指今漳河,“万年川水”指今漳县朱家河,“南川水”即今龙川河。榜沙河干流发源自岷县,在武山马力镇西会龙川河,在鸳鸯镇丁家门与漳河汇合后流入渭河。根据《水经注》这段注文描述,盖新兴县治应在“新兴川水”(榜沙河)南面,新兴县治区间就在“彰川”(漳河)与“新兴川水”(榜沙河)两水汇流处至渭水之间。准其地望亦今武山县鸳鸯镇盘古川至广武村一带。

就在今鸳鸯镇广武村与颀家门村之间有块被民间称为“古城下”的平坦方地,该地位于榜沙河南岸的二级台地上,东临颀家门村大沟,北面接官渠,西面和南面是高出地面一米多的残垣,整体呈长方形。武山县文物工作者在第二次文物普查时,测定“方地”东西长186米,南北宽128米,总面积约23800多平方米,残垣高0.8-1.5米,夯土层厚0.8-1米,城址内部地势平坦,遗址上散落有粗绳纹灰陶残片,还有少量瓦当碎片等遗物,由于该地面早已被辟为农田,鲜见暴露汉砖残片。

古城遗址军事战略地位异常重要,距东北面约1公里处,就是金关锁喉,地势险要,号称陇中第一关隘的丘家峡;地理交通非常便利,是古丝绸

之路今陇海铁路必经之地，距离 316 国道也就 500 多米；遗址北面距离榜沙河约 400 米，该城址位于榜沙河注入渭河形成的冲积扇面最开阔处，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发展农业生产得天独厚；古城遗址文化积淀十分丰厚，距西面约 800 米处，就是发现距今 3.8 万年“武山人”头盖骨化石而闻名于世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狼叫山遗址。更为重要的是东面距离古城遗址约 1 公里的广武坡发现了不少汉代墓葬，从埋葬形制及墓体特征（砖式券顶墓）、建筑材料（大青砖）、陪葬品（汉绿釉等）综合判断这些墓葬属于东汉晚期墓。这和也新兴县置县时间相吻合。在东起草沟门北、南到刘家山梁、西延广武梁上、北至天兰铁路以南 100 米处，总分布面积约 60 万平方米的区域，陆续发现了一些砖式券顶墓，表面一般散落有泥质陶片，有绳

纹、弦纹灰陶残片，也有绿釉陶壶、五铢钱等零散文物出土。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 70 年代末，在广武坡麓山儿下修水平梯田时，挖出一片完整的汉代瓦当，现藏武山博物馆，为国家二级文物。瓦体通高 54.5 厘米，直径 18.5 厘米，外圈为卷云纹、弦纹，中间篆书“万年”，取“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之意，这是汉代祈福文化在建筑装饰材上的经典体现，也是武山境内弥足珍贵的祈福文化遗珍，更是新兴县治所有力的实物遗证。综上简述，依据历史地理文献、文物普查、考古发现，结合军事、政治、经济、交通、地理诸因素，今天武山县鸳鸯镇广武村“古城下平坦方地”，应是东汉新兴县治所之地。

（作者单位：武山县文物局）



“永乐关”应为“永乐观”

对红西路军电报中“永乐关”之考辨

朱新斌 郑天水

1936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西征途中布防于永昌、山丹一线。从12月中旬开始,敌前线总指挥马元海奉马步芳限期攻取(永昌)城之命,调集正规军、民团从四面包围,疯狂进攻永昌城郊一带红军防守之地;此时,中央军委计划调动西路军东返应对西安事变后之局势。22日,红西路军总指挥、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红西路军政治委员、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联署致电中央军委:

“马步芳[受]西安事变影响,急欲速战,故企图攻取永昌[城]。因我粮紧迫[欲]西进,近便抽集兵力于凉州,应付时局。敌约两团,昨占永乐关附近堡子,另调马彪部由山丹开往永昌……”。

这份电报中所指“永乐关”究竟在永昌哪个位置?由于永昌境内从古到今从来没出现过“永乐关”这个地名,于是乎各种猜测和推断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最权威、也是得到大多数人认同的解释是出自郝成铭先生主编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2004年·甘肃人民出版社)。该书上卷第493、494页全文收录了这份电报,并对电文中的“永乐关”作出这样的注释:“‘永乐关’,查新旧地方志,永昌一带无此地名,可能是永安堡之误。永安堡,位于永昌县东南部,今为南坝乡政府所在地”。

对此,笔者完全不能苟同。笔者认为:仅仅因为“查新旧地方志,永昌一带无此地名”,就简单的望文生义,把“永乐关”解释为“永安堡”,不仅毫无根据,而且,永昌县南坝乡的“永安堡”其地理位置与当年西路军在永昌县的攻防作战过程及地点风

马牛不相及,此种解释未免太牵强,有主观臆断之嫌。那么“永乐关”究竟在哪?其真实而正确的名称到底是什么?笔者经多年的研究和考证,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永乐关”应该是“永乐观”之误,也就是今天永昌县城北郊1公里处北海子景区内的金川寺。现具体考证如下,以求教于广大红西路军史研究者。

永乐观(金川寺)兴衰存毁之考证

金川寺,为“唐时敕建”,历经五代、宋、西夏、元代,河西地区的诸多战乱纷争、政权更替,无休止的战火兵燹使寺院化为废墟。直到700多年后的明成祖朱棣永乐十二年(1414),在原址上重建寺院,并在原唐佛塔旧址上建成保留至今的明佛塔。因为明朝历代帝王大多崇尚、信奉道教,重建后的金川寺正殿供奉道家始祖老子的金身,由道士居观主持,又由于重建寺观是在永乐年间,故改称金川寺为永乐观也是合乎情理。民间称佛塔为“永乐塔”,寺庙为“永乐观”,这种称谓一直承袭了下来。红西路军当年在此活动其间,将“永乐观”误听或误写成“永乐关”的可能性很大。

敌我围绕永乐观周围之攻防作战

永昌县地处河西走廊的蜂腰地带,自古为军事要塞。县城东、北及东北面的东山头、校场山(海拔1987米)、武当山(海拔2219米)为高山丘陵,三面环绕,是护卫县城的天然屏障。易守难攻,在军事上历来被兵家所看重。县城东郊的二坝河、东水泉流经张家双磨、穿陆家夹道峡谷,与武当山前、校场山后峡谷的金川河汇合,在地形上形成一个三角形地带。只要扼控了武当山、校场丘陵高

地,既可抵抗正面进攻之敌,又可牵制侧翼增援之敌。更为重要的是,防守住东、北两面高地,守住东水泉、金川河,即可确保县城内外千军万马有方便、充足的水源。其次,在二坝河(东水泉)、金川河两条河流上,有地方财主富豪建造的16座32盘水磨(碾),可为驻军昼夜不停地磨面、碾米、榨油,保障城防部队有充足的的后勤补给。而且,永昌城北北海子景区以永乐观为中心方圆五六里之内的20多座寺观庙宇、亭台楼阁和附近的10多处堡寨式民居,更是大部队驻扎防守的理想住所。

1936年11月18日,红西路军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七、二六九团携骑兵师一部在军长程世才率领下攻占永昌县城,先头骑兵师及两个团的部队除留少量控制县城外,大多布防于今北海子一线丘陵高地,驻扎在永乐观(金川寺)以及附近的寺观庙宇中。19日,留二六七团继续守卫县城及城东、城北一线,骑兵师及二六九团沿北线甘新公路直取山丹。继而,后续跟进的红五军、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八团一部从永昌城南、城西形成环状阵容。21日,红西路军总部由凉州(武威)南西移至永昌县城后,虽多次对部队作布防调整,但永乐观(金川寺)为中心的校场山、武当山一带始终由红三十军一部控制防守。

11月23日,红九军分两路由古浪定宁寨转移至永昌境内东寨城(真景堡)及周围民宅堡寨驻守、休整。派出二十五师的一个团接防东十里铺晚阳墩、东山头、东水泉等防地;二十七师布防东寨城以南十多个村庄。由此,红九军形成东西长10公里,南北宽5公里的一道防线,与红三十军一部共同配合行动,担负起保卫永昌县城内红西路军总部的安全重任。

11月23至30日,敌马步芳、马步青部兵分三路,马元海任前线总指挥。第一路由青海南部警备司令部骑兵第一旅旅长马彪、一〇〇师骑兵旅旅长马朴率领,青海民团骑兵配合,穿插迂回于永昌境内红军驻扎地间隙,尾追袭扰红五军,企图围剿红五军;第二路,由马步青的骑兵第五师骑兵旅旅长马禄率领,骑五师韩起禄步兵旅、祁明山骑兵旅一部配合,配备炮兵营,并在国民党军凉州机场

空军十五队三架飞机配合下,向西移至丰乐堡、永昌境内八坝、南庄、七坝一线的红三十军军部、八十九师一个团、八十八师两个团的前沿阵地堡寨村庄发起进攻;第三路由马元海率海南警备旅两个骑兵团、一〇〇师两个骑兵团及青海民团配以骑五师祁明山骑兵旅一个团,袭扰红军,企图切断永昌与山丹红五军之间的联系,分割包围,寻机决战,一举围歼红军。

12月9日,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奉蒋介石“在两星期内攻下永昌城……扑灭红军”的密令,飞抵凉州会见马步青。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扣。红西路军总部根据中央军委电示,向“二马”部及前线总指挥马元海展开停止内战、枪口对外、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信函外交和阵地宣传喊话,但收效甚微。“二马”军队围歼红西路军的野心没有丝毫收敛。12月18日,“二马”联电讨伐张学良、杨虎城,表示继续拥蒋反共的同时,马步芳密令马元海尽快攻下永昌城。于是,马元海召集所率中路军军官会议,布置实施围攻永昌城红西路军总部的计划,并调集先前抵山丹围攻红五军的马彪骑兵旅东返,围攻永昌城。在此战斗中,红九军二十七师师长刘理运、八十一团团长沙永继等牺牲。20日夜,县城东关一线东水泉高地、邬家油坊、东关财神楼及东城门瓮城相继失守。

12月21日凌晨开始,敌指挥马元海又调整重兵,一面继续向校场山、北海子景区的永乐观(金川寺)为中心的寺观楼阁以及武当山寺观全方位展开炮击,继而以步骑兵冲击红军防御工事,另一面调集县城南、西南两翼的正规军和民团向县城靠拢。时近冬至,两场大雪后气温骤降,夜间温度常在零下二三十度,白天也在零下五六度。校场山、北海子景区冰天雪地,哈气成冰。衣着单薄的红军指战员在弹药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仍以顽强的毅力与装备精良的敌军奋力厮杀,危急关头,手榴弹消耗殆尽,机枪缺弹,仅有的步枪也因气温过低、枪膛结冰,枪机失灵,子弹无法射出,贻误杀敌战机。不少战士因手、足、耳冻伤而遭敌杀害。经过一天一夜的苦战,终因寡不敌众,原被红军控制的

校场山、永乐观(金川寺)附近的寺观及武当山 10 余座寺观大部被炮击摧毁焚烧,进而失守。金川河两岸的堡寨式民宅永盛张(家堡寨)、陈家庄、田家庄、魏家庄和下北山坝与二坝河流一带的陆家夹道村庄和杜家庄等也相继被敌占据。二坝河、东水泉张家双磨及金川河流上的 16 座水磨(碾)也全部被敌占领、拆卸破坏。各水磨上未及转运走的 10 多万斤原粮、面粉,连同红军征集、购买、圈养未及屠杀的 60 多头黄牛悉数被敌军掠劫。

此役在当时马步芳所控制的喉舌《青海日报》以及围剿西路军战争结束后汇编的《“剿匪”概述》中有这样的报道和记述:“十二月二十一日,我军占领永昌城外北海子,并乘黑夜击退股匪”,“北海子附近有水磨三十余盘,匪常在磨面。是日夜,被我军击退股匪,并夺获麦面甚夥,足供我前防各部队十日之需”。此报道和记述与红西路军指挥部致电中央军委(22日)电报内容:“敌约两团,昨占永乐关附近堡子……”不谋而合。

12月22日至24日,西路军总部命令各部队集结东返,但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央军委主席团27日又电令西路军继续西征,是日夜,红军突出敌军重重包围,自动撤离县城西进。

由此可见,12月18日至21日,永昌县城以东、以北是西路军与“二马”敌军攻防作战的主战场。电报所提“永乐关”之地只能处于永昌县城附近,而决非他处。

永乐“关”即永乐“观”,而非“永安堡”

综合以上所述,西路军1936年12月中下旬在永昌的攻防作战主要围绕在县城东、北方向,即

北海子一线。其中北海子的永乐观(金川寺)是敌我攻防的焦点所在。且从历史上看,金川寺曾经在某个历史时期被做为道教寺观,叫做“永乐观”,在民间一直存在这个称呼。而“观”、“关”二字同音,只所以产生今天这样的争论,显然是当年红西路军在永昌活动期间,将“永乐观”误听或者误写成“永乐关”。也只有这样的解释既合乎情理,也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

虽然1936年11月中下旬,红三十军、红九军各部队曾派出部队及民运人员到南坝永安堡一带乡村征集、购买粮草、布匹,也曾发动群众建立过几处乡村苏维埃政权。但到12月中下旬,红军与敌军在永安堡一带始终未发生过较大规模的对阵作战,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所以说,红西路军电报中所提“永乐关”,不可能是永昌南坝乡的“永安堡”。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作者未经深入调查考证,主观的把“永乐观”解释成“永安堡”,误把红西路军指战员与马家军浴血奋战的核心地带、主战场“永乐观”(金川寺),转移到与主战场毫不相关、且距永昌县城25公里外南坝乡的“永安堡”,无论从字面讲,还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都无法自圆其说,更与史实不符。客观准确地注释应该是:“永乐关”应为“永乐观”之误,也就是永昌县城北1公里处北海子风景区内的金川寺。

(朱新斌系金昌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辑、郑天水系金昌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洮岷十八湫神

潘硕珍

岷县诗人、学者张大鹏在《龙头高庙一文中写道：“岷县的湫神，自古以来有上十八位、中十八位与下十八位之称。每年农历五月十七上二郎山的湫神为上十八位；每年农历五月十九上龙头高庙（庙址在梅川杏林村，笔者注）的湫神为中十八位；每年农历五月二十三上卓坪（维新乡村名，笔者注）马峰滩的湫神为下十八位。”上十八位湫神，见于《岷州志校注》，分别为南川大爷宗泽、关里二爷庞统、王家三爷姜维、梅川大爷庞统（一说罗成）、河北爷朱云、太子爷范仲淹、黑池爷胡大海、艰难爷张锦、涂朱爷雷万春、金龙大王李晟、崖上阿婆碧霞元君（别称珍珠圣母）、金火圣母、斗牛公主、金花娘娘、奶子娘娘、小西路太太（别称分巡圣母）、透山娘娘和填炕阿婆（封神榜人物高兰英）。十位男神都为历史人物，八位女神，要么是神话人物，要么是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关里二爷庞统，据岷县学者金辅汉考证，原称白马爷，上世纪30年代鲁大昌盘踞岷县城时，将庙址迁到南关里，改称关里二爷。透山娘娘，按照《岷州志校注》记载，庙址在原岷山下下跌马村，原型为地方神话传说中的九头蛇妖。九头蛇妖原在岷县城北岷山朱家沟，经常制造暴雨或冰雹，使庄稼颗粒无收。有一次，她隐身乌云里，发动又一场狂风暴雨时，被齐家寺

的后喇嘛打落马下，从此落足跌马村。九头蛇妖的形象类似共工之臣相柳氏：“共工之臣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山海经·海外北经·共工之臣相柳氏》）斗牛公主，俗称斗牛阿婆，庙址在岷县寺沟乡杨家堡，原型为神话人物三圣母。“玉帝的妹妹瑶姬私自与凡间书生杨天佑成婚，生下杨蛟、杨戩、杨婵三个孩子。玉帝采纳王母的建议，封杨戩为显圣二郎真君，封杨婵为三圣母。”（电视连续剧《宝莲灯前传》）至于她为何又叫斗牛公主，不清楚。张玉仙编著的《法泉禅玉》里提到了与斗牛公主相近的“斗姆娘娘”：“道教女神，传说是北斗众星之母。宋元以来，尊为‘先天斗姆大圣元君’。”奶子娘娘即乃慈圣母，也称奶子阿婆，系地方传说人物，庙址在岷县寺沟乡白土坡村通往杨家寺的半山上。据《岷州志校注》载：“相传明孝宗时期朝廷横征暴敛，百姓不堪其苦，有一老太婆冒死上告，结果，身被害而道义申，孝宗嘉封‘乃慈圣母’。”村庄上头的山沟叫叶家沟，沟口的河岸上有一个背篋大的青石头，据当地人口头传说，那是奶子娘娘的上马石。石面上有三个深浅不一的三寸金莲鞋印，还有放过马鞭的明显痕迹。据当地人说，没有哪家人敢将它运到家里挪作他用。

中十八位湫神,按照张大鹏的叙述,分别是:梅川大爷、玄生大王、红牛龙王、红龙龙王、大乌龙王、黑池龙王(岷县文化局编辑的《岷州花儿》一书写作黑赤龙王,即二爷木吒,笔者注)、水泉龙王(岷县文化局编辑的《岷州花儿》一书写作送子观音,笔者注)、白马总督龙王(与梅川大爷、关里二爷同为庞统)、雪花太子龙王(岷县文化局编辑的《岷州花儿》一书写作雪花太子耐子娘娘,笔者注)、金龙大王、何麻英祖(岷县文化局编辑的《岷州花儿》一书写作啊妈音祖,笔者注)、挠龙黑池爷十二位男神和九天玄女、元君娘娘(别名元君圣母,九天玄女之师,笔者注)、司命府君、锁子金花娘娘、红马珍珠娘娘和青马星宿娘娘六位女神。中十八位湫神里,属于历史人物的有梅川大爷、红牛龙王、黑池龙王、白马总督龙王(岷县文化局编辑的《岷州花儿》一书写作宁宁阿婆,笔者注)、金龙大王等男神。有关梅川高庙十八位湫神,岷县学者李树开列出了与张大鹏稍有不同的名单:梅川大爷、宣泽大王(一作宣师大王)、八娘寺太子爷(范仲淹重身)、卓坪白马爷(庞统重身)、顾家沟的红牛龙王(一说姜维、一说赵云,李树注)、马家沟的红龙龙王(传说与红牛龙王是兄弟)、老幼店的大爷(金吒)、马场村的二爷(木吒)、西坝村的三爷(哪吒)、焦山马路白水观音、临潭的常沙爷(常遇春)、店子村的九天阿婆、店子村的府君阿婆(灶神)、锁子山的锁子阿婆、宁宁村的宁宁阿婆(一说为分巡圣母重身,笔者注)、杨家庄的二阿婆(代乙元君娘娘)、西江村的珍珠娘娘和维新乡卓坪村的耐子娘娘。九天阿婆是九天玄女的俗称,别称九天圣母,传说为上古时代的战神,人头鸟身,元君圣母的弟子,黄帝之师。庙址在岷县梅川镇店子村,名为贾家庙,岷县西寨镇冷地口村也有九天玄女庙。珍珠娘娘就是珍珠圣母,别称碧霞元君,神话人物,本庙在东山脚下的周家崖。在李树开的“封神榜”上,中十八位湫神里,男神十一位,女神七位。

关于下十八位湫神,分别指什么神?张大鹏未

提及。

李树在《岷县境内庙会概况》一文中写道:“元山庙会:雄踞于维新乡元山坪上的铁城堡,自明代后就被称为元山高庙。五月十二日,一年一度的高庙庙会在这里举办。从前,庙会期间,分别来自岷县、临潭及卓尼三县各地的十八位龙神要上山到龙神殿聚会。他们都是明代的开国功臣,诸如常遇春、胡大海、李文忠、赵德胜等等。因为五月十二日是明军当年占领铁城的日子,所以被定为高庙会期。”五月十二日维新乡元山庙会内容为祭祀十八位龙神,兼及花儿演唱、物资交流、影视观赏和戏曲观赏等。

2011年第1期《洮州文学》刊登临潭县学者杨重琦的民俗文章《洮州城及端午节迎神庙会》,文章提及:“寻根溯源,据史料记载,明太祖乙酉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八月,朱元璋为了战略需要,表彰和激励将士,钦定功臣位次,敕命在江宁府鸡鸣(笼)山建立功臣庙,供奉徐达、常遇春、李文忠、胡大海、康茂才等21人,‘死者肖像祀之、生者虚以待位’。全国统一后,明太祖朱元璋将开国功臣都封为神,敕命全国各地立庙祭祀。明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大将沐英为了解决军需供应困难,将所带大部江淮一带军士留当地开荒屯田,遂在洮州定居下来。后来,他们为了纪念自己的将领和先祖,故尊其为人造福之‘洮州十八位龙神’……演为每岁端午节,肩舁这些偶像赛跑之龙神庙会。”据惠栋《渔阳精华录讯纂》记载:“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立功臣庙于鸡鸣山,论功列祀二十一人,命死者塑其像,生者虚其位。”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在《遇南园叟感赋八十韵》里写道:“回头望鸡笼,庙貌诸侯王。左李右邓沐,中坐徐与常。霜髯见锋骨,老将东瓯汤。”鸡笼:鸡笼山,在南京市西北,又称鸡鸣山。诸侯王:特指明太祖分封的明开国功臣。诗中的“李”指李文忠(1339—1384年),字思本,江苏盱眙人,朱元璋外甥,洪武十二年(1379年)与西平侯沐英进兵洮州(今甘肃临潭东),平定起事番民,死后被追封岐阳王;“邓”指邓

愈,追封宁河王;“沐”指沐英(1345—1392年),字文英,凤阳定远人,率领军民营建洮州卫城(城址在今临潭新城),追封黔宁王;“徐”指徐达(1332—1385年),安徽濠州(今凤阳)人,死后被追封中山王,谥号武宁;“常”指常遇春,追封开平王;“东瓯汤”指汤和,追封东瓯王。又据《明史·礼志》记载,明功臣庙正殿供中山王徐达等六王,西序赵国武庄公胡大海等八公侯,东序郢国公冯国用等七公侯,计二十一人。胡大海(?—1362)明代大将,字通甫,安徽泗州虹县人,祖上为波斯人。胡大海遇害后,朱元璋作文以祭,特赠光禄大夫,追填封越国公。蓝玉(?—1393年),明初大将,安徽定远人。大将军常遇春妻弟。回族(一说苗族)。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蓝玉因与蒙古兵作战有功而被封为凉国公。

“为安慰大批被强制迁徙西北高原洮州地域的江南移民,凝聚其人心归一,明朝统治者遂将常遇春、沐英、胡大海、徐达、李文忠十八位王侯将领,按照四处方位及居住特点,按照十八处庙宇的管辖权,把这些人间凡人英雄分封为一十八路龙神。”(青之·尤瑟《洮州旧事——十八位龙神》)临潭县汉族人信奉的十八位龙神,几乎都是明朝初年的开国功臣和大将的英魂。常遇春(1330—1369年),字伯远,回族,安徽怀远人,元末随朱元璋起兵,任副将军,与大将军徐达共同领兵。1368年秋天,明军在大将徐达、常遇春率领下,攻入大都,元顺帝北逃,元朝在全国的统治结束。北伐还师时,常遇春暴病身亡,被追封为开平王,谥号忠武。常遇春的封地在临潭县冶力关,此处有一深潭,名冶海,常遇春庙在此海子旁边,民间俗称常爷池。

据陈建中、付中兴所写的《洮州十八位龙神传略》介绍:

1,徐达(1332—1385),安徽凤阳人,开国大将军、中山王。俗称大郎爷。

2,常遇春(1330—1369),回族,安徽凤阳人,副大将军、开平王。封三边总镇西海洮河龙王,俗

称常爷。

3,李文忠(1339—1384年),安徽凤阳人,岐阳王。封威镇三边沓中后山都大龙王。

4,马秀英(1332—1382),安徽宿县人,朱元璋妻,马皇后。封九天元君金母娘娘。

5,胡大海(?—1362),回族,安徽虹县人,越国公。封洮河威显黑池都大龙王,俗称老黑爷。

6,郜氏(生卒不详),安徽滁县人,花云妻。封西郊透山响水九龙元君娘娘。

7,康茂才(1314—1370),湖北蕲春县人,蕲国公。封东郊康佑青龙宝山都大龙王。

8,朱亮祖(?—1380),安徽六安人,永嘉侯。南江总督三边黑滋都大龙王。

9,花云(1330—1359),安徽滁县人,都指挥使。封四季九沃护国小儿赤察都大龙王。

10,赵德胜(1325—1363),安徽凤阳人,梁国公。封普天同治二郎。

11,武殿章(生卒不详),安徽凤阳人,朱元璋结义金兰。封镇守西海盖国大郎。

12,陆仲亨(1338—1390),安徽凤阳人,吉安侯。封白马大山都大龙王。

13,郭英(1337—1403),安徽凤阳人,营国公。封五方行雨小吉龙王。

14,华云龙(1332—1374),安徽凤阳人,淮安侯。封祥眼赤砂都大龙王。

15,成世疆(?—1381),原籍江苏南京,元末迁居洮州甘沟(莲花山北麓)。封成沙广济都大龙王。

16,沐英(1345—1392),回族,安徽凤阳人,黔宁昭靖王。封金龙龙洞宝山小吉龙王。

17,韩成(?—1363),安徽凤阳人,高阳侯。封水司开路都大龙王。

18,张德胜(1328—1360),安徽合肥人,蔡国公。封秀头卢布老爷赤察都大龙王。

范卫平、袁建勋编著的《河洮岷文化概论》认为洮州十八位龙神包括男神十五位,全是明朝历史人物,依次为:陀龙宝山都大龙王,俗称城背后

佛爷,原型为中山王徐达(安徽凤阳人);总督三边常山盖国都大龙王,俗称常爷,原型为开平王常遇春(安徽定远人);威镇三边朵中石山镇州都大龙王,俗称石山佛爷,原型为岐阳王李文忠(安徽盱眙人);洮河威显黑池都大龙王,俗称南路佛爷、青山佛爷,原型为越国公胡大海(安徽泗县人);普天同知感应龙王,俗称张旗爷,原型为营国公郭英(安徽凤阳人);康佑东郊青龙宝山都大龙王,俗称青龙爷,原型为蕲国公康茂才(湖北蕲春县人);镇守西海感应五国都大龙王,俗称五国爷,原型为安世魁(陕西武功人);四季九旱降虏护国赤察都大龙王,俗称黄轿帘子水磨川佛爷、老人家,原型为东邱郡侯花云(安徽怀远人);祥渊赤察都大龙王,俗称石旗佛爷,原型为梁国公赵德胜(安徽凤阳人);五方行雨都大龙王,俗称五方爷,原型为武殿章;成沙广济都大龙王,俗称成爷,原型为成世疆(南京绞丝巷人);水司杨四将军都大龙王,俗称将军爷,原型为高阳侯韩成(安徽虹县人);金龙洞宝山小吉龙王,俗称刘爷,原型为昭信校尉刘贵(直隶六安州人);南郊总督三边黑池都大龙王,俗称黄轿帘子流顺川佛爷、老人家,原型为永嘉侯朱亮祖(湖北蕲春县人);祥眼赤砂都大龙王,俗称梨

园佛爷,原型为蔡国公张德胜(安徽合肥人)。女神三位,依次为:西郊透山响水九龙元君,俗称白土娘娘,原型为马秀英;九天化身白马太山元君,俗称冯旗太太,原型为地方传说人物;九天金木元君,俗称牌路下阿婆,原型为地方传说人物。特别的,马秀英,别号马如来,洪武十五年(1382年),马皇后病死,葬于孝陵,当时风雨雷暴大作,送葬僧人宗泐口宣一偈:“雨落天垂泪,雷鸣地举哀。西方诸佛子,同送马如来。”朱元璋听了,才转忧为喜(摘自《三千年来谁著史:明清时期的进退规律》,冷成金著)。范、袁二位学者了解的临潭十八位“龙神榜”上,并没有朱元璋册封的汤和、邓愈、沐英、蓝玉等明初功臣。可见,关于洮州十八位龙神的说法,有很多版本。每年农历三月初八日,是岷县维新乡堡子村的庙会,“庙内供奉督爷神像(人物原型为明代沐英)。会期演唱会戏三天,赛唱北路花儿。”(李树《岷县境内庙会概况》)

每年端午节,是临潭县十八位龙神的庙会,会期三天。岷县维新乡元山高庙供奉的十八位湫神(龙神)应与临潭十八龙神差不多,庙会时间紧随其后。

(作者单位:甘肃省岷县二中)



说春与考春信

彭战获

据大量历史文献记载,以及考古工作者多年来对大堡子山和周边地域的考古发掘,进而证明西汉水流域是秦人的发祥地,已成为当前嬴秦西垂文化研究中学术界不争的史实。这一地区周秦文化积淀深厚,尤其是春信说春民俗承载着秦文化的基因,在历史的进程中一直洁身自爱,至今依然不失其地域文化特色。说春的动机和主要目的是在于劝课农桑,提醒农人按时种收作藏,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但伴随而生不断丰富涉及七十二行的春信歌以及独特的说唱艺术,更是赢得了不同的受众。同时,民间也有了不拘一格的考春信习俗。2007年,在地方及上级政府的重视下,西和县、礼县原始古朴的春信说唱中遗成功,被列为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现根据笔者多年田野考察情况,命题申述,供专家学者进一步加深研究。

一、说春的主旨在于指导农事生产

春信,是西汉水流域的人们以说唱形式为载体、专门从事传播农历节气的人的尊称,民间又俗称为“春信客”“说春的”“唱春的”和“说春信的”。其首要任务是提前发送一年一度刻板印制的《节气表》,即图文并茂的《春牛交节图》,民间又俗称“春信帖子”。

在我国历史上,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黄经),将全年划分为二十四个段落,包括立春、惊蛰等十二个“节”气,雨水、春分等十二个“中”气,统称“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的划分,起源于黄河流域。远在春秋时代,已运用圭表测日影的方法定出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个节气,以后,通过农业生产实践,到秦汉间,二十四节气已完全确立,成为农事生产的主要依据。我国幅员辽阔,即使同

一节气,反映于东西南北不同地区的物候、农事生产并不是完全一致,甚至同一地区高山与川坝之间也存在着明显差异。陇南多山多丘陵,历史上长期交通不畅,信息闭塞,作为报春使者和民间文艺轻骑兵的泥腿子春信,送“表”时又结合当地实际,说唱《二十四节气歌》来指导农事,寓教于乐,怎能不受民众欢迎呢?《二十四节气歌》流传很广,不同地域的春信各有各传承的唱词,即便同一村子的春信之间,也存在着不小的差异。流传变异,这很正常。现将坛土关春信唱词(根据陇南市说春传承人唐东亮口述记录)择录如下:

正月里“立春”天文合,节气相连“雨水”多;世上惟有春富贵,春暖花开柳芽活。

二月里“惊蛰”与“春分”,百虫苏醒太阳红;金犁插进软土里,人欢马叫忙春耕。

三月里“清明”“谷雨”近,家家门前秧子青;忙忙耕来忙忙种,日后还望好收成。

四月里“立夏”“小满”天,农户勤耕在田间;庄稼不负勤苦人,月月有活忙不闲。

五月里“芒种”“夏至”长,雄黄酒酒过端阳;家家门窗插艾柳,无灾无殃人安康。

六月里“小暑”“大暑”到,骄阳似火将人烤;农夫下田苦辛劳,王孙公子把扇摇。

七月里“立秋”“处暑”凉,口尝新麦味道香;务农虽苦也有乐,七十二行农为上。

八月里“白露”与“秋分”,中秋月圆亮如银;瓜果飘香月饼甜,陪伴无数赏月人。

九月里“寒露”与“霜降”,新粮酿酒满院香;庄稼汉操起三杯酒,给个宰相也懒得当。

十月里“立冬”“小雪”临,上山打柴汗涔涔;天凭日月人凭心,尊老爱幼度寒冬。

十一月“大雪”接“冬至”，谈天说地好吟诗；耕读本是传家宝，莫道农人愚无知。

十二月“小寒”与“大寒”，火盆煨茶香又甜；一年勤苦得心闲，红红火火办大年。

二十四节气齐说完，当个农人不简单；春信送你“节表气”，时时查照莫偷懒。

十年学个读书人，十年学不会个庄稼通；又读书来又种田，子子孙孙乐无穷。

民国之前，人们将立春称为打春。古风俗中，立春前一日有迎春的仪式，由人扮“句芒神”鞭打土牛，地方官行香主礼。西汉水流域的迎春活动是隆重的，要邀请春信头儿和各行各业的一些代表一并参加。这一天，县堂要摆起全堂执事，先看戏，然后步行郊外，集会乡民，祭祀地神。最后，将泥塑土牛打碎、掩埋。这就是“打春”。当地有“早上打罢春，黑下温一温”“春不打捷，冬不弯路”之说。立春以后，天气转暖，农活逐渐增多，也就是“动农”。

春信所送《节气表》，其实就是依据官方皇历改造浓缩刻印的古版日历，一年一版，至今民间仍可见到。传统节气表十六开大小，以红、黄纸质多见，天头横列行年干支；上半部分竖列二十四节气表，由右向左逐月开列；月格下居中位置是八卦图，两侧分别是入伏、数九、春社、秋社的日期，以及利山利向、吉凶、几日得辛、几龙治水、几牛耕田、几人共饼、几屠共猪等文字；最下面配有一幅造型古拙且又耐人寻味的牛耕图或者是芒神春牛图。由此可以看出，小小的一张春信帖子，包罗万象，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节气表》上的“春牛”，通常是象征农事的土牛。牛体长八尺，高四尺，张着大嘴，尾巴长一尺三寸，左缴，除膝部处呈白色、四蹄呈黑色外，通体皆为青色。笼头为苕麻、桑柘木制作，呈黑色。这就是早期的春牛形象。过去临近立春，县衙邀请春信头，于辰日按一定方位取水土，用桑柘木为胎骨，按上述尺寸要求着色塑成春牛，蹄踏衙门左扇，牛头向东，祭拜东方木神之位。这便是用于“迎春”“打春”的土牛。说春人将其艺术地搬进春信帖子，除了对牛的感恩戴德之情，还寄寓了美好的多种期冀。

《节气表》上的孩童，是芒神的象征。芒神又称句芒神，身高三尺六寸，平梳两鬓，身着黄衣，系着青腰带，鞋裤俱全，左手提罍耳，右手持柳枝。柳枝代表鞭子，鞭手通长二尺四寸，结子用苕麻茎皮纤维蘸染五彩。农忙，芒神多立于牛身前或身旁。芒神是传说中的古树神，主要职能之一就是鞭牛驱懒，加速耕种，搞好农事。西、礼春信绘画刻印传承的《春牛交节图》上的孩童，正是此现象的真实反映。当然，一些人认为，这无非是一幅人牛耕作图或牧牛图，完全是出自于直观的表象理解，并不懂得其中的奥秘所在。

二、民间春信组织与外出活动概说

“百业农为首”“一年失了农，十年不如人。”西、礼春信，主要分别居住在坦途关、龙鳞、雷坝、滩坪、白关等地，他们父传子，子传孙，一代接一代地传承递继，曾下四川，上巩昌，走汉中，去洮岷，风俗所兴，无处不去。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为发展农业生产做出了特殊贡献。但有一点，每年只集中在冬至节至来年立春前的这段日子，前后游说也只有四十余天。

历史悠久的说春活动，是在严密组织下进行的。据《礼县志》《西和县志》记载，过去每年说春前，春信头人要先拜见地方官，在县衙登记，并取得“执照”后方能活动。同时，县衙也划定春场，任其畅行无阻。正如坦途关人的传统春信歌里所反映的，“造齐皇历十三本，传与天下十三省；州传府，府传县，县官传给春信人；春信上前领执照，领上执照往前行；上山不问山头路，过河不问摆渡人。”可见，春信肩负特殊使命，备受官府支持保护，也受到民众的欢迎与优待，人们赐赠礼物自在情理之中。

凡春信集散居住之地，都有各自的领头人。头人由公众民主推选，今年选你，明年选他，轮番领头操心，皆是德才兼备、享有威望的老春信。连选连任的有，但从来不推行世袭制。说春之前，头人要家里摆设香案，尊三皇爷为祖师，召集本地同行一起商讨出外说春事宜。祭祀祖师之后，将新的《节气表》交予外出的领头春信自行刻印。与此同时，年轻人还要在香案前祭祖师、拜师，仪式过后，

方始公认为三皇爷门下的正式弟子。另外,他们行里称头人叫“官相”,各路领头春信为“代相”。“代相”的多与少,皆由春场大小和成员多寡而定。一般来说,春场大,春信少,多为两人一组,人人任务艰巨,谁也不敢懈惰。“代相”所辖,多为父子、叔侄、兄弟组合。活动区域一旦经“官相”分割圈定,“代相”们便分头而行,各尽其责,谁也不能舍远求近、避重就轻,更不能重复乱走,行为失于检点。否则,将会受到行规的谴责。

县与县之间的春信活动范围,也是通过“官相”的互相联系来解决的。倘若邻县没有春信或春信太少,“官相”可与邻县衙门联系,征得许可、保护后,也可跨县区说春。当然,还有跨省区说春的。何以如此?行里的普遍说法是:一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声誉;二是避免重复说春;三是遗漏边远山村,惹老百姓不满意。在短短月余时间里,如果各路春信各自为政,事前互不通气,到时走马灯似的,使老百姓忙不暇接、负担加重,自然于己于人都不好。为此,行里有不成文的规定:“倘若谁误走了重复路分,便要换下前面的春贴,主动退出村子;若两路春信在途中碰头,必须互换一张春贴,以示提醒、尊重。”在改革开放之前,怀抱三皇爷的坦途关老春信,依然遵守着这一古规。

立春前后,各路春信陆续返回本村。所有“代相”除向“官相”汇报任务完成情况外,还要抽份子交纳一定数目的赏钱和赏品,以作酬谢。倘若谁没有完成送表任务,或违犯了行里古规,“官相”便有权罚他下年不许出外说春,同时也要受到同行的谴责和鄙视。坦途关跟其他春信村不同,给“官相”交纳的份子钱物不是等到说春结束,而是在说春起始的第一天,他们通常称之为“采官饷”。啥叫“采官饷”?开完碰头会的第二天,各路“代相”便伙同大家出外说春,将当天所获酬谢,分文不留,粒米不剩,全部统缴“官相”一人。以后所得酬谢,再不抽份子,收入全数归属个人。据陇南市说春传承人、坦土关老春信唐东亮回忆说,他爷爷说春时就是这样的。

三、说唱的形式、内容及其特色

(一)说唱形式

春信,是活跃在民间文艺阵地上的轻骑兵。冬闲之际,他们怀抱春牛、手持环棍、肩挎褡裢,纷纷走出家园,频繁活动在街头市面、生意摊点和农家庭院,以送“节气表”提醒人们重视农业生产为己任,借机说唱一些动听感人的春歌,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又给自己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春信说春,多数是两人一个组合,也有一人独来独往的。早期,大多数随身分别带有小渔鼓、小梆子、筒板或蚂蚱子,用于说唱时击打伴奏,确实增色不少。尤其是蚂蚱子,据华杰先生推断,很可能是后来快板的前期雏形,笔者也有同感。说唱有伴奏,效果也好。只可惜,后来人们只图简便,丢掉了这一老传统。近几十年,说来更让人遗憾,春信一帮又一帮,除“春信民俗村”坛土关古风不减之外,好些人都是在耍“空手道”,褡裢子没有,“三皇爷”也不捧,甚至连传统的《节气表》也没带一张

传统的说春,往往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春信前脚刚一迈进大门门槛,道一声“掌柜的好!”主家还未来得及回话邀请,便站在院中开口说唱起来。伴随着喜庆吉祥、韵律动人的财门歌,然后步入堂屋,将象征三皇爷和护身符的小春牛托在掌中,或往主家堂桌上一放,继续有板有眼地说唱起来。唱词基本上是祖祖辈辈口耳相传的,也有极少部分是即兴编唱的;曲调多为唉声调下面套两句调,有分有合,连续采用切分节奏,富有华彩,优美动听。

两人说唱的好处比较多:一是嗓子可以得到轮换歇息,还可利用交替说唱的间隙,以便记忆自己该唱的词句;二是倘若一方一时遗忘了部分词句,另一方也可以和戏剧舞台上一样随时设法救场;三是说唱出色,主家高兴,还可每人各得一份酬谢。两人一起说唱,有的歌词短,有的歌词长,有时接受主人点歌,要一气连唱许多首,也是颇费气力的,但由于配合默契,轮歇有致,自然显得比较轻松。另外,两人结伴说春,若其中一人初出茅庐,还可采取“踏弹”说春式,即老春信领头说唱两句,年轻人则重复后句。如此反复,直到词曲终,别有一番韵味。若是一人说唱,就得一气不停地唱到

底,嗓子干哑不说,忆词、编词又没有时间,气力耗掉不少,酬谢也只有一份。老春信轻车熟道,偶有差错,自有回天之力,而初出茅庐者则经验不足,要么慌了手脚,要么难堪凉场。坦途关和雷、王二坝春信向来注重声誉,很少让年轻人去独当一面。

说春人是有讲究的,既不能四平八稳地坐着说唱,又不能原地站着说唱,只能是脚踏碎步来回走动,边走边唱。这种踱步说唱法,是他们的老祖先一辈又一辈从长期的送表实践中摸索总结出来的成功经验,脚踏节奏,口出旋律,思路清晰,说唱效果好,人也感觉不到过分疲劳。离开之际,便特意送一张彩色纸自印、图文并茂的刻板《二十四节气表》。

春信能说会道,进门便是歌。先说什么,后说什么,全凭主家家庭、职业、身份及环境等方面来定,一直是谨言慎行。他们报喜不报忧,深受广大民众欢迎,文革中,说春被视为“四旧”,备受摧残,一度销声匿迹。上世纪八十年代,春信复出,又活跃于城乡,并连续登上民俗文化艺术节大舞台。

(二)说唱内容

“任何事物都处于一种生生不息的运动、竞争和选留淘汰中,一种事物能够在历史长河的激荡冲刷中被保留下来,就足以证明它是有生命力的……”(王殿、雪梨语,见《论洮岷花儿的艺术性》一文)。春信曾受官方委托走州过县,送“表”东西南北,路路通畅,他们一代接一代口耳相传的“春词”异常博杂。就西、礼县一带小而言之,有反映农耕文明、劝课农桑的春词,如多种民间版本的《二十四节气歌》等;有招财送宝的春词,如《小财门》《大财门》《十二进宝财》《十二送春》《将有中间我不开》等;有恭贺新春的春词,如《送新春》《新春喜》《新年春》等;有七十二行的春词,如《木匠春》《铁匠春》《铺子春》《店子春》《生意春》《食店春》《裁缝春》《药铺春》《筵席春》《客店春》《豆腐春》《阴阳春》《染坊春》《枪手春》《漆行春》《大善人》《祖师爷》《茶叶春》《磨坊春》《瓦匠春》《吹响春》《毡匠春》《油坊春》《桌子春》《系笼床》《画师春》《灌黄蜡》《纺织春》《踩孝堂》等;有反映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的春词,如《八洞神仙》《王祥卧冰》《目连和

尚》《赛黄金》《九九春》《道九文》《十二代串》《二十八数》《十字》《十古人》《十二大将》《林英哭湘子》《孟姜女》《仓颉造字》《祝英台》《牛郎织女》等;有惩恶扬善、劝诫世人的春词,如《劝世文》《十学》《十贤良》《劝善歌》《劝世春》《女儿春》《二十四孝》《懒人歌》《降香春》等;有反映时事新闻的春词,如《八字宪法是个宝》《上坡里坐的是主席像》《难忘民国十八年》《洋烟歌》《改革开放就是好》《责任田是聚宝盆》等;有单纯娱乐的《十杯酒》《十道黑》《八杯酒》《五点红》等等。当然,传统的是主流,仅笔者采录到的就有一百四十多首,这还不包括变异太大的。除此,即兴编唱的还真不少,只可惜边唱边丢,多数未能完整保留下来。现选录两段如下:

“八字宪法”是个宝

农业生产要搞好,“八字宪法”是个宝。要问这宝管啥用,听我说说就知晓。

第一宝,是土壤,改良土壤最重要。保墒防旱增肥力,庄稼根根扎得牢。

第二宝,是肥料,人人快把肥源找。一年四季多积肥,肥多产量能提高。

第三宝,是水利,水库渠道要修好。全国实现河网化,不怕旱来不怕涝。

第四宝,是选种,好种才能出好苗。队队培育种子田,粮食产高病虫害少。

第五宝,别小瞧,合理密植很重要。因地制宜定规格,高产指标能达到。

第六宝,要保苗,防霜防风防旱涝。经常防治病虫害,庄稼才能保护好。

第七宝,说管理,勤查勤看要做到。精耕细作田园化,株株杂草都除掉。

最后请听第八宝,先进的工具效率高。土法洋法相结合,技术改新把窍门找。

八个字儿八个宝,一个字儿也不能少。要问此宝哪里来,共产党的好领导。

懒人歌

我给你说一个懒人歌,你看这世上有啊没。天爷下了没柴烧,拆笆子,扯房窠。

太阳出来爬上坡,见了凉树躲一躲。睡懒觉,怕做活,吃烟就是七八锅。

妇人家屋里喊叫着,进门问着啥吃喝。臊子面,没调和,红脖子红脸打老婆。

一脚踏在脚底下,一口门牙齐碰落。给人说去人不信,腰巴里还踏了几个脚底印。

看,这就是坛土关春信在“文革”时期先后编唱的新歌,多么好的思想内容啊!前者,大胆创新,时代感强,内容健康向上,与传承的《二十四节气歌》相比,一点也不逊色;后者,以懒人为题,讽喻劝诫,寓教于乐……像这样的歌,一经春信传唱,便广播民间,至今仍发挥着其独特的积极作用。原创者唐东亮,只上过两年小学,是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其说唱编词和艺术才华是一般文人可望不可及的。

春信走南闯北,广闻博采,足迹遍及各地每个行业,几乎行行都编有春词。不过,每个行当里优秀的春词,都凝聚着一代又一代说春人的集体智慧和心血,有的被长期固定下来,有的则在传承中不断变异和丰富着。但有一点,所有春词里都没有谈情说爱的内容。

岁尾年头,民间有许多风俗习惯,尤其是语言,行为方面的禁忌比较多,谁也不敢有反风俗、惹众怒行事。春信不失时机,进门先来一段财门春,接着便说唱《二十四节气歌》或行业赞歌等,吉言喜话,妙语连珠,恰好迎合了民众辞旧迎新、祈望美好幸福的心态。

(三)特色

如果我们将“花儿”“山歌”称为“山曲”或“野曲”的话,春信说唱无疑是“家曲”了。首先是季节性强,出发点不同;其次是入村窜户,说唱的方式不同,再次是场所不同,说唱内容也千差万别。他们在“巡回义演”,在举办民间“家庭演唱会”。综合分析,自然有别于古老纯朴的花儿、山歌、社火歌和乞巧歌,也有别于其他一些民间说唱艺术。

春信说唱,三百六十行,行行有歌。不论是传统的还是新编的,长歌也好,短歌也罢,从开始到一曲终了,一气呵成,衔接紧凑。朴实、通俗的语言,自由、明快的旋律,集历史性、知识性、娱乐性

于一身,再加上说唱中运用大量衬词衬字,往往给人一种面对面亲切交谈的欢愉感觉,即使说唱再久,也听而不厌。他们是踩千家门的,活动场所随时都在变换,只有扬长避短,博取所爱,彼此沟通,才能赢得生存与发展。“上山砍柴,下河脱鞋”“进了那山,就唱那山的调”。不论到何处,首先得唱开财门之类的歌进门,这是开场白。接下来,就不同了,农民家是《二十四节气歌》,铁匠铺是《老君串》(俗称《铁匠春》),木匠家是《鲁班串》(俗称《木匠春》),医生家、药铺是《药王春》,猎户家是《枪手春》,豆腐作坊是《豆腐春》,毡匠家是《毡匠春》,等等,行业分明,各具特色;若遇主家办喜事,就是《筵席春》;办丧事就是《踩孝堂》或《二十四孝》;如果主家点歌,传统之歌,基本上烂熟于胸,点什么便唱什么;倘若是现场指物为题,老春信才思敏捷,见广识广,向来以叙事、赞誉、触景生情的描述见长。

春信唱词大体上是讲求押韵的。从句式格律上看,不论唱词长短,大多数是七言句或七言增减句,通常每句有四个节奏和停顿,末顿的音节以单尾字见多。如:“正月(里呀)立(的)春(呀)天文(的)合(呀),节气(的个)相连(呀)雨(呀)水(的个)多(呀)……”在实际说唱时,又加进不少衬词衬字,使得节奏更加明快流畅。在韵脚上不拘一格,灵活多变:有的首句便定好了韵脚、一韵到底;有的则不然,中间换几次韵;有的上下两乐句同韵;有的则逢双句押韵,中间有时也换韵。内容决定形式,押韵严格的和不太合辙押韵的,一经春信口里唱出,都显得是那么韵味十足、琅琅上口。

其他民歌样式中多见比兴类句子,但传统的春信歌词中却很少见到。这也是特色独具的一个方面。

从和仲宅西测日授时,西汉水流域的春信由游说送“表”发展到说唱送“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如今,纯粹以说唱见长。说唱,是指“说白调”,其实质还是以唱为主。常见的旋律很短,只有上、下两个乐句,另加一个哎声调引子,但经过春信分合切换,连续唱起来犹如行云流水,显得变化多端,魅力无穷。稍带举例比较一下:岷县“花儿”

演唱中有个“扎刀令”，唱起来音高而尖，相当吃力，好像有人在身上猛扎了一刀，犹如疼痛难忍时发出的急切喊叫声；陇南山歌高亢、嘹亮、音域宽、拖腔长，粗犷雄浑与缠绵并蓄；西和女儿乞巧歌欢快、嘹亮、柔情、忧伤兼备……与之相比，春信歌则大大不同，独特的唱白调，平稳舒缓，犹如熟人在一起拉家常，这不能不说又是一大特色。

其实，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年代里，境内民间文化娱乐生活相当单调。尤其是到了冬闲，春信借送“表”之机，深入家家户户，献上如此丰富的春歌，无疑是一顿求之难得的精神文化大餐。春信的说唱，常惹得孩童追逐其后，东家进，西家出，欢乐不已。此情此景，用今天观看“春节联欢晚会”的盛况来形容，一点也不算是过分夸张。

四、考春信民俗的缘起及其考法析述

(一)民间考春信的原由

就秦人发祥故地西汉水上游而言，早期的民间春信人数极其有限，说春送“表”不但免交皇粮国税，而且还受到地方官府的支持保护。他们虽为泥腿子出身，长年与土地为伴，但肩负特殊使命，社会地位是比较尊贵的。在游说送“表”的日子里，善良的老百姓念其地冻天寒太辛苦，常常留宿款待、点歌娱乐，并回赠一点米面之类，赖其贴补家用，在情在理，这是无可厚非的。可是，社会上也有一些人不去看春信活动的真正实质，仅从外在形式上瞅来瞅去，任意夸大，歪曲了他们在特定历史环境下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更抹杀了他们在丰富民众文化生活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以及古朴原始的民间艺术价值。这实在有失历史公正。

真正名副其实的春信，历来是受人敬重的，出现一些非议，也并非空穴来风。他们的职业，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于是，一些人便投机取巧，成帮结伙，招摇过市，入村串户，操腔走调地充当起春信来了。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只会唱几段听来的“开财门”和“二十四节气”之类的歌，无师无门，会唱行业歌的极少，更不可能具备指物为题、随机应变的才智。在过去特殊的年代里，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为的是借春信之名骗取一点回赠，以应断炊之急，养家糊口而已。殊不知，这样一年一度地

不断扩军，走马灯似地来来去去，鱼目混珠，大大加重了老百姓负担，自然使其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大打了折扣。这些人一来无名师亲传而授，根本给民众带不来艺术娱乐和享受；二来不受行规约束，有的甚至坑蒙拐骗、伺机偷窃，在社会上泛滥成灾。在此情况下，一些人对春信真假不分，产生这样那样的许多偏见，也就可想而知了。

当今社会，时兴打假求真，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也相继得到了有效保护。在过去的年代里，人们对春信也采取各种各样的打假举措，将其“验明正身”，既恢复了“春信世家”的声誉，又遏制了冒牌春信胆大妄为，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说是维护了民众自身的利益。这行之有效的打假之举，就是相伴相随形成的考春信习俗。

(二)民间考春信的方式方法

民间考春信的方式方法很多，有广泛流传的考法，也有鲜为人知的考法。现择要归纳分述如下：

1、普通考法

甲、考常识。当春信一踏进门槛，主家便有意摆三支香于桌案上。经多见广的春信见了，便上前将三支香轻轻从中间折断，然后一并点燃，分出一支置于携带的春牛背上，将另外五支分别插于主家香炉的四方和中央。为什么要这样做？给春牛炷香，以示自己是三皇爷门下的弟子，时时刻刻不忘敬奉祖师爷。香炉中上五支香：一是给主家开五方财门；二是敬五方神祇；三是敬祭主家的祖先。至于将三支香一分两半，表示主客同心敬奉。

乙、考《节气表》上的内容。《节气表》也就是春信携带的“春信帖子”。春信汲取官方历书精华，再加以创造发展，知识面广，蕴涵丰富。如果春信出于名门，学识博杂，只不过是小菜一碟，自然能经得起考验。

丙、考说唱。说唱，主要指各类春信歌。当春信唱罢《财门春》和《二十四节气歌》，主家便有意点一些内容复杂、行业生僻的传统歌目，让其说唱。要知点歌之人，多数是文化人，所点之歌也很难蒙骗、搪塞过去。倘若点《二十四孝》，便在桌上放二十四枚铜钱，春信说唱得好，便可自行收入褡裢。

丁、考临场发挥。春信能说会道，才思敏捷，这是人人都佩服的。主人为了避免他们不说套话和空话，有时便指物为题，让其临场描述，借题发挥，编词说唱。这种考法难度较大，据说连一些老春信也对此直皱眉头，因时间仓促，难免会编一些粗糙之词。当然，说春阅历较长的春信，平时苦于积累，早有心理准备，也不至于大乱方寸。

经过以上种种考法，冒牌春信实在难以顺利过关，自然“原形毕露”，羞愧交加，不得不道出实情。不过，考归考，善良的老百姓考完，也不会过分责怪，大多数人只是相对一笑了之。讨饭是穷人的一条大道，但冒充春信之名，则名不正又言不顺，何况被无数双眼睛紧紧盯着不放，甲地考，乙地考，丙地也考，一考再考，难以应对，出尽了洋相，自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2、特殊考法

以上是一些最流行的通俗考法，民间大多数人或多或少了解一些。除此，还有更复杂的，便是考行内“黑话”。这是内行中比较深奥的考法，如今民间近乎遗失，只有一些民国时期过来的老人和老春信如数家珍，并且能够将其尽数破解。据笔者多年田野调查了解，常见的有下面几句特殊用语：

甲、“春信客，你跟阿搭来的？”或“春信客，你从什么地方来的？”

这简单的问话，听起来随随便便，显得主人热情好客，其实暗藏着民众考春信的玄机。如果春信单从普通问话的角度来据实回答，说是“从石家关来的”“雷坝来的”“龙鳞桥来的”……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如果回答是从“三皇爷门下来的”，那就顺利过关了！为什么要这样回答？说破了，道理非常浅显，春信的祖师爷是三皇。此三皇不是天皇、地皇、人皇，而是专指远古传说中的伏羲、燧人和神农，其中人文始祖伏羲就“生于仇池、长于成纪”，曾教古人种田等，燧人曾取火造福于人类，神农又是主宰农业之神，他们与陇南、天水一带有着深厚的渊源。人们崇敬三皇，春信也敬奉三皇，“三皇爷门下来的”，自然是名正言顺的春信。

乙、“春信客，你是精脚子来的，还是穿鞋来的？”

腊月间是春信外出说春送“表”的黄金时段。试想，天寒地冻的，辛苦归辛苦，哪有光着两脚走村入户的？即使是特别困苦的年代，“可怜身上衣正单”，不至于落得如此不顾形骸，恐怕破烂麻鞋也会将就一双用来御寒。主人这样问话，不是神经有问题，也不是有意奚落人，不可不当心，必须得认真回答才是。“精脚子来的”，说明祖上不是春信，拜在三皇爷门下的年月不长，资历太浅，说唱不到家的地方，还望掌柜的多担待包容，给予方便；至于“穿鞋来的”，那就不同寻常了，说明祖上数代一直是春信，属世袭家传，受地方衙门保护，有行规严格约束。这是考春信的“行话”，如果你曲解其意，答非所问，定会惹人见笑的。

丙、“春信客，你认为一天中黑几次明几次？阴几次阳几次？”

这显然不是单纯的自然常识问题，常人听起来，似乎真有那么一点明知故问并夹杂着有意蒙人的意味。不过，真正的老春信当然心里有谱，他们的回答是：“一天中黑六次，明六次；一天十二个时辰，六阴六阳。见满平收黑，除危定执黄，成开宜可用（指吉时），闭破不降唐（不太好）。”如此怪僻考法，旧时屡见不鲜。有一点需要借此附带说明一下，在人黄道中，建、满、平、收、破、闭是黑道，而除、危、定、执、成、开为黄道，阴阳术士择黄道吉日时多选用黄道。春信应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通晓这些是很正常的，但前面未问及，看起来后面答案似乎显得多余。不过，也不大可能！对此疑问，我曾请教过几位老春信和一些民间老人，也难圆其说，一致推测，“很可能遗漏了其中一句问话”。在此存疑，还望知情者解疑。

丁、“春信客，你一年走几条路？”

正确的回答是“一年走两条路，一条是‘白露’，另一条是‘寒露’。”试想，春信的主要职责是送“表”，而“表”中的主要内容是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二十四节气常识。《内经》云：“寒风晓暮，蒸热相薄，草木凝烟，湿化不流，则白露阴布以成秋令。”白露时，陇南天气渐凉，大秋作物的收获已接近尾声，恰好是高山种冬小麦之时。《通纬·考经援神契》里记载道：“辛，为寒露。言露冷寒而将欲凝

结也。”寒露到来,秋收已经结束,进入冬藏,如果再播种冬小麦,出苗有困难,越冬能力差,势必造成来年小麦减产。有此“黑话”相考,春信只能慎重应对。

戊、“春信客,你的历头有多重?”

“一斤二分四厘”,是正确答案。其实,“一斤二分四厘”是取其谐音,实指“一惊二分四立”。这是二十四节气里的常识,春信的解析自有他的道理:“一惊”指的是“惊蛰”;“二分”指的是“春分”“秋分”;“四立”指的是“立春”“立夏”“立秋”和“立冬”。轻轻地一问,便考出了七大节气。若让外行解析每一节气,那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己、“春信客,一年中下几场雪?”

“两场雪,一场是‘大雪’,一场是‘小雪’”。仍是节气常识。看来,《节气表》好送,《二十四节气歌》也并不难唱,但要真正做到活学活用,还真不是件易事!

这些考春信的行话、黑话,其语言并不见得深奥莫测,只是针对春信的特殊身份、“表”中内容和说唱场合而特意设计的。将春信考住还则罢了,若考不住春信,那老春信还有他们行内的讲章,说法甚多,再不赘述。

其实,货真价实的春信也不是随便说考就能考的。严格地讲,也不好考!

参考文献:

[1]田佐:《测日、土圭、八卦、西汉水、成纪考略》(《丝绸之路》2011年第24期)

[2]余永红《陇东南民俗中的牛耕文化》(《陇南师专学报》2014年第1期)

[3]南玄子《西汉水流域说春习俗小考》(《赢秦西垂文化》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

[4]魏建军《人文礼县》(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2月北京第1版)

[5]杜廷栋《春官》(邱正保 张全新 田佐主编《秦文化民俗资料》第241-25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

[6]赵文慧《魅力秦源》(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7]郑大武《陇南春官及其说唱艺术谈略》(《西北师大学报》1998年12月专辑)

[8]彭战获《陇南春信》(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

(作者系西和县史志办公室干部)



红军西征的胜利与陕甘革命根据地的 巩固和扩大

徐玉金

一、红军西征前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形势概述

1935年10月中旬,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顺利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得到了补充和休养,保存了红军的力量,使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获得了战略转移的立足点和开创了革命的新局面。陕甘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的危机关头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毛泽东曾多次感慨地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①11月3日,为了争取张国焘的北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党中央对外称“中共西北中央局”。同时,会议根据党中央负责人张闻天的提议,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及后方办事处,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聂洪钧、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任委员(1936年4月10日,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被增补为委员),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叶剑英任参谋长,聂洪钧、张云逸任副参谋长,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叶季壮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李文楷分任兵站部部长和政委,戴季英、黎林分任动员武装部部长和政委。其职责是全权决定战斗指挥问题,统一指挥红一方面军(下辖林彪、聂荣臻的红一军团和徐海东、程子华的红十五军团)。此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替代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但在实际工作中,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上依然存在,两个军委名称经常混用)。

中共中央在进行西北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同时,为了加强恢复、巩固和扩大苏

区,于11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议,并决定撤销陕甘晋省委,建立陕甘、陕北2个省委、关中、神府、关中3个特区。中共陕甘省委书记朱理治,副书记李富春,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王生玉,机关驻下寺湾;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郭洪涛,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明方,机关驻瓦窑堡;中共关中特委书记贾拓夫,苏维埃政府主席秦善秀;中共神府特委书记杨和亭,苏维埃政府主席乔钟灵;中共三边特委书记谢维俊(后因谢维俊被叛徒杀害,特委为建立)。2个省和3个特区通归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简称西北办事处)管辖,统一领导西北的红色武装力量。党中央的上述决策为使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提供了组织保证。

当红军与国民党军在陕甘地区进行斗争时,日本帝国主义也加紧了对华北地区的侵略,中日民族矛盾迅速加剧。11月28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联合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明确提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同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地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该宣言的发表,促成了中共政策的重大转变。1935年12月,中共中央瓦窑堡政治局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1936年1月15日,为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打通抗日路线,扩大红军力量,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签发了《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并将红

军改编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2月20日,毛泽东亲自指挥红军进行东征战役,转战山西50余县,歼敌1.7万余人,扩大红军8000余名(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壮烈牺牲)。

二、红军西征的胜利与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

1936年5月初,红一方面军东征回师陕北后,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但是,蒋介石坚持内战政策,拒绝议和,并调集16个师另3个旅准备对陕甘苏区发动新的“进剿”,其中宁夏第十五路军司令马鸿逵以其新编第七师一部驻守定边、盐池、豫旺等地;第三十五师(师长马鸿宾)驻守庆阳、曲子、环县、镇原地区,防堵红军西进。5月14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延川县大相寺召开了红一方面军各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了东征,提出了西征。会议根据红军东征后的全国政治形势、敌我态势以及陕甘苏区面临的情况,决定继续贯彻“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组织西方野战军向陕、甘、宁三省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地区西征,以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扩大红军的力量,打击马鸿逵、马鸿宾的反共势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东北军、西北军等抗日力量的联合,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促成全国抗战的新局面。为了统一领导和管新解放的广大区域,在西征战役发起的同时,中共中央于5月17日决定成立陕甘宁省,撤销陕甘省,下属各县苏维埃政府,除华池县外,其余的甘洛、郿宜、宜川、红泉、肤施等县一律划归陕西省领导。李富春任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马锡五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陕甘宁省成立初期,省址设在陕北吴起镇。随着西征战役的胜利发展,红军随军地方工作团随同西征红军主力一道西进,准备在红军主力占领的广大地区后,组织发动群众,建立红色革命政权,开展根据地的建设工作。

中革军委为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巩固和扩大陕甘抗日根据地,壮大红军实力,努力争取西北抗

日力量大联合,实现全国性对日抗战的任务,于18日毛泽东代表中国抗日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西征战役计划》,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为主组成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以下简称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聂鹤亭任参谋长,刘晓任政治部主任,实施西征战役计划,打击宁夏马鸿逵、马鸿宾,在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创建新苏区;以红军第二十九、第三十军和地方武装、陕北游击队在东线坚持游击战争,牵制国民党军,保卫陕甘苏区,策应西征部队作战。西方野战军下辖左右两路军,共约1.5万余人。左路军由红一军团组成,辖一师、二师、四师,及一个骑兵团、一个炮兵连、一个工兵连,左权代理军团长兼参谋长(林彪调任红军大学校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右路军由红十五军团组成,辖七十三师、七十五师、七十八师(八十一师未列入),及一个骑兵团、一个炮兵连、一个工兵连,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

5月19日和20日,西方野战军分左右两路相继从陕北的延长、延川、永坪地区出发西进。红一军团为左路军,经蟠龙、安塞到达吴起镇集结准备向陇东地区的曲子、环县进攻;红十五军团为右路军,经永坪、蟠龙之间到达靖边新城堡集结,准备进攻安边、定边;西方野战军指挥部、直属队、直属骑兵一团和红八十一师随右路军跟进;红二十八军在延川地区机动防御;红二十九军在韩城地区牵制南线敌人;红三十军在东线坚持游击战争。彭德怀根据宁夏军阀部队的布防态势,决心以右路军首先向西北方向发起进攻,伪装进攻宁夏(今银川),调动环县、庆阳之第三十五师回援宁夏,以左路军寻歼回援之敌于运动中。

5月27日,右路军红十五军团在新城堡集结后分左右两翼队西进。28日,右翼队红七十三师袭占陕西、绥远两省交界处重镇宁条梁,左翼队红七十五师强攻安边未克,转入围困。随后改以红七十八师围困安边,红十五军团率红七十三、红七十五师继续向西发展,进攻定边县城。骑兵团前出定边、盐池大道活动,向灵武方向进行侦察。其间,野战军司令部率第八十一师和直属队进至宁条梁,

红八十一师在宁条梁地区担任警戒,肃清残敌,开展群众工作。之后,继续西进,做出佯攻宁夏的态势,迫使宁夏马鸿逵、马鸿宾部慌忙将驻防陇东庆阳(今为庆城)、环县的三十五师急调回援宁夏,将防地暂交东北军接管。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一面电告东北军不要妨碍红军占领曲子、环县和洪德,一面电告西方野战军,令左路军红一军团从吴起镇向西南进至华池元城,派一部兵力向庆阳游击,阻击东北军由庆阳北上,但只坚决打击马鸿宾部,不与东北军作战。

左路军红一军团遵照中革军委和毛泽东的命令,于5月28日从吴起镇出发,向曲子、环县方向隐蔽前进,5月30日前陆续到达元城地区待命。这时,国民党西北“剿匪”司令部察觉红军西进的动向后,急调马鸿宾部第三十五师一〇三旅(旅长马玉麟)、一〇五旅(旅长冶成章)于元城、庆阳、曲子一线堵截。6月1日,红一军团红二师在曲子歼敌第三十五师骑兵团一部,迫敌第一〇五旅旅长冶成章和特务连投降;红四师也在马岭附近击溃敌第三十五师1个营。3日,红一军团主力在阜城歼驰援之敌第三十五师6个步兵营,击溃2个骑兵团。至5日,红一军团主力乘胜占领了环县、洪德城、三岔地区,13日进到七营附近。红十五军团于6月4日进占红柳沟。至11日,其先头部队占领同心城,主力进到王家团庄附近。14日,红二十八军(宋时轮任军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编入西方野战军序列,与红八十一师(贺晋年任师长,张达志任政治委员)等部组成中路的(又称北路军),后接替右路军围攻安边,夺取定边、堆子梁等城寨的任务。在此期间,红二十九军1个团也进至元城、曲子、阜城地区,配合左路军行动。至此,红军占领七营、王家团庄,切断了第三十五师北上道路,迫敌退回固原的黑城镇地区。6月中下旬,右路军在中路军配合下,相继攻占定边、盐池、豫旺县城,歼敌新编第七师骑兵团2个多营,击溃3个团又2个营;左路军攻占豫旺堡。7月间,西方野战军在红城水、安边、七营等地击退敌人的数次反扑和袭扰,巩固和扩大了占领区,新老苏区连成一片。红军在新开辟地区发动群众,扩充兵员,征集

资财,并对东北军部队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东线红军和地方武装、游击队,疲惫和迟滞了国民党军,有力地配合了西方野战军的作战。7月底,西方野战军主力集结在豫旺地区休整,西征战役结束。

西征战役历时两个多月,共歼敌7个营,击溃敌3个团又5个营,俘敌2000余人,缴枪2000余支,战马500余匹,占领环县、同心、定边、安边、盐池、固原、豫旺、宁条梁、花马池等10余座城镇,使新老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在陕甘宁三省边界开辟纵横总面积达12万平方公里的新苏区。红军西征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陕甘、陕北革命根据地,使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展、扩大成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条件。

从8月开始,西征红军在巩固新区的同时,继续发展胜利,并为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做积极准备。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回合。红二方面军于9月中旬连克甘肃省东南部的成县、康县、徽县、两当,10月迅速向北转移。10月21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在平锋镇与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政治委员聂荣臻会面。10月22日和23日,红二、红六军团分别在将台堡、兴隆镇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可蒋介石集团又调集了十几个师的兵力,企图乘红军立足未稳、十分疲劳之际而一举歼灭。仅仅静宁、会宁地区,国民党就集中了五个军的兵力,分四路展开追击。国民党胡宗南部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红军西征作战打击的主要对象。红军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采取“逐次转移,诱敌深入,尔后在预定的有利地区,集中优势兵力,给敌人主力胡宗南部以歼灭性打击”的作战方针,在海原地区击溃向红军侧翼进攻的马鸿逵骑兵团三十五师和东北军1个骑兵团,并消灭其2个团,俘敌1000余人。之后,于11月21日在山城堡地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了孤军深入的国民党胡宗南七十八师二二二旅全部及二二四旅两个团。与此同时,向盐池方向进攻的国民党军队,也被红二十八军击溃。“这是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显示了红

军团结战斗的威力,对于挫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促进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起了积极的作用。”^②

为了配合东北军、西北军抵御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军事进攻,中共中央决定红军主力南下渭北一带集结待命。同时决定再次成立中共陕甘省委,书记李维汉,秘书长申力生,组织部部长张邦英,宣传部部长李华生,统战部部长杨一木,军事部部长刘景范,妇女部部长先后为刘锦如、白国英。隶属中共西北中央局,机关先后驻甘泉县高家哨、中部县(今黄陵)店头镇。陕甘省委成立后,中央决定把前陕甘省撤销时划归陕西省委领导的关中特委和甘洛、肤施、红泉、宜川、富县、韩城等县委,以及陕甘工委领导的红宜(宜君)县委划归陕甘省委领导。1937年4月,中共中央又决定撤销陕甘省委,其所辖党组织分别划归中共陕西省委和陕西省委领导。“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最终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由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展、扩大而成的陕甘宁根据地是八路军挺进抗日的出发点。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北迄长城,南至淳化,西达固原,东到黄河,建立了36个县和1个特区,总面积达1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00万。

综上所述,红军西方野战军所进行的西征,是继红军东征山西之后,为继续贯彻中共中央确定的“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而进行的又一次重大战略行动。它巩固和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展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最后形成了西北革命根据地,^③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一块完整的根据地,是中共中央和三大主力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八路军三大主力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1945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作《时局问题与其他》的报告时指出:“中国革命长期在南方发展,到了抗战时期才转移到了北方……只有陕北根据地保留下来了,其他的根据地都丢了”,“这个地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④4月,毛泽东又在《“七大”工

作方针》中说:“陕北有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⑤1986年,习仲勋在《陕甘高原革命征程》一文中写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边区的党组织、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经历了长期而残酷的反‘围剿’和来自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历遭艰险,几经起伏,经历了使红日驱散乌云,胜利的曙光映红陕甘高原的山山水水,把苏维埃的种子传播到中国西北部,在全国成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失败后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以后发展成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⑥这些重要论述,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①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甘肃历史第一卷(1921-1949).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11.第1页

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第二版,第402页

③中共陕北特委和中共陕甘边特委于1935年2月5日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对陕甘边、陕北两个苏区实行统一领导后发展起来的。到1937年9月6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建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西北革命根据地历时2年8个月。其管辖区域在最大的时候,东临黄河之滨,西到六盘山下,北起长城,南至黄龙山,先后设立53个苏维埃县(市),其中39个县在陕西境内,10个县在甘肃境内,4个县在今宁夏境内。

④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265页

⑤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第376页

⑥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11.第1页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第2版

[2]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甘肃历史,第一卷(1921-1949).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

[3]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大事记(1919.5-1949.10).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

[4]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甘肃历史大事记(1919.5-1999.12).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5]吴志渊.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4月第1版

[6]张宏志.西北革命根据地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

[7]李建国.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

[8]李仲立,曲涛.陇东老区政权史.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

(作者系环县许家河初级中学教师)



解放兰州时的甘草店支前接待站

榆中县甘草店历史上是一个丝路古镇,也是一个军事要地。从西汉开始,历代兵家在甘草店内修筑一营(三墩营)、五堡(项家堡、邵家堡、正川堡、吴家堡、甘草店堡)。宋、元、明三代,甘草店内又修筑了3处烽燧。甘肃600多年前的沈儿峪大战就发生在甘草店车道岭一带。从民国8年(1919年)4月开始,甘草店境内发生过无数次的战争。民国26年(1937年)12月6日,日本9架飞机轰炸兰州,在甘草店上空被我军击逃,两架在车道岭与蔡家沟的一山沟击毁。民国38年(1949年),国民党陆军91军191师、571团团部及1、3两营驻甘草店。

支前接待站在艰难中建立

1949年8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二兵团从通渭莲花镇出发,经定西内官营,16日进入榆中甘草店。8月中旬,一支20多人的武装部队工作队驻扎甘草店,找流落红军唐代培来

联系支前接待站的事。负责人叫何三棋,同时还有来往唐代培家的田药客。有一个晚上,在唐代培家由何三棋主持,召开10多人的会议。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并号召群众要大力支援前线。何三棋说,要在甘草店建立一个支援前线的接待站,吸收青年参加。唐代培就将杨永盛和周天申介绍推荐。这时候兰州解放了,解放大军还在蜂拥而过。

8月下旬的一天,甘草店区通知,要杨永盛到甘草店接待站工作,负责筹建接待站的还有朱正亚、景玉明,田药客3人。一段时间里,杨永盛知道田药客是个买卖药材的人,满口陕西口音。因为唐代培是地方颇有名气的中医大夫,田药客常来往唐家,他住的甘草店积元堂中药铺,实际成了支前接待站的办公地点。这时候边筹建,边忙忙碌碌地展开工作。

田药客(田勤)、朱正亚、景玉明3人在这之前就做了很多宣传和革命工作。这年农历3月28

日,当地正在给泰山爷唱还愿戏,国民党八战区保安骑兵团每天派出成百匹马组成马队,在乡驮草、搜粮食、拉羊、宰猪、祸害百姓,老百姓恨得咬牙切齿。一天晚上,大戏班子正唱《窦娥冤》,骑兵团看戏的部队怪声怪气地喊,“要打死张驴儿”,并有一个姓秦的营长朝天放了几枪,顿时人声惨叫,戏也中止了,由于戏场门狭窄,看戏的群众踏伤了很多。人民群众散发传单。内容是“泰山泰山,活灵活现,压倒骑兵团,神威大显,赶走骑兵团,减少灾害”。杨书芳、李子杰这两个青年人,当时都给积元堂中药铺当相公,他和当地青年李效白、严世雄、米建雄等进步青年联合起来,共同商量要利用人民群众对骑兵团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创造舆论,“泰山爷是黄飞虎,虎要出府,会吃掉恶人”,并散发了很多传单。没多久,骑兵团的部队就换防开到会宁义杠川去了,为甘草店支前接待站筹措军粮打好基础。

1949年9月,负责筹建接待站的朱正亚、景玉明、田药客(田勤)将筹建情况提交甘草店区公所,甘草店支前接待站正式成立。

支前接待站负责伤病员运转

支前接待站的总任务,就是做好后勤工作,根据甘草店区公所指示,兰州解放后有相当一部分伤病员要转移到后方医院进行治疗。但甘草店医院只能容纳一部分,绝大部分都要来往转送,每天在这里食宿的大约近千人。根据这个情况,支前接待站务会议上研究布署:面粉供应组必须备足一百多石小麦,甘草店大小20多家粮店要备足小麦50多石,其次要从11个乡预备小麦60多石,大致可以满足供应。但是每天要加工出来面粉一千到两千斤,这就困难大了,想出的办法是,凡是有小石磨的各家各户,包括附近的农户,都摊派任务。全镇行动起来支援战役,这项工作一直到第二年约才结束。

(杨永盛口述,榆中县委地方志办公室周学海整理)

彭德怀在我家指挥兰州战役

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经过浴血奋战,终于解放了西北重镇——兰州。在此

战役中,指挥部设在我们村附近的乔家营,彭德怀司令员就住在我家运筹帷幄,指挥战斗。

我家在榆中县连搭乡大柳树村,离兰州约25公里。那年8月17日中午,我们全家正在院子里吃饭,有两位身穿灰布军装,胸佩“中国人民解放军”徽章的人走了进来。我父亲站起来让他们坐下。问他们是干啥的?他们态度和蔼地说:“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来解放兰州的。我们的大部队过两天就来了,想借你家的房子住几天行吗?”

我父亲说:“行!”然后又问:“我们该怎么称呼你们呢?”

一位军人回答说:“我们称你们是老乡,你们也叫我们老乡吧!”

说着,他们就把我家院子里的所有房子都看了一遍,用白粉笔在南北两面的堂屋门和大门口画上了记号。

约在8月19日傍晚,全家人刚准备入睡就听到“嘀嘀”的汽车声,接着又传来“当当”的敲门声。我打开门后,进来十多个解放军战士,把行李等东西搬进了院子里,然后只住下四个人:个子较高的一位住在上堂屋,中等个子的一位住在下堂屋,两个年轻的住在厨房里。并在大门口和上堂屋门口各安排了两个岗哨,院子里有一个解放军背着手枪来回走动。

他们住下后,下堂屋的那位中等个子解放军战士出来问我母亲:“大嫂,我们把窗户上的纸撕了行吗?”我母亲说:“行!”接着他们就把自己住的三间房子的窗户纸都撕掉了,两面堂屋的门也经常开着,院子里除了军人,只准我家的人进出,不准别人进来。

住在南北堂屋的两位解放军,人们都管他们叫“首长”。上堂屋住的那位首长经常双眉紧蹙,好像经常思考什么事,他时而躺在炕上,时而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时而和下堂屋的那位首长交谈。下堂屋的墙上挂满了作战地图,住的那位首长有时站在地图面前思考,有时拿着铅笔在地图上比划。每天从早到晚好些军人在下堂屋进进出出。这位首长一面听汇报,一面在地图前比划,军人们就掏出

笔记本来记,临走时,互相行个军礼。

这两位首长经常出去,但时间不定,有时在早上,有时在半夜。回来后先在地图上画一阵,然后端水洗脚。21日晚上,两位首长回来的很晚,并且通宵没睡觉。第二天天刚亮,他俩心情沉重的在院子里交谈。只听得中等个的那位首长说:“不行,我们向后拔一步!”个子较高的首长点了点头,说了几句什么我没听懂。

快到中午时,下堂屋的那位首长对我父亲说:“老乡,我们再有三天时间就把兰州打开了,你们就等待兰州解放军的好消息吧!”

“那太好了,我们就盼这一天那!”

他又说:“我们调了十几万人马打河州去了,现在,我们的队伍已经过了黄河了!”

我父亲说:“就是过了河北了吗?”他哈哈一笑进了下堂屋。

23日早上,天气阴沉沉的,中等个首长问我父亲:“老乡,天下雨不?”我父亲说:“天潮湿得很,可能要下些哩!”

“下些就好。”他指着村庄南边一个小山丘说:“那是正南吗?”我父亲回答说:“是正南。”他就进屋在地图上划了一下。

不一会,天刷刷下起了细雨。

25日,炮声“隆隆”响了一整天。26日凌晨,两位首长坐车前面走了。东方发白的时候,一个解放军拿着几张白纸对我母亲说:“大嫂,你们自己糊一下窗户吧!我们就要走了。”一会儿,进来两个勤务兵给我家打扫院子,扫完后就走了。

我家住的两位首长来去常常坐着一辆黄篷布吉普车,每人佩带一支手枪。住在上堂屋的那位首长面孔严峻刚毅,夜以继日的工作;住在下堂屋的那位首长除了工作外,还常和我们说几句风趣话。两人都穿着和战士一样的灰布军服,脚上穿着“牛舔鼻”青布鞋,被子是洗得发白了的普通军用被。所不同的就是每人铺着一条豹皮褥子。吃的多是炒菜和馒头。我母亲见他们工作劳累,伙食单调,过意不去,就做上臊子面让我给他们送去。我刚走到门口,两个门岗战士客气地说:“老乡,谢谢你。饭请你端回去吧!”我只好又将饭端了回来。

在我家短短七、八天时间里,我亲眼看到这两位首长为解放兰州夜以继日、辛劳奔波,但我不知道他俩到底是谁。直到兰州解放后,曾给那两位首长做饭的战士才告诉我们:住在上堂屋的那个个子较高的首长就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住在下堂屋那个中等个子的首长是参谋长阎揆要。

(周希芳口述,周学海整理)

我家有两张解放军留下的条据

我家现保存着两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解放兰州时购买烧柴的条据,其中一张是证明,上面写着:今证明王家湾村王育豪木柴贰佰捌拾斤,本军部一百斤,付人民币壹仟壹佰元,时间是8月19日;另一张是订单,上面写着:“今定到王家湾村王育豪先生木柴伍仟斤……”,落款是八〇部六支队二分队,时间是8月25日。

我出生于1933年,家住西兰(312国道)公路边的清水驿乡王家湾村,1942年入清水小学读书,1948年小学毕业后到县城服装店当学徒。1949年8月榆中解放前夕,因担心时局混乱,在外不安全,辞职回家。这一段时间,每天有众多的货郎子(肩挑着百货,串村入户叫卖的小商人)在我们家门口的西兰公路经过,晚上还有一些货郎子住在我们院子外面的高房子里,他们与父亲非常熟悉,有时父亲还留他们吃饭,有时父亲提供我们家做饭用的木柴或灶台供他们生火做饭。

我们当时的院子很大,房子也较多,在院子周围父亲栽种植了许多树木,到了农闲的时候家人砍一些木柴晾干用于烧饭或出售。到了8月16日的时候,西兰公路上有大批的解放军经过,我们不敢出去,只是在门缝里偷偷的看。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经与父亲熟悉的货郎子的介绍,有一些解放军住到了我们家里,他们是电台部队。他们吃饭在我们家的厨房里自己做,生火做饭的木柴由父亲提供。当时我问过父亲,“我们砍了用于出售的木柴就被解放军这样无偿使用了”。父亲告诉我,“解放军和国民党的军队不一样,用了人民群众的东西都会照价付款的,我手中就有解放军留下的条据”。

解放后,我就到了县城工作,父亲继续在家务农,时间不长,他因病瘫痪了。到了后来,他再也没有谈过这件事,直到去年我翻父亲的遗物,才发现了这两张条据。

(王家泰口述,榆中县地方志办公室沈明江整理)

六军指挥部和战地医院就设在我们村

我生于1940年,解放兰州时9岁。我的家位于和平镇邵家泉村的小河子,坐落于窰家山、古城岭、营盘岭山系之间,通过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到窰家山、古城岭、营盘岭上马家军的阵地。

1949年的四五月份,马家军就开始从兰州南山附近抓丁拉夫为其加固和维修国民党军在抗日战争时期修筑的国防工事,青壮年就开始外出躲避,防止被马家军抓走。到了七八月份,随着大量的马家军从平凉一带退守兰州,这种局面更加严重,妇女怕被马家军蹂躏和欺侮,带着孩子们到较远的官滩沟一带藏身,青壮年男子在附近的水洞里藏身,老人在家看门。我们家也不例外,除爷爷在家留守外,其他人都分头逃到外面躲避,由于走得急,27只绵羊没有来得及赶走。

到了八月十九日左右,藏身在附近洞穴里的父亲到官滩沟一带看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告诉我们:马家军已经被解放军赶到对面山上了,家里相对安全了。父母商量了一番,考虑到邵家泉一带正在打仗,母亲继续留在官滩沟,父亲带我回家放羊。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家门口、院子里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把守,从院子里拉出了许多的电话线,房顶上架起了多根天线,上房里挂起了地图,桌子上摆放了电话,有几位首长模样的人时而在看地图、时而在向外打电话、时而接听电话、时而在窃窃私语商量着什么问题。

回到家里以后,父亲和叔叔们一起去支前,帮解放军带路和运送伤员。由于外面正在打仗,本打算回家放羊的我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只能留在家里陪爷爷看门。

21日的时候,从窰家山、古城岭、营盘岭三个方向传来了隆隆的炮声和密集的枪声,我非常的胆怯,怕马家军打过来,把我们抓走,想往外跑解

放军不让我乱跑,只能在院子附近翘首远看或看炮弹飞过的弧线。

这一天,我们家南边的院子里有穿白大褂的或抬担架的人员进进出出,担架队把进攻营盘岭受伤的解放军指战员抬到这里进行包扎处理或简单的手术治疗,进行了紧急处理以后由担架队抬走。

猛烈的炮火和密集的枪声持续了一整天,到了晚上才渐渐地稀疏,但是担架队、支前民工的忙碌直到深夜还进行着,我在恐惧中度过了战争洗礼的第一个夜晚。

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枪炮声已经彻底的停止了,但是我们家院子里住着的解放军指战员没有一丝一毫的松懈,一会儿他们忙着向外打电话,一会儿与外面来的指战员交换着意见,一会儿向坐了半院子的解放军干部模样的人训话。南边院子里进出的担架队或穿白大褂的人没有前一天那样频繁了,他们行走的脚步声也没有那样紧张了。一夜间,南边院子对面的山头上多起了立着小木牌的几个土堆。

接下来的两天里天连续下着小雨,我还是不能随意走动,只能在自家院子附近玩耍,时间过得非常漫长,我们院子里住的解放军仍然在忙碌,整天有人进进出出,干着他们各自的工作。

25日早晨,我被一阵猛烈地炮声惊醒,翻身起来,听到的是密集的炮声或猛烈的爆炸声,这次炮火的密集程度或击中目标发出的爆炸声上一次战斗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上一次从营盘岭、古城岭、窰家山传来的炮声是时断时续,这次给人的感觉是同一个时刻,每一个方向都是同样的强烈。在炮声过后是密集的枪声或手榴弹、地雷、炸弹的爆炸声,一浪高过一浪。我们家的电话声一阵比一阵急促,南面院子里来往的担架队比上一次更频繁,人们的脚步声更紧张,空气中散发着的火药味更浓烈。

直到深夜,营盘岭、窰家山、古城岭方向的枪声渐渐远去,炮声、手榴弹或地雷、炸弹的爆炸声消失,我们家的电话声响得没有那么急促了。

在大战中,煎熬了一整天的我困极了,倒下身

子就呼呼大睡,直到第二天很晚了我才醒来。当我走出屋子的时候发现家里住的那些人不见了,门口把守的警卫也不见了,上房的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恢复了自由的我感觉到家里的每一件物品都非常地亲切,东瞧瞧、西看看,走到粮食囤子(北方用泥作的装粮食的一种器具)一看,装了满满一囤子糜子,差不多有二三千斤,上面还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老乡,我们宰了你们的21只绵羊,用这一囤子糜子折价做你们的羊钱。”这时我才想起了自己还承担着放羊的任务,迅速奔向羊舍,羊舍里圈着下剩的6只绵羊。此时的我非常激动,家里原有27只羊,21只羊换了1大囤子粮食,下剩的6只羊完好无损的在原地。我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跑回家向爷爷告诉我看到的这一幕。

回到家以后,我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看到的情况如实地告诉爷爷。爷爷听了我说的感到非常吃惊,“这怎么可能呢,解放军为人民的幸福奋不顾身的打仗,吃了几只羊,我们怎么收他们那么多的粮食,今天早上罗军长、张政委走的时候也没告诉我,有这回事吗?”爷爷跟着我到粮食囤子看了盛装的糜子,向我连说几个:“解放军他们是好人啊!罗军长、张政委他们是好人啊!”听了爷爷连连

发出的感叹,我问爷爷罗军长、张政委是谁?爷爷才告诉我,这一段时间家里住的是六军的军长罗元发、政委张贤约一行,上房拉了那么多的电话,原来是用做六军的指挥部。我们家南面邻居家的院子里有那么多穿白大褂的或担架队的人员进出,六军在那里设立了战地医院。对面山上出现的土堆是牺牲的解放军指战员的坟墓。

听了爷爷的述说以后,我怀着对解放军无比崇敬的心情追寻解放军,此时村子里已经没有了解放军。我来到了烈士墓前仔细端详了一番,每个坟堆前立着一个小木牌,上面用红色颜料写着烈士的姓名、牺牲前的职务,所在部队番号。

解放以后,直到在兰山建了统一的革命烈士墓,将这里的烈士遗体搬走之前,每到清明节来临之际我们在学校老师的组织下到烈士墓前扫墓,听老人们讲革命故事和烈士事迹,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

(朱永华口述,沈明江整理)

(接 65 页)

他呆在那个地方。”蒋介石对毛泽东竟然驻扎在与他名字谐音的地方感到愤慨和不能容忍。

此时在界石铺的毛泽东也觉察到这个地名怎么与“委员长”同名,他笑着在街石上跺脚说:“我们踏上了蒋介石的脊梁骨,再用劲一踹,他就要趴下喽。”彭德怀等人也笑了,也在街石上跺脚,跨步而过。10月3日,毛泽东和彭德怀在界石铺两次致电林彪、聂荣臻、彭雪枫等,布置各纵队近日工作。4日,红军各纵队从界石铺出发,兵分两路向六盘山一带前进。站在六盘山顶峰的毛泽东诗性勃发,文思涌动,一首气势豪迈的“长征谣”就在

六盘山巅极目远眺中吟成:“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六盘山呀山高峰,赤旗漫卷西风。今日得着长缨,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这就是后来经过修改后公开发表的《清平乐·六盘山》的原创。

这在中国革命史中是一段令人玩味的有趣插曲!

(作者系平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界石铺与蒋介石

朱克雄

界石铺位于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西北部,是高界乡政府所在地。这本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乡村,因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在此宿营和1936年9月党中央派红一方面军主力西进,再次与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在此会师北上而闻名,这是众人皆知的事情。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地方还与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也有瓜葛。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1935年9月17日,中央红军第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共七八千人突破天险腊子口,20日到达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张闻天、毛泽东就住在了“义和昌”药铺。哈达铺的“义和昌”也应了仁义之师必然和顺昌盛之意,在这里改变了红军和中国的命运,喜欢看书看报的毛泽东从警卫员陈昌奉抱来的一堆旧报纸里看到了希望,毛泽东依据《大公报》上“陕北共匪刘志丹拥20万之众,盘踞一方,作恶多端,蒋委员长已下令限期剿灭”的这条消息,提出了“把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的主张,并得到了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博古等党中央领导的一致同意。

红军离开哈达铺之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北出岷山,度过渭河,于9月27日到达通渭县榜罗镇。蒋介石得知红军一部北出岷山后,急调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和西北军、东北军主力在西南公路和平凉至宁夏的公路上布置封锁线。红军陕甘支队势如破竹地向北挺进,使得远在成都指挥“剿匪”作战的蒋介石大吃一惊,直到有情报报告说毛泽东就在北上的红军队伍中,蒋介石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我猜想这挡不住的小股赤匪中就一定会有毛泽东,换个人是没有能耐冲破我的重兵之围的。”10月初,蒋介石不得已,只能将“剿匪”大本营转移到西北,并亲自兼任“剿匪”总司

令,张学良担任副司令,司令部设在西安。7日,蒋介石从成都飞至西安,具体部署围剿毛泽东仅有的数千红军。

蒋介石问张学良:“毛泽东现在到了哪里?”

张学良回答说:“据侦查,在界石铺。”

蒋介石听后,心里直犯嘀咕,又问道:“哪两个字?”

“界限的界,石头的……”张学良突然觉得这地名一说出口有点别扭,心里暗想怎么这地名和委员长同名,就连忙解释说:“这个地方属甘肃省静宁县,大概是静宁与会宁的分界地点,所以才这么称呼。”

“分界地点?怎么……”蒋介石皱着眉头,心里很不舒服。

据说蒋介石这个名字的来历很多,其中有种说法,说他是封建帝制的“界石”。从蒋介石后,中国最高统治者不再称皇帝。蒋介石立志要在中国历史上树起一块标志性“界碑石”,取消皇权制就以他为界碑,统一的中国不再出皇帝。中国的发展也果然如其名。统一中国称帝的袁世凯做了83天的皇帝梦,无论时间长短,这个袁大头总是当了皇帝,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称帝的人。孙中山是中华民国的创始人,但他没有统一中国,“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成了他的最后遗言。清室溥仪在伪满洲国称过皇帝,但他那个皇帝如同乡村土匪占山为王的“山大王”称皇帝,在性质上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在国际上都代表不了中国。只有到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果然成了统一的中国的元首,尽管时间不长,但他毕竟成为一块结束中国封建帝制的界石。从这个意义上说,当蒋介石听到毛泽东占领界石铺后,心中自然感觉是别别扭扭的。“把毛泽东撵出那个地方再打,不要让(转66页)

张学良首次西北之行 及其《怎样来开发西北》演讲

荷重

在中国近代史上,张学良将军(1910—2001)以1936年12月12日与杨虎城将军发动西安事变,联共抗日,为结束十年内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全民族抗战作出历史性贡献而载入史册。这位青年时代即为“爱国狂”,20岁时以暂编奉天陆军第三混成旅长而晋升为陆军少将,历任东北海军总司令、华北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指挥、豫鄂皖“剿匪”副总司令、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总司令),以及国民党中央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东北大学校长等官职,1934年4月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的“少帅”,曾于1934年10月12日至22日,以豫鄂皖“剿匪”副总司令的身份,陪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夫妇到西安、兰州、银川作为时半个月的巡视之行。

10月12日,蒋介石一行从洛阳到达西安,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在行辕召见邵力子、杨虎城,接见陕西各当局要员,同游西安碑林,出席西安扩大纪念周会议并讲话,宴请旅陕外国传教士,校阅杨虎城直属部队。17日从西安飞抵兰州,陪同蒋介石召见朱绍良、邓宝珊、胡宗南等军政要员,听取治安情况报告,游览省府后花园,登北城拂云楼,远眺黄河铁桥、白塔山,视察织呢厂及西郊小西湖一带农村,并参与招待在兰的外国传教士。蒋介石本拟前往青海,但因雪未成。19日下午偕青海省主席马麟父子飞抵宁夏,蒋介石和张学良在第十五路军总指挥部大礼堂接见各界人士,蒋介石作“开发西北,建设宁夏”演说。20日下午返抵西安,继续在陕西活动,谒周文王、周武王陵及周公墓,

蒋介石令陕西省举办修筑道路、设电气厂、保护物品、爱护牲畜等十件事。22日返回洛阳后,蒋介石继续北行巡视,张学良“因部务亟待处理”,故

乘飞机返汉口。

张学良返回汉口后,于10月23日接见新闻媒体,畅谈其西北之行的感想。他在对武汉新闻记者谈话时称:“综计此次出巡,历地四省,历时半月,对于视察感想,觉西北之伟大与未至西北以前想象者迥然不同。所见左宗棠征新疆时修筑之由潼关至新疆大道,闻当时两旁树木葱笼,绿荫蔽日,行人极为称便。万里长城,横贯境内,蜿蜒不断。又有秦渠唐渠,皆为极伟大之建筑。惟路旁树木,历年被伐甚多,近年正力加培护。兰州建筑物,亦甚雄峻,其气魄与北平相仿佛。在前清时,已有左宗棠所办之兰州织呢厂等,与黄河大铁桥,规模均极宏大。宁夏北倚贺兰山,南瞰黄河,形势尤为壮伟,允为军事重地。惜地瘠民贫,不如陕、甘富庶。余以为开发西北,须先注意发展交通,好在陇海铁路已通至渭南,本年底可延至西安,定明年元旦,正式通车。西安至兰州公路,由全国经济委员会修竣,亦可勉强通行。但此仍属初步工作,此后尚待继续努力,亟盼国人对于西北加以深切注意,共谋边疆发展,民族前途,实利赖之。”他对天津《大公报》记者也说:“西北随处富藏,如兰州亦殊未如外间想象之凋落。”29日,张学良在武昌总理纪念周会议上,再次表示西北视察“这一趟,增强了我对民族复兴的信心。西北是中华民族固有文化的发祥地,我们将来也必能在那里建立起中华灿烂的文明。”

10月18日,张学良随蒋介石在兰州召见党政机关领导、各团体、各学校代表后,又在甘肃省府中山堂向各界人士作了《怎样来开发西北》的演讲,阐述了他对开发西北认识,声言开发西北必须“革除自私心”“服从最高领袖领导”。在谈及开发西北的意义时张学良说:

1.甘肃具备复兴民族的基本条件。甘肃在《禹贡》为古雍州之地,形势险要,风俗淳厚,物产丰富,在历史上如张博望、马伏波、左季高诸人,都在这一方面立有伟大的功绩。近百年来,我国沿海各省因接近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缘故,殊不知远处西北的甘肃犹能具备复兴民族的基本条件。所以最近二三年来,全国一致喊出一个开发西北的口号,而中央在同样认识之下,也正加以莫大的注意。这次委员长带同兄弟来到这里巡视,也是以此动机为出发点。

2.我们的祖先在西北给予子孙留下的凭藉是十分雄厚,如能发扬光大,庶几无愧。我们民族文化的动向,是由西北演进到东南,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可见我们祖先在西北遗留给子孙的凭藉,是十分雄厚。今日我们来开发西北,也是一种返朴归源的复兴民族运动……

3.美国西进政策的成功是我们开发西北的好榜样。兄弟到西北后所得的第一个印象便是西北是伟大的,西北山川伟大,建设伟大,处处都表现出来伟大。现在中央正进行开发西北的工作,全国民众也在高呼开发西北的口号,将来一切计划逐步实现,西北前途不可限量,实亦复兴中国的基础。美国革命后的十三州都是在东部,西部也是一片荒凉,后来美国政府提出西进政策,不到三十年的工夫便成效显著,美国也就因为西进政策的成功而更强盛起来。美国能那样,难道中国就不能了吗?况且开发西北绝不是难事,只要我们下最大决心,定很快的就有成绩表现出来,比美国西进政策还容易得多。因为美国西部原是榛莽未辟之区,美国人西进时,用了很大的力量先作些披荆斩棘的工作,而后方能从事于各项建设。这种情形,在我们来开发我们的西北的时候,一点也遇不到。相反的,我们的西北在文化上原比东南更为先进,我们的固有文化在西北方面根深蒂固。所以我们今日来开发西北,与其说是开发西北,还不如说复兴西北更恰当些。那么很明显的,复兴是比开发容易很多的。

4.开发西北必须全国一致动员,住在西北的人更要作先锋队。开发西北虽然比美国西进政策

容易,可是也非得集中全国人力物力,中央与地方合作不可。现代国家的政权,固然要集中于中央政府,一切大计也要由中央来决定,然在实际建设上,是绝对需要地方来协助的。就开发西北一事而言,只靠中央努力很难成功,一定要与地方合作,共策进行,这才能成功得快,才能获得最大的效果。进一步来说,开发西北固须全国一致动员,不过诸位住在西北的人,熟悉西北的风土地势,西北的开发和诸位的关系也更深切一些,那么诸位当然要作开发西北的先锋队,要在各项建设事业上特别努力的向前干。

张学良在演讲中也提出了如何开发西北、复兴民族的设想,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和阶级立场的制约,他给出的所谓“开发西北以革除自私心为第一要务”、要“在最高领袖领导下开发西北复兴民族”的对策,并不是使口号变为现实的高招妙策;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长期坚持反共内战的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反动政府、怎有可能立党为公、革除私心、真心实意地去“开发西北”复兴民族呢?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整个西部地区面貌日新月异、欣欣向荣。作为一个国民党军事家、政治家的张学良将军,在八十年前力倡开发西北,并认为开发西北“也是一种返朴归源的复兴民族运动”;而实现这个民族复兴大业,“只靠中央努力很难成功,一定要与地方合作,共策进行,才能成功得快,才能获得最大的效果”,他的这些“发于衷心的老实话”,今天读来,仍有启迪后人的现实意义。

(本文资料参录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张学良年谱》)

(作者系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原秘书处处长)

迁此并置镇。包兰铁路和皋(兰)营(盘水)公路横穿南北,为该县商贸中心。1980年4月建镇。

一棵树烽燧:在甘肃敦煌市南湖乡二墩村北小方盘城遗址西南65千米。烽燧建在盆地一高出地面十多米的风蚀台地上,以土坯夹芦苇砌筑,东北角立胡杨木柱一,面积18平方米。在近处F2、F5两房屋遗址,发现西汉木简12枚及木器、丝绸、麻布等,其F5出土一件完整封检,有西汉“元康三年”纪年。是研究汉代西域丝路南道,北道交汇和军事防御体系的新资料。

一个庙石窟:敦煌石窟群之一。在甘肃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城北约20千米党河东岸吊吊水沟中北面断崖上。现存东西洞窟。上窟上限在五代或更早,下限为近代。壁画内容有西方净土变、佛像、弟子、菩萨、供养人像及榜题等。

一百四戈壁:在甘肃肃北、敦煌、瓜州三县市交界处。于野马山与三危山之间,党河与榆林河之间长约140千米,故名一百四戈壁。野马山北麓山前洪积扇面积约4200平方千米,为风力大、植被稀的荒漠景象。

一〇九国道:亦作109国家级公路。北京至拉萨公路。经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入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石嘴山、银川、吴忠、中宁、甘肃省白银、兰州、青海省西宁、湟源、都兰、格尔木、过昆仑山和唐古拉山口入西藏。宁甘青地段为旧日兰包、兰青、青藏公路。全长3763千米,现为全国东西向公路主干线之一。

二坝渠:在甘肃临泽县境内。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杨博于平川置屯田,疏竣其渠。渠开口在板桥堡,渠首无坝引水。清代灌田1259亩。1952年灌田达10636亩。至1990年,保灌平川土地1.37万亩。

二道沟:在今甘肃玉门市清泉乡东的二道沟,为去西域所经地。今甘肃玉门市西北97千米的柳河乡政府治地。

二将山:在甘肃华池县子午岭中段的老爷岭东侧山庄乡境内,峰峦高耸,林木茂盛。山腰宋天禧五年(1021年)置马铺寨于此,为庆原路第二边

将营驻扎处,故名。宋庆历二年(1042年)复筑大顺城于此。

二将城:在甘肃华池县山庄乡境内,地处葫芦河上游二将川南岸山梁上。《庆阳府志》载:“第二将城,在府东北一百二十里,相传为第二将驻师处”。长方形,残高5米。此城西北距华池县(宋柔远砦)15千米,扼二将、铁匠和阴洼三川之咽喉,地势险要,为宋夏战争时期北宋军队所筑军事要塞。

二郎山:在甘肃岷县城南,是县城屏障,长15千米。解放前后植树造林,现有松、杉等树近20万株。二郎山亦名金童山,另详见金童山条。每年农历五月十七二郎山花儿会为洮岷南路“花儿”会之最。是日传为二郎神杨戬诞辰日,宋代以来酬神以歌祀之,由来悠久。二郎山隋代名崆峒山。属南秦岭支脉。今为“联合国民歌考察基地”。

二郎庙:在甘肃成县城西北22千米。原以当地祀二郎神建庙而名,今为地名。1958年建二郎公社。1983年改乡名至今。在甘肃合作市北端东坡台地上。庙建于1936年,汉族寺庙,有殿堂等,后毁。1988年重建,今主殿堂面积1400平方米,主神二郎神,两旁为关公财神和太子山山神。另有南北侧殿。庙后寺院有主殿、南殿、北殿各塑多位神像。寺庙外松柏葱绿,风景宜人。

二夹皮村:在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马蹄区西水乡境内。1979年8月在此发现一座唐墓,为土室墓,有墓道、甬道、前室、后室,墓中出土金银器、铜器、木板画等总计143件。风格独特者有鎏金六棱铜杯、鎏金铜托盏、银匱、菱花形高足折叠鎏金铜盘、单螭带盖镶绿松石金罐等。

丁令溪水:在甘肃成县西北。《水经注》:“丁令溪水北出丁令谷,南迳武阶城西,东南入浊水”。《成县志》:“今有东河在县东,源出秦州,南入龙峡,合南河,即丁令溪也”。《清一统志》谓东河即古渥阳水,非丁令溪。

丁家闸壁画墓:在甘肃酒泉县城西8千米戈壁滩上,属果园乡丁家闸村。此墓1977年发掘,其5号壁画墓用平砖垒砌,分前后两室。前室四壁及

顶部满绘彩画,后室只在后壁施画。壁画内容包括天、地、人三界景物。是河西走廊首次发现的东晋十六国时期大型壁画墓葬。该墓系长墓道砖筑双室墓,墓道长33米,宽1.42米,壁画丰富,在河西甚至全省也是规模大者之一。在酒泉市至嘉峪关市中间地带,分布有魏晋、十六国时期大面积墓葬群,其南面为312国道,东至酒泉市果园乡,北接嘉峪关市新城乡野麻湾,西北达断山山麓。这一墓葬群南北长20千米,东西宽34千米。酒泉丁家闸5号墓为其代表。

七圣:在甘肃渭源县城东北10千米,原称祈神坪堡,旧为该县防守堡垒,今存遗址。境内有七圣山而名乡,乡政府驻唐家河村。石堡子至红岷梁有秦长城遗址。

七方关:亦作七防关。南宋抗金名将吴玠曾由七方关出师祁山。明属阶州,设巡检司于此。在甘肃武都县东北140余千米,地处通略阳的古散关道上。

七佛沟:亦称千佛崖、千佛寺。在甘肃武山县拉梢寺石窟西北0.5千米。沟内有洞长约25、深8、高25米石窟。佛龕编号29个。16号龕原为七佛像,现仅存1.20米高的佛头一个,以6,10,14,16号龕保存较好,有菩萨、弟子、一佛二菩萨二弟子像。

七佛阁:亦称七佛龕,即今麦积山石窟中最大的四号窟。石雕外貌极其伟丽。为北魏时建造最早的一石窟。北周闵帝元年至武帝天和三年(557-568年)大都督李允信为追荐亡父在麦积山造七佛阁。庾信撰《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龕铭并序》记述有麦积山佛事盛况。《玉堂闲话》中称“其上有散花楼,七佛阁,金蹄银角犍儿”即指此。距地面高50多米,仅窟外长廊长30.50米、高19.7米,开如宫殿,异常壮观,为麦积山主窟,窟内分为七佛龕,龕内刻坐佛大像,两旁立菩萨六,有老翁及女像,皆极精美,七个佛龕一列。

七里镇:在甘肃敦煌市城关镇西3.5千米,以距敦煌旧县城七里而名。该镇祁家湾和孟家桥以西戈壁滩上有南北长约20千米,东西宽约5千米

的魏晋时期墓葬,20世纪80年代甘肃省文物局考古工作者曾作过部分发掘工作。此地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为青海石油管理局和石油工业部运输公司驻敦基地。1956置镇,已发展为新兴城镇,有学校、银行、邮电、百货、饮食服务设施,为农副产品集散地。1986年升副县级镇,为敦煌市第二大镇。

七山乡:在甘肃永登县西南51千米。以境内有池沟口、王家庄、上吴家、小钱家、赵家拐子、马家坟沟、荒涝池7座山岭取名。乡政府驻庞沟村荒涝池。

七道梁:在兰州市七里河区南部与临洮交界处。原盘山公路有七道弯曲而名。地势高且甚险。唐宋置摩云关,元明清设摩云驿。民国以来甘川公路经此。今212国道穿越七道梁隧道不再经七道梁。另见七道梁隧道条。

七道沟:今甘肃瓜州县河东乡西北的七道沟村。清代驿路所经地。

七真观故址:在甘肃陇西县城南门外。道教寺观。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始建。兴盛于元末明初,观内常住道士二三百人。北七真之一的邱处机曾任道长;其弟子黄青松、杨明道、梁志通、李涵虚等,亦在此任过道长。清以来毁于兵燹。今仅存元祖碑一通,有一定文物、文史价值。

七七桥:在甘肃华池县大风川。1944年,八路军385旅770团为方便陇东军民交通运输,开辟了自大风川起翻大瓜岭至合水县千秋子的大车道,并建石墩木梁桥一座,以纪念抗日战争始于“七七事变”,并含770团编制番号,故名。桥长24米,高3.5米,宽4米。

七仙崖:又名仙人崖,在甘肃成县城南3.5千米南山之巔。这里林茂竹翠,正面峭壁有七尊天然“群仙出游图”,须眉、衣带楚楚动人,《广輿记》已载入该书。七仙崖隋唐已有寺庙之设。后多圯。近年兴建有北极阁、祥祖观、玉皇楼、瑶池宫等。

七麻堡北宋置。在今甘肃通渭县西。

七防关:古称散关。东汉武都郡太守李翕令军民整修散关道路。南宋为抗击金兵蜀关隘。明设七防关巡检司。在今甘肃康县西北2.5千米大山岔。

七工堡子:在甘肃瓜州县渊泉镇西南15千

米。清雍正时移民耕种于此，排序号为七，故名。附近有百齐堡城遗址，今南岔乡政府驻此。

七里河：在兰州市城关区西南七里，唐宋以来将境内一条南北向小河称七里河至今。此河上游称黑鹰沟，全长 25 千米，北注入黄河。1956 年成立七里河区。七里河区下辖 9 个街道、7 个乡、1 个镇，人口 37.63 万人。七里河区在 20 世纪四十年代已发现曹家咀、青岗岔等重要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遗址；有沈家岭、狗娃山战役纪念地和华林坪革命烈士陵园。

七仙女峰：在甘肃玛曲县西部木西合乡政府所在地下游 10 多千米处，地处九曲黄河第一弯曲部南流段南部。在巴颜喀拉昆仑山脉绵延的脚下，为七座高低相依山峰，均生长松柏、灌木。当地牧民群众每年农历六月十五日前往煨桑祭祀。

七一冰川：在河西走廊距嘉峪关市 128 千米的祁连山上，是一座被称为亚洲离城市最近的冰川。因冰川考察队员 100 多人于 1958 年 7 月 1 日登上海拔 5145 米的冰川最高点，故以七一冰川命名而载入中外文献。后从航空相片上量算，这条冰川长 3.5 千米，最宽处 2.4 千米，上宽下窄，上面由 4 个粒雪盆组成，下面伸出一条冰斗，即山谷冰川。估算此条冰川厚度 100 米左右，储冰量 1.6 亿立方米，相当于北京十三陵水库蓄水量的二倍，是难得的固体淡水水库。1986 年以来，每年夏季有国内外旅行者到冰川观光，丽日、蓝天、冰川、雪峰交织成神奇美景。

七道梁隧道：七道梁在兰州市以南 20 余千米。山顶海拔 2660 米。元明清梁上有驿道通行并置摩云驿。1935 年始建甘川公路经此梁，现为兰州至重庆 212 号国道地段。七道梁隧道建于公路 22 至 28 千米盘山越岭处，采用先进新奥法施工，全长 1560 米，缩短从梁上行走 4.5 千米，是目前甘肃洞身最长、设备最完善的公路隧道。

七里河黄河大桥：在兰州市七里河区，是连接七里河区、安宁区的桥梁，南连敦煌路，北接安宁路，与兰新、兰青、兰包公路相通。桥型为 7 跨钢筋混凝土双悬臂加挂梁结构，中间 5 跨，跨径 40 米，两边边跨跨径各 30 米，全长 276.12 米。桥面总宽

18.40 米，车行道宽 12 米，人行道各宽 3.2 米。1956 年 10 月 8 日开工，1958 年 11 月竣工，12 月 11 日验收通车。铁道部第一设计院设计，乌鲁木齐铁路局桥梁工程队修建。为国内当时新建的黄河上最大跨度的一座钢筋混凝土悬臂桥梁。1981 年 11 月至 1982 年 5 月加固抗震。1990 年，担负交通流量机动车 19270 辆，非机动车 52761 辆。至 2010 年仍坚固使用。2010 年 10 月至 2011 年 5 月整体桥加固。2011 年 5 月开通。

七十二道：在甘肃会宁县城东至青江驿河谷地段。明清之季祖厉河上游山谷为去静宁、平凉要道，溪水左盘右绕行旅多赤脚涉水而过，故名。今已全部建有桥梁，方便交通。在甘肃渭源庆坪镇至临洮窑店镇间涧谷中。古代无桥需踏水而涉，隋唐历明清百姓歌曰：“狄道到渭源，七十二道脚不干。脚干了，上山了，路平了，进城了”。

十方庵：俗称药王洞，在兰州市城关区西南隅千余米段家山脚。庵创建于清前期，为各地来兰道士陆续开挖，遂成出家人挂单栖身之所，故名十方庵。原凿有老君、菩萨、邱祖、药王四洞；嘉庆间新建悬楼五间，厢房四楹，其后又凿百子宫、关帝圣君诸洞。现存六洞，深 4—6 米，高 2—3 米。今悬楼及嘉庆时立《十方庵碑》皆完整保存至今。

十九泉：唐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之十三有“近接西南地，长怀十九泉”。在今甘肃成县西南四十里。

十里店：在兰州市黄河北岸，为通往河西要道。明清民众设客店商铺于此，以地距兰州十里而名。今设十里店街道办事处，是安宁区区委、区政府所在地。为兰州市蔬菜生产基地之一。西北师大、兰州铁道学院（今兰州交通大学）、甘肃农大、省党校等高等院校设此。

十字镇：亦作什字镇，在甘肃灵台县城西北 20 余千米塬上。由此东去陕西长武，南至陕西凤翔，西到甘肃华亭，北去泾川，地处十字路口，故名。镇东数千米处有晋代安定朝那（今灵台）人，大医学家皇甫谧墓，近年扩建陵园，其总面积 90.5 亩，主干道长 440 米，宽 30 米，有牌坊门、阙门、神

道、献殿、纪念馆、侧殿、回廊、办公区、停车场等。另见什字镇条。

十万沟：在甘肃平凉市崆峒前峡轩辕谷，十万沟的水是泾河上游源头之一。沟水有数十条瀑布、三处大水潭；十万沟坎沟河以西百米有“石人洞”，五龙堡下有“将官窑”。十万沟中有数十种国家保护珍贵动物如金钱豹、麝、鹿、锦鸡等。相传沟内古代曾困死十万兵而名。

十八里铺：在甘肃古浪县城东南 18 里，故名。《五凉志》载，明季称岔路墩，为巡守瞭望军事墩台。地处古浪峡腹地，史称“峡路一线，扼甘肃之咽喉”。今境内有曹家湖、十八里铺两水库，保灌土地面积分别为 3.5 万亩及 6 万亩。1984 年始设十八里铺乡至今。在甘肃定西县城北十八里铺的响河子沟口。明清两代为兰州、西安间骆驼、脚户、担担手的捷径，光绪间设关卡征收厘金，有店铺、当铺、饭馆多处，商旅日夜不断。今为岷柳高速公路与 310 国道交汇处，设卡缴费，交通仍处要冲。

十二连城：在甘肃西和县城区东西两山。以高堡（今上城）为中心，有下城（今县城址）、皇城（今马隍城）、小皇城、斜坡堡、五里铺堡、塔堡、东山堡、山堡、东台堡、陈山堡、崆峒堡。自北宋末岷州镇将李永琪在西和县城南山（今凤凰山）重筑新城，即称十二连城，连城地域东临县城，西至何家

湾，南跨皇城岭，北依白水河。南宋宣抚使吴玠为抗御金兵再次修整。明清两代断续使用。当年十二连城依山而建，墩台互峙，城堡相犄，在控扼陇蜀要道上曾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今部分城堡遗迹仍有残存。

十八盘山：在甘肃通渭县西南 50 里，旧为县境控扼之处。

十字道村：在甘肃甘谷县渭阳乡境内。1971 年 12 月当地农民平田整地中发现一座古墓。后经发掘出土陶器、铜器、铁器等随葬品 110 余件，汉简 23 枚。甘谷汉简是继武威汉简之后的又一次重要考古新发现，为汉代刘姓宗室墓，死者手中握有一份诏书，是珍贵的历史档案文件。

十二连环城：在甘肃天水县汪川乡和礼县盐关乡、宽川乡交界处，城堡筑于凤凰山。起自天水白关堡，至于礼县廖集寨，绵延 15 千米，共筑城堡十二座，人称“连环城跨凤”，为南宋抗金名将吴玠率兵士筑。其中二、三、四城尚存残迹。又在平川地带纵横凿渠，每渠宽八尺，深丈余，初凿 360 条，后增至 554 条，形如地网，构成立体防御工事，金人一筹莫展，天水始终由宋军牢固据守。

（作者系兰州市博物馆退休干部）





兰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召开年鉴工作暨 培训会议

8月27日上午,兰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在市委西楼7楼会议室召开了全市年鉴工作暨培训会议。市直各部门、市级各单位及中央、省属在兰有关单位、各县区志办分管负责人及年鉴供稿人100多人参加会议。会上市志办对《兰州年鉴》编纂情况进行通报,对2012卷、2013卷优秀供稿人员进行表彰。市政府副秘书长张成虎参加会议并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出三点要求:要立足时效性,

提高工作认识;立足服务性,强化编纂质量;立足信息化,搞好人员培训。要做好今后年鉴工作,进一步提高编纂质量,确保年内出版发行。会上市志办采取以会代培形式,邀请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编审夏红兵对全体与会人员进行了年鉴有关知识的培训。

(兰州市地方志办公室供稿)



陆海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座谈会 在兰州召开

2014年8月11日,广东海洋大学副校长朱坚真教授一行7人来我省就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问题进行专题调研,为此,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甘肃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民盟甘肃省委联合在兰州与广东海洋大学调研组召开了“陆海丝绸之路历史文化专题交流座谈会”。

省地方史志办副主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参事车安宁主持会议。

朱坚真说,此次来甘肃考察,是为了响应党中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伟大战略构想,如何应对新的国际局势和经济全球化,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而设定的。甘肃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节点地区,历史文化厚重,有关陆上丝绸之路历史资料和素材大部分都来自甘肃,这次来考察就是要了解古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了解甘肃省委、省政府如何理解执行习总书记的意图,有哪些思路和举措。同时,他还介绍了海上丝绸之路和我国实施海洋战略的有关情况。

政协甘肃省委副秘书长、民盟甘肃省委副主委周鹰简要介绍了民盟甘肃省委正在筹备的“陆海丝绸之路·文化与产业发展研讨会”情况。他说,重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战略意图十分明显,打通丝绸之路,有利于丝路沿途各国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使欧亚各国(尤其是我国与俄罗斯)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为广阔。为此,民盟甘肃省委决定年底在甘肃召开“陆海丝绸之路·文化与产业发展研讨会”。并在盟内外、省内外广泛征集论文。会议还将邀请民盟中央领导、国内有关专

家学者参加,相关筹备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此次研讨会是民盟甘肃省委联合民盟福建省委、福建省泉州市政府、甘肃省敦煌市政府共同举办,会议被纳入敦煌丝绸之路国际文化博览会,是博览会众多专题中的一个重要专题。

甘肃省人民政府参事吴仲英指出,民族和宗教问题是困扰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难点之一,忠实执行好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正确处理好民族宗教事务是事关我省社会稳定、经济向前发展的重要举措。她建议,中央应对甘肃民族宗教事务高度重视,要妥善解决民族宗教的个别遗留问题。

甘肃省人民政府参事、省政协常委唐援朝指出,我省是多民族聚居地区,民族文化多元性特点突出。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欠发达,历史欠账较多,建议要加大对我省政策倾斜、资金投入,加强我省基础设施建设,希望国际航空自由港能落户兰州,与兰州国家级新区形成优势互补,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助力我省经济社会发展。

民盟甘肃省委副主委、中科院兰州分院化物所专家刘刚指出,我省是一个资源性缺水省份,国家从生态战略考虑,对我省黑河等内陆河实行分水,虽然我省张掖等地区农业用水受到很大的限制,但黑河下游地区,尤其是内蒙古居延海生态恶化的趋势得到遏制,对整个流域的生态平衡发展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车安宁在发言中介绍了陆上古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并总结了其历史文化特征,指出:这条古丝绸之路是利用陆路交通线来进行商品贸易,而商品贸易的高度发达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现代贸易是利用航空、铁路、

公路、管道、电网等多种运输方式来实现商品交易的,因此要发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作用,就必须建成一个畅通无阻的现代立体化交通运输网。同时从国家战略角度看,应把陆海丝绸之路统筹规划,统一运作,实现陆海通道的大循环战略。

出席座谈会的还有广东海洋大学继续教育学

院副院长许国炯教授、何国明教授,广东海洋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培训办主任王继全,民盟甘肃省委研究室副主任郭文君、办公室副主任丁富强等。

(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车安宁供稿)

榆中首部村志 ——《东古城村志》出版发行

近日,由榆中县地方志办公室全程指导修改,清水驿乡东古城村编纂的榆中县有史以来第一部村志——《东古城村志》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村志不仅填补了榆中县没有正式出版村志的空白,同时也是全市乃至全省正式出版的极少数村志之一。

东古城村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文化积淀丰厚,区位优势独特。这里地处苑川河中游,土地开阔,地势平坦,水利条件优越,是汉代牧师苑的中心地区。东晋十六国时期,乞伏国仁建立西秦国,以此为都 18 年。唐代又进行加固。明时在此驻军屯田。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在此修建机场。解放后,多条铁路和公路穿境而过,多家企业落户该村。在党的领导下,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东古城村各项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榆中县地方志办公室非常重视乡村志的编

修,东古城两届村党支部、村委会非常重视对历史的挖掘整理和对现实的记载总结。《东古城村志》在村志体例的确定、结构的安排、资料的取舍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是我县现代村志首创之举。

这部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全面、系统、客观地记述了东古城村数千年来的发展,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东古城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不断改善生活环境,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是东古城村的一部百科全书,具有“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服务当代,垂鉴后世。

(榆中县地方志办公室供稿)

崇文楼记

王兴和

公元2011年,政局稳定,经济发展,崇尚文化,重视教育,带动旅游,建崇文楼。圣人请驻,刻诗赋学士名人于其上。正修县志,附记载史。

崇文楼于二零一一年三月奠基,二零一二年八月告竣。耗资二千五百万元。楼总占地面积一千七百三十五平方米,建筑面积一千一百二十四平方米。

崇文楼取“崇文尚德·大运高台”之意。为延续人杰地灵、源远流长文脉,激励学子,求学上进,回报故土,建设家乡而建。楼由台明、楼身、宝顶三部分组成,四面五层,重檐攒尖顶,通高四十一米。钢构框架,沉雄劲挺、飞檐鸾回、绮窗洞达、丹青绚丽、陈设精美,金碧辉煌、气势磅礴、熠熠生辉。既饶江南古韵,更具世纪新姿。

楼有广场、亭廊、状元桥、状元马、如意钟、左右廊亭,东西别墅等景观。广场面积一万三千九百平方米,设水上栈道、回廊。状元马后有东西回廊二个,回廊雕刻故事十二个,刻古今历史、人物于其上。西回廊雕大禹导弱水入流沙、周穆王西巡见王母、霍去病征战河西、段业割据建康建北凉、王孝杰置建康郡、唐玄奘晾经台子寺的历史。东回廊刻杨博修筑河西长城、年羹尧黑河均水、慕国典修三清渠、郭长堃办县学、董振堂血战高台、高台和平解放的故事。状元马以骆驼城出土汉代战马为型,高三点二米。骑者意寓一马当先、马到成功。如意钟寓意祈福纳祥。以响铜铸造,直径一点五米,高二点三米,壁厚十厘米,重约四吨。状元桥取“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寓意。修此桥,愿学子努力,文运亨通,金榜题名;激各行业“状元”“能人”,

共同奋进,为社会贡献。崇文楼布展,寓天人合一。以天、地、神、人布局,分能人、贤人、圣人、神人、天人。从地到天取五子登科、步步高升之意。一层“文汇高台”、能人志士;二层“崇德尚贤”、历史名人;三层“至圣先师”、国学精粹诸子;四层“文昌运转”、神话人物;五层“仰望星空”、天文知识。

在崇文楼登高远望,美景全映眼帘:南湖北河。湖面波光粼粼、农田围依、林木渲染。极目四望:南眺祁连雪峰、山舞银蛇,北览黑河弱水、潺潺流淌。祁连雄风,恢弘壮丽;黑河玉带,奔涌千里。祁连串绿洲,黑河奔西流。欲览河西景,须登崇文楼。河西胜景在高台,登楼游览识河西。

春日。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冰雪消融,绿草如茵,河水如玉带西流。湖岸河柳如织,如绿色珠帘低垂。

夏日。俯瞰全湖,远方轻纱薄雾笼罩,林海蓊郁一片,扑朔迷离。两岸村庄缕缕炊烟。楼下花木流光溢彩,浓绿如洗。旭日遥远河畔升起,霞光照耀平静水面,泛起点点金光。湖面波光粼粼,岸柳随风起舞。向东北远眺,林木葱郁。南瞰龙宫平卧湖面,令人心弛神往。湖道两旁,乔灌错落有致,绿树如屏,芳草如茵;天鹅、黑鹳、白鹳、黄莺等栖息繁殖,在湖面结队展翅追逐、唳声相嬉,鸟语花香、生机盎然;水生植物、昆虫丰富。湖中鲜鱼别具风味,满足游客尝鲜、诱客垂钓。龙舟快艇飞驰龙宫,波光倒影,碧波荡漾。面碧水蓝天、林带绿地、田园风光、湖湾景色,而感心旷神怡。傍晚,落日熔金,河面一片静穆。端午龙舟赛,观民如潮、人山人海、热闹非凡。细窄龙船,上刻鳞甲,龙头银饰。赛时,

男女统一着装。枪响船驰,顷刻,鼓呐声划破长空。船头击鼓,水手划桨,船尾掌舵,龙舟穿湖而驰。威风锣鼓、人潮涌动、欢呼喝彩、场面滔天、民乐其中。七月,登楼远眺,风吹麦浪,麦浪滚滚,硕果累累。

秋日。蓝天白云,秋风习习。有时,浓雾弥漫大地,田野村庄披洁白纱衣。中午,天高云淡、阳光和煦、田野繁忙,不时机声轰鸣。放眼远望,到处金色大豆、玉米,清新气息弥漫田野。层林尽染,澄静如睡秋水,大雁匆忙南飞。客踩残叶,湖畔散步,路赏

秋景。

冬日。登高远望,成群野鸭河滩四处觅食,冰面翻飞,耳闻“哦、哦”阵叫。湖边草木晶莹冰棱,冰清玉洁。苇花舞动,湖面雪盖冰封、银装素裹。丽日蓝天下,熠熠生辉。景色万变,再不著述。

每年,各地游客、莘莘学子、成功人士到此一游,赏湿地风光、览高台美景。望本籍学子、成功人士、政界精英、卫国将士奋起努力,终生业绩篆刻其上。

(作者单位:高台县委党校)

白龙江畔橄榄香

袁兴荣

寒露前后,陇南白龙江、白水江、犀牛江沿岸海拔1500米以下的山梁、沟壑、溪边的荒山荒坡半山地带的山上、山下成片的橄榄园里,车流如梭人如潮涌的闹市浓荫大道旁,一株株、一片片或大或小或高或矮泛着青碧色的橄榄树在园丁悉心养护下,在淡绿中带着青灰的翠绿的叶子的掩映间,经过春的萌发,夏的成长,秋的着色、成熟,到了深秋季节,形如玛瑙、珠玑晶莹黛碧的橄榄果缀满枝头,如繁星,似铜铃,沉沉甸甸,重重叠叠,暗朝阳,挤月色,枝条为藤,绿叶映衬,青山绿水间,衬托出橄榄果的娇容丽质,靓姿玉体……果农们或提篮、或背筐,满怀丰收的喜悦与欢欣,呵护有加的采摘橄榄果。

原产地中海沿岸的“洋果果”油橄榄,远涉重洋不远万里,于1964年初最先在云南、广西、重庆等8个省12个种植点试种,引种最高峰,油橄榄曾达到1200万株,可由于其本身的“娇气”和对气

候条件的过分敏感,也由于一些人为因素的破坏,我国保存下来的一、二代油橄榄,只有数十万株而已。这也难怪啊,橄榄树是有生命的珍贵树种,也是有灵性的,适者生存么。就像万物之灵长的人类,换个新环境,水土不服,都要上吐下泻闹腾好长一些时日哩。那时三年自然灾害刚过,政治经济运动正是如火如荼之时,芸芸众生正血脉膨胀的陶醉于政治运动,打烂一切,创造一切,油橄榄这个来自遥远他乡其貌不扬甚至有些另类的树种,自然界的奇葩,了解认识它的能有几人?不铲除它更待何时?至此,引种的油橄榄跌落到万劫不复的境地,偶有幸存的,或因藏匿于荒山野林不被热血青年发现,或因热血青年怜悯其个矮身单,弱不禁风,让它自生自灭罢了。而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宋平,一次偶然的的机会,他了解到陕西汉中引种油橄榄非常成功,在他的直接关怀下,1975年第一批油橄榄苗木从汉中引

入到了武都。技术人员对比研究发现,汉中种植油橄榄的土地多为透水和透气性差的黏重土壤,而武都地区适宜油橄榄生长的地方土质疏松,排水通畅,为中偏碱性土壤,通气性能还要较好于汉中地区,这些更增加了其引种和管好油橄榄的信心。

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

这种原产地中海沿岸的“洋果果”一头扎进西北内陆大山丛林陇南白龙江沿岸的茫茫群山中,在白龙江流域的武都找到了温馨的家,由此便于陇南山川相见恨晚难舍难分了。由于海拔、气候、土壤等特别适合油橄榄种植,1997年,种植油橄榄面积已达1320亩的武都被国家列为全国三大油橄榄生产基地之一。1998年,由国际橄榄油理事会绘制的《世界油橄榄分布图》上,第一次标上了中国的名字,陇南市武都区以其独特的气候条件,被划分为一级适生区。随后,武都油橄榄被认定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中国油橄榄之乡”、“国家油橄榄示范基地”。沧海桑田,春华秋实,油橄榄成为陇南举足轻重的支柱产业,成为广大群众脱贫致富的“摇钱树”、“绿色银行”,成为陇南市区城市形象的新标识。

弹指一挥间。远渡重洋而来的油橄榄在陇南扎根发芽,以难以想象的速度茁壮成长、硕果满枝。转眼到了2013年,陇南油橄榄种植面积达35.42万亩,有15万亩进入挂果期。2013年产鲜果1.2万吨,产初榨油1800吨,鲜果产值1.2亿元,总产值6.6亿元,受益农户4万户,户均收入1650元。陇南油橄榄产量、产值均居全国第一位。配套的油橄榄系列加工厂、研发的橄榄油、橄榄茶系列化妆品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

一枝独秀油橄榄“洋果果”成了陇南人民名副其实的“绿色银行”,而结晶为神圣、和平、智慧、知识、富庶符号的橄榄树成为世界文化精神财富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源头活水。20世纪70年代初期,台湾著名作家三毛,以其对滚滚红尘的爱和痴,以其蚀骨的孤独和纯真的赤子之心写下了著名的歌词《橄榄树》,经华语歌手齐豫1979年精彩演唱,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时任陇南市委副书记的李学春,曾以气势恢宏饱含深情鸿篇巨制《油橄榄赋》刊发于《光明日报》《甘肃日报》上,让陇南油橄榄名扬华夏;周二军的小说《一个人的橄榄园》以细腻的笔触,娓娓动人的故事,讲述了回乡青年国平创办橄榄园的励志人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武都高山戏代表性传承人尹利宝创作的大型现代高山戏剧目《青橄榄、紫橄榄》,反映一对武都农村青年发展油橄榄产业的创业历程,对进一步宣传武都特色产业、推动现代高山戏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陇南油橄榄,美名天下扬。穿行在绿荫成林如雾如梦青碧色的油橄榄园;穿行金秋玛瑙缀枝头的黛绿果子间,硕果亲吻脸庞,绿叶抚摸臂弯,耳听江水滔滔枝头鸟鸣,眼观山川如画橄榄倩影,如饮甘霖,如沐春风;穿行在绿色油橄榄林荫大道上,“中国橄榄之城”一个触手可及的美好愿景正英姿勃发青春矫健的向陇南人民阔步走来!

山如黛,水如玉,青山共绿色一色;
油橄榄,润南邦,橄榄与陇南齐飞。

(作者单位:陇南市委党史研究室)

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举办全省年鉴编辑业务培训班

2014年9月24日至26日，全省年鉴编辑业务培训班在兰州举办。各市（州）及县（区、市）年鉴主编、编辑，省上有关年鉴编辑单位的编辑及《甘肃年鉴》供稿人员约130人参加了培训。安徽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版协年鉴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会长王守亚，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版协年鉴工作委员会副会长王中华，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年鉴处处长杨军仕，广东省年鉴社社长、中国版协年鉴工作委员会副会长莫秀吉在培训班上进行了年鉴编辑业务知识讲座。



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李虎在开班仪式上讲话



金塔胡杨风光



临水赏秋



秋水胡杨



曲径通幽



层林尽染



(摄影 章建福)